



# 目 录

转变正统观念的启蒙教育.....	4
建国初期的大连行政干部教育 .....	10
日本统治大连时期的警特宪机构 .....	19
日本统治时期大连市围绕中小学.....	30
教材的选用和编写问题所进行的斗争.....	30
孟天成与博爱医院.....	39
长跑健将宋长明二三事.....	41
伪满洲国大臣省长中的大连人 .....	44
咸丰初年的金州 .....	49
筹集药品器材支援解放战争 .....	57
鸦片战争中英军对大连的进犯 .....	61
回忆王化一伯父 .....	68
纪念抗美援朝四十周年专栏 .....	75
复县人民参加支援抗美援朝的斗争.....	83
我们战斗在兵站 .....	90
新金民工大队在朝鲜.....	96

为了母亲-----可爱的祖国 .....	100
忆抗美援朝的战斗岁月 .....	104
赴朝战勤司机中的五位功臣 .....	109
一切为了前线 .....	112
研制反坦克 90 火箭弹 .....	116
在朝鲜牺牲的三位大连籍烈士 .....	118
记参加抗美援朝的一段经历 .....	121
忆反细菌战的战斗岁月 .....	124
抗美援朝时期的大连分类战伤医院 .....	127
抗美援朝时期的后方医院——金县第七康复医院 .....	129
抗美援朝时期的旅大公安工作 .....	131

## 转变正统观念的启蒙教育

金实遽

1945年11月，我从延安来到旅大，先后任中共旅大工委秘书长、职工总会常委兼宣传部长、大连临时参议会秘书长、寺儿沟区党委书记、区长等职。1949年3月离任南下。我在旅大工作时间虽然短暂，但40年前旅大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创人民的新天地，艰苦奋斗战胜困难的情景，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我到旅大时，大连人民刚从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暴政下解放出来，社会秩序比较混乱。由于战后停产，大部分工人失业，缺吃少穿，生活很困难。1946年，国民党发动内战，打断了中长铁路，从陆路和海路对旅大地区实行经济封锁，使粮价暴涨，燃料奇缺。国民党不断地派遣特务分子，利用其军事上的暂时优势、群众暂时的生活困难以及盲目的正统观念，阴谋颠覆民主政府，为国民党“接收”旅大做准备。被日寇统治奴化40年的大连工人阶级，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卖国投降政策及抗战真相了解极少，相当一部分人盲目的盼中央军，不少人认为国民党是抗战的“主力”，蒋介石是“英雄”。有的还穿着新衣一连几次去迎接中央军，没接到就对着蒋介石的照片，恭恭敬敬地鞠躬。有些人不干活，静静地等待中央军。据后来寺儿沟区基层干部学习班的学员说，大部分人迎接过中央军。他们盲目的盼中央军来接收旅大，以便通车开港改变生活。严峻的政治形势迫切要求我们进行转变正统观念的启蒙教育，使广大职工群众认清国共两党的真面目，提高政治觉悟。不然，共产党在旅大就站不稳脚跟，依靠工人阶级建设新旅大就更无从谈起。旅大解放后，苏军当局奉行“铁皮西瓜政策”（即外边越青越好，内部越红越好），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公开，很多工作在苏军支持下通过工会去做。我们解决盲目正统观念经历了如下几步：

### 一、培养骨干、建党建政

建党建政最早的一批骨干，是沈涛同志根据中共大连市委书记韩光同志的指示创办的工人训练班。通过五期工人训练班，发展党员，选拔干部，并依靠他们开展党、政、警、民的组织工作。为消除盲目正统观念，我在工人训练班讲课时，运用了《从九一八到七·七》这本小册子，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成立伪满洲国及国民党不抵抗卖国投降的罪行。结合亲身经历，讲得有血有肉，听者义愤填膺，骂蒋介石蒋该死。当时从延安派来做工会工作的牟焕奎同志（任大连市工会主席）。在跟第一期工人训练班的学员谈话后，认为工人的觉悟提高很快。

### 二、针对职工思想实际进行教育

实践证明，办训练班是培养提高广大职工群众觉悟的有效办法。为迅速扩大培训效果，市里办过5期工训班后，各区、各大工厂企业也都办起了训练班。船渠（今大连造船厂）办班我去讲课，我想办法把讲课与辩论结合起来，讨论中有不同认识开辩论会，使思想问题大暴露，以便下一步有针对性的讲课。各区工会成立后在晚间也组织学习班。我到沙河口区讲，下面自发地喊起口号：“拥护共产党！拥护民主政府！拥护总工会！”非常热烈。寺儿沟区工会办训练班，我车一停下来就叫我讲讲什么是积极分子？怎么做？我讲，列宁说“积极分子是火车头”。我们大家想一想，火车头是什么样子的？首先它是走在前头的，因为他深刻领会了党的指示精神，能起模范先锋带头作用。在阶级斗争中，在除奸反霸同国民党斗争中，在创劳模、生产竞赛运动中，有勇敢无畏的精神。其次是必须连着后头，密切联系群众，团结群众，带领群众，号召群众跟党走。

在发展旅大总工会机关报——《职工报》的通讯员，建立《职工报》通讯网大会上，我讲，列宁说机关报好象一个建筑物的‘脚手架’，又象垒墙时的‘拉线’，要把不同方面的工作组成一个配套的工人运动整体，就好像用脚手架把不同作用的房间组成一个配套的建筑物的整体一样；要使全体工人阶级思想一致，行动一致，组织起来，使工人阶级力量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就象垒墙必须有拉线一样，才能使垒起的墙又平，又直，又坚固，不至于里凸外凹，一推就倒。20分钟讲一个题，哪里请我，我就去哪里讲。见到青年职员们，讲列宁的《论知识分子》。尽量讲得通俗易懂，以便他们听后照着做。

### 三、通过文艺形式进行教育

1946年上半年，我们请东北文工团来连演出《日出》、《血泪仇》及《黄河大合唱》等。这些剧目对群众的教育影响很深，促使群众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所指引的道路。有一些正统观念极深的群众，看《血泪仇》在台下一面看，一面喃喃地骂：“中央军就这样子？照这样说简直不是中央军，成了些土匪了！”聚精会神看下去，思想认识大有变化，看到感人之处掏出小手绢擦眼泪。原来一些拒绝参加任何训练的人，看过《血泪仇》后，投考了建国学院。有个立志中央军不来，决不做事的青年，看了《血泪仇》，又听他亲戚告诉他国统区的见闻后，他坚决的参加了本市民主政府的工作。许多干部都异口同声地说。“一次《血泪仇》的公演，抵得上多日的政治训练。”寺儿沟群众自编自演的《穷汉岭》、职工总会进化剧团演出的《州民泪》、《为谁打天下》、《全家光荣》等，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抓劳工，群众所受的苦难以及描述解放区群众踊跃参军进行解放战争的事迹。这些演出，使观众懂得了共产党、八路军领导抗战的历程和功绩。我仔细研究了党的文艺方针，组织各厂自编自演了二人传、舞蹈、秧歌、话剧等文艺节目，后来举办“关东职工文艺周”，进行各大企业、各区、县工会文艺汇演。街上电车上贴海报，在大连宾馆后面楼上礼堂比赛，组织评委会，开展文艺大竞赛。1947年10月，搞全市性双十游园活动，组成22个游艺站，演出72小时。这样群众性的大表演，众演员皆大欢喜。10月10日游园门口签到统计，观众达71919名。文艺工作者还组织

进步电影演出，如《一江春水向东流》等。我们还积极开展体育活动。1946年3月16日，大连“工余”足球队消声匿迹20年后重新组成。原来那些正统观念较深的知识青年跟国民党跑到沈阳，听到足球兴起。他们知道大连并不象国民党宣传的民不聊生，在沈阳也并无大米洋面吃，明白上当受骗，又跑回大连。职工文体活动蓬勃活跃在每个角落和各式各样的职工群众之中，革命文艺的巨大感染力，犹如春风化雨，潜移默化地转变着人们的旧观念。教育与娱乐相结合，吸引工人阶级跟共产党走，建设民主繁荣的新旅大。

### 四、开展劳模运动

解放初期。职工总会教育工作基本中心是生产教育，当时的职工运动实质上就是生产运动。即使政治上后进的分子，只要他一旦卷入劳动竞赛中，就会对转变他的思想起到作用。1946年10月旅大职工总会号召开展劳模运动。我组织各大企业工会主席星期日到总工会礼堂来做组织劳模运动报告。建新公司、船渠、中长铁路等单位，经常交流经验。各厂工会主席和积极分子踊跃参加。在关东地区群众性的劳模运动高潮中。选出10个成绩卓著的劳模，总结他们的先进事迹，号召群众向他们学习。画了大幅劳模油画像在总工会楼上悬挂，报纸上刊登他们的照片，登载他们的事迹。过年的时候，关东公署主席韩光同志亲自到劳模家拜年。形成劳模光荣，尊敬劳模、学习劳模的社会风气。职工总会利用星期天休息召开大会，听报告的是各企业、各地区基层单位工会的骨干和积极分子，做报告的是各大单位工会负责同志。会上交流各单位开展劳模运动的工作经验，使创劳模学劳模运动由提倡不怕脏、不怕累、大干、苦干、拼命干和提高生产，转向提倡大干、巧干、出主意、想办法，提高劳动生

产率。为实现这一转化就要提高工人素质，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开始先办工人技术学习班，在学习班内进行各种技术知识讲解。因为工人多是文盲、半文盲，算术、代数、几何、物理知识没学过，拼命讲，效果不好。于是就又从先学技术转向先从扫盲开始。全关东地区（大连、旅顺、金州）召开了扫盲大会，收集了许多文盲、半文盲苦恼的例子，如到医院看病不能识各科的牌子，到车站买票不认字，买了车票不知对错等等。各级工会办扫盲班的同时，还提倡小先生制，从每日2、3个字开始，经过两年多的扫盲运动和文化教育，收到了好的效果，不但提高了工人的文化素质，更为学技术奠定了基础；为劳模竞赛运动向巧干的更高阶段发展铺平了道路。

## 五、居安思危、准备应变

1947年5月28日，中共旅大地委传达了国民党“视察团”即将到大连的消息。

当时我们进行了周密部署，组织一套班子与苏军联系起来，拒国民党于门外；另外。万一国民党进来，在坏的形势下，要做秘密、隐蔽的斗争。那时很紧张，国民党的接收风波影响了广大群众。工会分析思想动态，谁转移，谁留下，哪些是坚定的骨干，哪些是动摇的。选择可靠的、能搞地下武装的，把他们的生活稳定下来，要求政府发一部分救济粮，准备与敌人坚持斗争。工会协助党做了很多工作，准备秘密应付事变。当时职工总会的政治教育是很有成效的，例如董彦平带国民党“视察团”成员到船渠工厂参观；“视察团”一个团员拿出1个金戒指送给1名正在机床旁工作的工人，说“你们旅大工人生活很困难，把这个拿去，改善一下生活吧！”工人气愤地把金戒指扔出很远，并骂道：“谁要你这脏东西！”说明旅大工人是有政治觉悟的。

除了教育外，就是实际行动了。董彦平没来之前，1946年7月到1947年5月，根据中共旅大地委发出的《关于开展大连住宅调整运动的决定》，工会协助动员16835户基本群众搬进47468间日本人留下的房子。国民党特务分子开始造谣说：“国民党来了先用大炮轰搬进新房的人！”后见我们说服群众搬了家，哀叹：“共产党扎了根。我们再也争取不到群众了。”我们还

发救济粮，在逃荒的人家门上写着“政府来你家看你了，请你回来后到区政府领救济粮”。群众说：“民主政府真是关心到家了。”还有干部的模范作用，共产党、工会干部与群众心连心，同甘苦，共患难，工作没有办公室，都在群众中。当时实行供给制，生活很艰苦。我们和群众一样吃着苞米和带煤油味的豆饼坯，自觉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拿我来说，我早晨5点钟起来，晚间灯下还要写文章。我爱人产后体弱，全家节衣缩食省钱给她买几个猪蹄吃。工人反映：“共产党人住的比谁都坏，吃的比谁都差，工作做的比谁都多，这样的干部我们信得过，我们尊重他们。”

1946年6月3日，国民党东北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中将一行12人到达旅顺，由于我党周密部署，又有苏军当局有力配合，使“视察团”的阴谋未能得逞，6月12日离开了旅大。“视察团”走后，接着我军夏季攻势节节胜利，旅大局势更趋稳定。1947年7、8月，市职工总会先后两次组织工会代表去辽南新解放区了解国民党统治时期压迫、剥削、摧残人民的罪行。回来后，分别组织报告会，使广大职工对国民党的反动本质有了进一步认识。

### 六、迎接胜利、随军南下

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大连地区选送出3万多青壮年参军。1948年7月24日、1949年6月23日中共旅大地委两次决定抽调275名县级干部支援新解放区。1949年3月，我离开了旅大随军南下。

有了延安时期学习的基础，又有了在大连三年多的实际；锻炼，为我南下参加夺取新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作者生前系全国政协委员，原电力部核电局局长。市总工会工运史研究生孙秀英记录整理)

## 建国初期的大连行政干部教育

王 黎

建国前成立的“大连市行政人员训练班”和创办于建国初期的“旅大市行政干部学校”，是我市早年的两所行政干部教育机构。从1947年到1956年为我市培训了约4500余名行政管理干部，对建国初期干部队伍建设成长发挥过重要作用，成为继承与发扬优良革命传统的历史桥梁。迄今事隔30余年，尚未见诸史料有所记述。笔者年轻时曾在这两个单位工作多年，离休后，每回顾往事，深感教益弥深，难以忘怀，故利用业余时间，作了一些调查采访，撰成此文，供参考。

### 一、大连市行政人员训练班

1948年春，我由社会部驻大连办事处介绍来大连工作。开始分配在大连市政府民政局任科员及代理秘书。夏初奉派到“市行政人员训练班”；担任第3、4、6期的教育干事及班部工作（该班开办于1947年，去前已办过1、2两期，第5期系整党短训班我未参加）。当时旅大地区尚处在国民党的军事、经济封锁中。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有关协定，旅大受苏军的军事管制，行政权属于中国，党组织是以不公开的形式进行工作。为了巩固人民民主政

权，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安定民生，支援解放战争，积极培训地方基层干部便成为旅大地区十分紧迫的任务。

大连市行政人员训练班，隶属于大连市民政局。此时“关东行政公署”已成立，后改为“旅大行政公署”，为旅大地区最高行政机关。下设“大连市政府”。市内行政区划分为中山、西岗、沙河口、岭前、寺儿沟5个区级政府。市行政人员训练班班主任由民政局长兼任，首任民政局长李维楨和继任局长、副局长黄良诚、孙佐民等同志均兼任过班主任。副班主任则由人事科大连市府党总支部书记李惟（女）同志兼任。人事科副科长刘玉华同志也一度兼过副班主任。班部由教育干事和管理员2、3人组成，处理训练班的日常教学及管理工作。授课教师全部由领导干部兼任，市长、副市长、局长及区党委的部长大都为训练班讲过课。记得毛达恂，任仲夷、卢正义、张志诚、曾化东、黄良诚、孙佐民等同志给讲过课，颇受学员欢迎。

学员是以市政府各局处科室和区、坊（相当街道）基层在职干部为主，同时兼招考选拔部分基层群团组织的积极分子和骨干作为新生力量培养（工会，妇联等）。每期50—60或70—80名不等，经过2至6个月的教育培训后，在职学员仍回原单位工作，新生则由人事部门统一分配，作为新干部充实基层工作。新生的待遇是半供给制，免费供应食、宿及学习。

班的培训方针是以树立革命人生观，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和政策水平为主，并重视继承与发扬党的优良革命传统教育。在教学上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原则。课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知识和时事政策为主要内容，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群众路线，社会发展简史，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社会调查，同时还有城市民、财、建、教、工商、司法、统战等时事政策课程。教学方法则采取统一上大课讲授与讨论自学相结合方式，以三分之二的的时间用之于复习、讨论消化课程。在讨论中要求密切联系思想工作实际，提倡自学与辅导

相结合的学习方法，二者互为促进，以适应短期培训的特点。学员一律住校，过着较严格，组织纪律性较强的集体生活，保留着老解放区“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带有军事色彩的传统学风。每天清晨都列队跑操，晚间集合点名讲评当日的学习生活。每周定期召开1次小组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凡节假日外出前必须搞好环境卫生，整理好内务，成为班中固定制度。课外的文体活动很活。校园内外时常洋溢着学员们的嘹亮歌声和欢快的笑语。

训练班共办了6期，前后培训基层干部三四百人之多。由于党、政领导的重视和学员的政治热情和学习积极性较高，加上班部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师生间体现了革命同志式的诚挚友谊，因此学员普遍感到学习收获很大，认为训练班是良好的革命熔炉。回岗位后，思想和工作都取得长足进步；博得单位的好评。至今，经过训练班学习过的同志，虽多已离休，但回忆起这段学习经历，均有深刻印象。

1949年第六期学员结业前，全体学员和班部同志参加了大连市的首次社会调查工作，分别编入各区的工作组。我曾带队深入岭前区，走遍了石道街、转山屯、石槽等里巷，调查了解当时处于偏僻的街道住户。那时尚无现在的交通条件，居民住的多是脏、乱、差的简陋旧式民房，吃的是糠菜参半，失业人员较多，这是大连地区当时受国民党反动派经济封锁所造成的特殊艰苦年代。但旅大人民支援解放战争，保卫翻身果实，同心同德共度难关的信心很坚定，拥护共产党和民主政府的高昂斗志和革命热情到处可见。我们深入群众。问寒问暖，帮助群众劳动生产，听取群众呼声意见。白天走访调查，晚间开会座谈或总结统计资料，常常工作到深夜，甚至突击通宵，从未闻有人叫苦喊累，经过近月的紧张工作，胜利地完成了任务。为大连市积累了一套人口、生产、生活翔实系统的第一手资料，对地方政权决策施政提供了可靠的参考，为我市建国前的民政工作建设作出了有益的贡献、而民政干部和学员也通过这次社会调查的工作实践，受到一次群众路线的深刻教育，工作和思想也得到了很大提高。第6期学员还积极参加劳动公园的挖湖平土的义务劳动和台风抢险救灾等义务劳动。历期学员在学习中也都积极参加过一些社会调查和城市

建设义务劳动活动，对密切干群关系，养成革命优良作风受到良好的陶冶锻炼。

大连市行政人员训练班除兼职领导干部外，历期班部工作人员有：刘玉华、刘仁聚、王黎、臧国栋、王常玲、张成业、聂升宏、唐 xx 等同志。

## 二、旅大市行政干部学校始末

### （一）建校初期的旅大市行政干部学校

“大连市行政人员训练班”于1949年8月第六期结业后即行停办。此时党组织已经公开，中共旅大区党委和旅大行署根据形势发展和工作需要，决定创办一所统一承担大连市 区培训行政干部的学校（不久原大连市政府建制撤消，并入旅大行署，名称亦改称旅大市政府）。

1950年初委派黄良诚同志负责筹备，先期调来赵恩光、张冠群、王黎、张鲁萍、臧国栋、丛德逊等工作人员参加筹备工作，校址选定拥警街。1950年5月15日第一期开学，17日举行了隆重的创校成立典礼，市委书记欧阳钦、市长韩光等出席并讲话。旅大市行政干部学校首任校长由韩光市长兼任，副校长由市人事局长王若瑜（女）兼任，专职副校长是黄良诚同志。以后李林副市长兼任过校长。黄良诚调职后分别由陈璞（女）、孙效章任专职副校长。干校首期设行政两个班，司法、财经各1个班；2期陆续增设农林、文教、统计、会计、区村干部等10余个班次。绝大多数学员是在职干部，少部分来自厂矿等基层单位。其中党团员、群团积极分子和业务骨干占重要比重。凡入学学员均需经过考核。各班人数不等。少则三四十名多至七八十名。年龄多数为17、8

岁到 20 几岁的青年，其中女同志占三分之一弱。文化程度多数为高小、初中水平。

干校工作干部的调配一般较为坚强，除由市领导干部兼校长职务外，科级班干部多由政治素质较好，工作能力较强的同志担任。如初期任组织科长的赵思光，是党龄较长，曾作过多年地下工作的老同志，副校长黄良诚是老红军，陈璞同志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同志，孙效章也是 1 位老同志，曾任过的前区长、市政府办公厅主任等领导职务，其他科班干部王尊嵩、邢春敏、夏雁、张冠群等同志都曾在解放初期担任过区长职务。一期结业后，又从学员中选拔一批成绩优秀者留校，充实教学力量。1951 年后，从北京招聘部分文化较高的专职文化教员，又陆续抽调部分政治理论教师。

干校的办学方针是以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提高在职干部的政策业务水平为主。为适应经济建设形势发展，满足政府各职能业务单位需要及补充干部新生力量，并陆续增设比重较大的业务、文化教学班次。课程设置，以马列主义基础理论和形势政策教学为主要内容，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教学原则，根据不同的班次各有所侧重。共同的基础课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共党史（简），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知识，共同纲领及各项法令政策、形势教育等。此外并重视党的优良革命传统教育，学习批评与自我批评，群众路线，调查研究与工作方法等。建校初期的政治课多请市党政领导同志担任讲授，每期开学、结业典礼欧阳钦书记和韩光市长都亲临讲话，任仲夷、邹问轩、张知远、康敏庄、张志诚、朱新阳、方泽、黄良诚等同志都多次到校讲课，市委党校的吴亚南、陈竞吾和各局、市群团负责人都分别到校讲课或作报告。课前学校将学员的工作、思想综合情况反映给教员。教员多能结合形势和学员实际作深入浅出，有丰富内容和较高思想政策理论水平的讲授，学员听起来很感亲切，易于领会消化。后来干校成立了“政治教研室”，有了专职的理论教员，基础课便由学校自己承担。

干校自创立伊始，便重视继承与发扬党的优良革命传统作风。礼堂两旁高悬“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标语。倡导延安抗大校风，提倡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创业精神，发扬民主，联系群众。干部与

学员同甘共苦。学员报到入校后，就由干部带头，发动大家动手，清理卫生，创造清洁整齐的学习环境。副校长黄良诚以身作则，给我印象极深，劳动时他带领全校员工，一起锄草平整操场校园，清扫办公室、教室，擦洗宿舍门窗地板，工作上对人对己要求严格，一丝不苟，善于研究和解决问题，并勇于承担责任，工作绝不拖延搪塞，有雷厉风行的魄力，生活上平易近人，能和同志们打成一片，一起跳舞打球，谈笑风生，充满青年人的朝气（其实那时他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因此很受干校职工学员的爱戴。当时干校的科（班）级干部，非党人员有我和总务科长，他对我们非常信任，和党内同志一视同仁，经常在政治思想和工作生活上给予热情的关怀与帮助，对我的熏陶和教导至今难忘。继任副校长陈璞同志也经常以“正人必先正己”、“教育人必先教育好自己”为座右铭，嘱咐同志们要以身作则，重视身教，经常保持谦虚谨慎作风。孙效章副校长也是一位生活艰苦朴素，待人诚笃，工作认真，严格要求自己的老同志。当时兼校长的韩光同志常和兼副校长的王若瑜同志深入学校，多次亲临参加校务会议，与同志们商讨办校及有关教学工作；对干校工作的同志给予极大关怀，并常和同志们亲切交谈，没有任何领导干部的“架子”。因此干校同志之间充分体现亲密团结，相互坦诚相见，一心为革命事业搞好教学的气氛。

教育科和班部的同志，都与学员共同听课，课后深入小组辅导，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增强学员研究问题的主动积极性和独立思考能力，引导学员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不断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和政策水平。

### （二）在抗美援朝及政治运动中的教育

1950年首期学员学习期间，正值抗美援朝开始，全校员工都以实际行动投身这一伟大的爱国运动中，接受教育和考验，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参加全市的有关活动，在群众性的游行示威集会中干校队伍都以严整、振奋的姿态行进在游行的行列中。是年十月我国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过江赴朝参战，干校奉东北局和旅大市委指示，立即以原有的行政班为基础，改建为抗美援朝的机动待命班。为做好参战准备，集中学习有关抗美援朝文件，如学习毛主席关于论述《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等文章，批判恐美、崇美思想，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树立坚定民族尊严和敢于战胜强敌的信念。并在教学中增设军训课目，从公安总队调入一名军事教官驻校，进行军事基本操法及常识训练，还举行几次夜间紧急集合的操练。是年10月29日干校抽调两个班共百余名学员，由组教处长赵恩光，班主任夏雁同志带队，全付戎装，与市委党校学员和市公安局3个单位，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一个后勤兵站，由原宪千任政委，进驻辑安参战。临行，干校举行了隆重的欢送大会，全校师生群情愤慨，表示誓作后盾，随时准备应召参战。1951年元月末，以3个单位代表联合旅大市各群团、新闻单位组成了“旅大市人民赴朝慰问团”，由沈扶同志任团长（市中苏友好协会秘书长），邢春敏同志任副团长（市民政局战勤处长），笔者为秘书（干校教育科副科长）。和市妇联的张洵、党校的李青、公安总队的张xx等同志，分别前往辑安、通化等后勤兵站及分支驻地进行慰问。我们一行经深入各分站团队走访座谈，目睹了3个单位的参战同志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甘冒风雪严寒和敌机轮番轰炸，为保证军运供应，抢救伤员，日夜奋战往返于中朝战地的动人情景，并了解到干校学员有不少人立功受奖，博得中朝人民的好评，听到不少动人的英雄事迹，我们感到受了一次深刻而生动的教育。在校师生也受到莫大鼓舞。以后，在校师生员工还多次参加接运志愿军伤员抬担架的战勤任务，前去海港临时总战伤医院，往往紧张地工作，通宵不眠，人人奋勇，争挑重担，毫无畏缩，表现了炽烈的爱国主义和奉献精神。

1951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1952年的三反和五反运动，干校均积极响应号召，认真组织学习，宣传有关政策，协助政府踊跃提供检举揭发材料，三反五反时还抽调了有关班级参加清查工作。三反后期还举办了两个以复查经

济问题为主的审干班，抽调了 100 余名科级以上干部集中学习。一方面听取本人申诉，一方面学校指派专人配合内查外调，及时纠正和澄清了在运动中被误伤和处理偏重同志的问题，作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解除了蒙受冤枉干部的思想包袱，保护了一批工作骨干，重新调动了这批干部的积极性，受到了各有关单位及学员的好评。

### （三）关于文化、财会，计划统计等专业干部的培训。

干校除担负着教育轮训大量在职干部外，随着经济建设事业日益发展的需要，同时为培训充实干部的新生力量和基层专业干部做了大量工作。1951 年 7 月实行在市内及县区公开招生，招考了 500 余名待业青年，共增设了 7 个行政班。这批新生的特点是政治出身比较单纯，素质较好，但文化程度偏低，多数为小学程度，且皆少实际工作经验，显然难以适应工作需要。学校遂根据这一特点决定施以补习文化为主的教学内容，为此特派专人从外地招聘和从市内中学抽调了一批具有大专文化水平，有教学经验的文化教师，给予半年学期的初中文化课的补习，只在结业前增开一些有关时事政策课，然后由市人事局统一择优分配各单位录用为基层干部，其余则输送各大企、事业单位继续给予各项专业培训后分配工作。如当时铁路、银行、大连造船厂等单位都接收了不少这样的学员。他们参加工作后政治热情很高，工作积极性很强，表现良好，很快成为各单位基层干部的骨干力量。

自 1951 年至 1955 年，陆续增办了大量的财经、会计、计划统计等专业班，学期一般半年至 1 年左右，5 年中办了 10 几个班，共培训中初级财会统计专业干部数以千计。专业课除主管业务单位负责人兼任外，并由学校配备部分专业教师担任授课和辅导。学期较长的专业班课程是参照中等专业水平安排的，记得主要有政治经济学基础知识，计划统计。会计学原理，工、农、

商、成本会计，以及有关财政、经济、金融、工商管理 etc 政策法令。并结合各班不同专业定期组织深入厂、矿等生产单位参观实习，使教学与实际工作紧密结合，对提高教学水平与学员业务能力起到良好效果。结业后，在职学员回原单位多受到好评，新生也为各单位愿意接纳录用。干校培养的各专业班学员，几乎遍布我市的财经、计统、金融工作岗位，至今多数已被评获专业职称，成为各单位的骨干，仍继续为四化贡献自己的力量。此外，1954 年根据工作需要还开办了一期企业管理，人事监察、科技管理干部的政治班，大约抽调了 2、3 百名科级以上在职干部进行轮训。通过马列主义基础理论、党史、党建、时事政策及现代企业管理等课程的学习，对以非党知识分子，科技人员为主的政治班。着重进行加强与坚持党的领导教育，树立与巩固相信党、依靠党的观念，以提高学员的政治思想和理论水平。调动其发挥专业工作的积极性，收到显著的效果。学员通过学习，提高了政治觉悟，有不少人在学习结业前后，光荣入党，其中大多数人后来被提拔为各单位的领导干部。

#### （四）旅大市行政干部学校的停办

1955 年末，随着经济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施行以政治教育为主的培训任务与党校相重复，而实行综合性多种专业培训，在管理和专业师资上存在多方面的困难不易解决。且此时各系统自办的专业培训学校和训练班逐渐建立，并在逐步加强中。鉴于上述等多方面原因，行政干校统一培训方式已不再必要，因此，根据省市的指示遂撤消了旅大市行政干部学校机构。（机构撤消后为处理善后事宜，缩编为“旅大市干部训练班”，又续办了几期短期培训，延至 1958 年后始并入市委党校）。行政干校办校历经 6 年余时间，共举办长短期各类培训班十数期，班次类别达数十个，前后培训干部逾 4000 余名。迄今除初期结业学员大部业已陆续离退休外，大量学员仍然在我市机关及各企事业单位继续工作，有些人已走上各部门的领导工作岗位。这些同志为我市建国初期的艰苦创业和当代四化建设与改革开放事业都作出了一定贡献，为继承与发扬革命优良传统产生很好的影响。行政干校为我市建国初期的干部教育完成了它应尽的历史任务。干校的教职员工也对此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他们都已离退休，有的

领导如黄良诚、孙效章等同志早已逝世，但他们的言传身教在广大学员中是永远值得怀念的。

（作者系九三学社大连市委员会离休  
干部）

## 日本统治大连时期的警特宪机构

徐 广 兴

日本帝国主义自 1905 年侵占旅大地区以后，相继建立了警察、特务、宪兵队（以下简称警、特、宪）等统治机构，豢养了大批汉奸特务，推行法西斯政策，残酷镇压中国共产党在大连的地下组织和爱国群众的抗日活动，对大连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实行全面的法西斯统治，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就我们所知，其机构情况如下：

### （一）警察系统

日本侵略者在统治大连期间，建立了庞大的警察机关。1906年9月1日在旅顺成立了关东州都督府，在所属的民政部内设警务课，在大连、旅顺、金州设民政署警务系。1919年4月11日改为关东州警察厅。1932年3月伪满州国成立。为适应伪满政府的要求，日本于1934年12月26日，在长春设立关东局，在大连设立关东州厅警察部。警察部下设书记室和警务、特高、外事、经济、刑事、警防、保安、卫生、兵事9个课。所属大广场、小岗子、沙河口、甘井子，水上、金州、旅顺、普兰店、貔子窝等9个警察署。警察署下设警务、特高、经济、司法、保安，卫生、警防、兵事等系，拥有职员5000余人。

在警察系统中，系主任以上的职务皆由日本人担当。其职务有巡查、巡查部长、警部补、警部、警视补、警视等。中国人担当的职务有巡捕、特别巡捕、巡捕长、巡查补、嘱托、联络员和密侦。巡捕是警察部和各警察署、派出所日本巡查的助手，执行警察任务。由于日本侵略当局在旅大推行民族压迫政策，中国人无权充当官吏，所以称为巡捕，实际上就是警察。由于分工的不同，在司法、经济课（系）充当巡捕、巡捕长的中国人，称为刑事或视察。其主要任务是：专门从事刑事侦察和缉查“经济犯”。保安、警防、交通、消防等课（系）中的巡捕主要任务是：分别从事管理火药、危险物品、车辆、建筑、防空、交通和消防等工作。派出所巡捕的主要任务是：管理户口、维护治安、缉查一般刑事犯，有的临时协助特务组织和特务分子从事特务活动。

警察部特高课的主要任务是负责调查、监视各界动态。控制各种社会团体，检查出版刊物，侦察与镇压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及爱国者的抗日活动。该课下设情报系、出版检阅系、思想系、劳动系。

外事课的主要任务是对各国侨民、外国领事馆，特别是苏联领事馆进行侦察、监视，并进行邮电检查。该课下设庶务系、防谍系、外人系。

各警察署中的特高系也收集外事方面的情报，但从事外事特务活动主要由州厅警察部外事课担任。

特高、外事课（系）为了广泛开展特务活动，扩大情报来源，加强对抗日群众的镇压，发展了大批联络员。声称：“用联络员到群众中才能得到真

实的情报。”为此，在关东州内的各工厂及中国人居住区全面张网。从1939年开始。特高课为了在全市主要工厂、军事工业中开展侦察，加强防谍工作，组织了“爱护委员会”，后改为“防谍委员会”。总会设在州厅警察部，各警察署设分会，并根据厂矿的具体情况，按层次先后设立了130余个“二级防谍委员会”，建立了219个情报网、侦谍网，广泛收集各种情报。

### （二）大连宪兵队

大连宪兵队是日本侵略者对殖民地进行血腥镇压的最高权力机构和指挥机关。在日俄战争期间，日本为长期侵占旅大，维持殖民统治，其侵华派遣军第三军兵站管理部，就分别在旅顺及各地的侵华日军中设立了宪兵。1905年日本战胜俄国以后，在旅顺新市街成立了关东宪兵队，隶属本土东京宪兵司令部领导，下设旅顺和大连两个宪兵分队。1931年9月18日，日军侵占沈阳，为适应其侵略扩张的需要，于9月21日将关东宪兵队升格为关东宪兵司令部，驻地迁至沈阳，隶属关东军司令部领导。1932年10月28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由沈阳迁至长春。1936年4月，旅顺宪兵分队改编为分遣队隶属大连宪兵分队。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为了强化旅大战略要地的法西斯统治，于1938年12月将大连宪兵分队升级为大连独立宪兵分队。1939年4月改为大连临时宪兵队，同时将旅顺宪兵分遣队又扩大为旅顺宪兵分队，受大连临时宪兵队领导，同年8月1日关东宪兵司令部令大连临时宪兵队更名为大连宪兵队本部，办公地址在大连市东公园町86号（今鲁迅路大连绳网厂院内），下辖大连宪兵分队，旅顺宪兵分队。

大连宪兵队本部成立时下设特高课、副官室、经理室。特高课下设外勤室和内勤室。外勤室下设外事、思想对策、防谍、检阅、化学、联络5个班。内勤室下设内勤、雇人、传达3个室。各宪兵分队下设特高视察班、警戒

斑、司法班。1945年5月。大连宪兵队本部改组，下设副官和战务课（原特高课），所属大连、旅顺两个宪兵分队。

大连宪兵队本部从成立以来，先后建立了40多个外围组织，操纵和利用反动社团36个，外商企业7个。特务据点58处，发展特务分子450余名，情报关系904名。

各级宪兵队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建立秘密情报组织和情报据点，向重要厂矿企业和复杂场所派遣特务，广泛搜集各阶层的思想动态。侦察与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监视与控制外国领事馆人员和外侨、外商的活动，搜集情报，担负日军仓库、后勤补给工厂的防卫，监督军需生产等。

宪兵队本部各级人员的具体职责是：宪兵队长主要是领导与指挥本部及各分队、分遣队的工作；副官是宪兵队长的助手，除代理执行职权外，还掌握全队人员的调动权；战务（特高）课长除协助队长执行一切职权外，并掌握战务课、内勤、外勤一切职权。

战务课所属各班的任务是。外事防谍班负责对各国领事馆、侨民、外商企业、特别是苏联领事馆的监视与侦察。思想对策一班负责侦察与镇压抗日爱国者和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活动，调查掌握经济、文化、宗教、新闻出版、学校等团体，监视与侦察进步人士的活动，派遣宪兵、宪补在重要厂矿内部发展联络员，“保护”生产安全，侦察了解各阶层思想动向，搜集社会反映。思想对策二班负责侦察与镇压日本、朝鲜人的抗日活动，指导防谍团体的工作，搜集经济情报及其他有关政治情报。埠头班负责在来往船只中搜查与发现“反满抗日分子”，监视外国船只活动，保护大连码头设施与生产的安全，搜集其他情报。戎克班负责侦察与监视军川和一般汽、机帆船的船员，在船上发展联络员，特别是对运输军用物资的木帆船重点监视，从中发现“反满抗日分子”，保证运输安全，并搜集其他情报。科学班负责邮电检查、出版物、电影片检查、现场勘查和照片、指纹等的技术鉴定。特高内勤班负责案件的整理，收发各种情报文件，指示各分队的警务业务。

旅顺宪兵分队所属要合司令部宪兵室的主要任务是：在军事上除搜集防空、海上情报外，还搜集政治、经济。思想、劳务以及各界人民的动态等情报，侦察与镇压抗日爱国者及八路军嫌疑者。

日本侵略者由于推行殖民地政策，对殖民地国家的人员不信任，直至1936年才开始使用中国人充当特务，而且只能担任宪补、翻译、临时翻译、嘱托和联络员。宪补是宪兵队汉奸中的最高职务，属于宪兵队正式人员，共分四等，每月按时开薪。录取时经专门训练后，发给“勤务手册”，每日到宪兵队上班，并添写“特务日志”。其任务是：发展联络员、搜集情报、捕人刑讯及其他方面的特务活动。有的被秘密派遣到工厂、企业或中国人居住区进行特务活动。翻译是宪兵队的正式人员，由宪兵队发给证明书，其任务与宪补相同。临时翻译是宪兵队的非正式人员，分为两种：一种是聘用时由宪兵队战务课长批准，发给证明书，定期由宪兵队的机密费开薪，不规定每天上班签到，但经常出入宪兵队执行任务，除不值班外，其它任务与宪补和正式翻译相同，可以发展联络员；另一种是宪兵队为某一任务临时使用的，不发给证明书，大部分是宪兵个人私用，用完后有的充当联络员，有的脱离关系。嘱托实际是高级联络员，大多是社会上有名望的绅士，或有一定技术能力的知识分子，分为经济嘱托和政治嘱托。嘱托有证明书和旅行证明书，持有这种证明可通行青岛、烟台、北京各地。嘱托由宪兵队长、课长以上负责人领导，定期由宪兵队的机密费开支。其任务主要是搜集情报，有的负责技术鉴定。联络员是宪兵队为加强特务活动，侦察与镇压反满抗日分子所发展的情报员，通常根据工作需要而发展使用。在发展时，通过写“特务日志”或书面报告，经上级批准后即为正式联络员。主要任务是搜集反满抗日活动的情报，有的常常被派遣到工厂、企业和劳动工人居住区、解放区及侦察目标周围进行特务活动。

### （三）大连陆军特务机关

1907年，日本侵略者即派关东军参谋部部员在大连南山枫町（今中山区枫林街）成立了大连陆军特务机关。这个特务机关既是关东军参谋部的情报机关，又是其进攻东北的一个重要的特务活动据点。主要任务除配合奉天特务机关搜集东北的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情报，阴谋颠覆东北政权外，并对旅大地区各族人民实行所谓的“思想对策”工作，特别是加强对白俄的工作。“九一八”事变后，侦察苏联领事馆和对白俄进行反苏宣传，并收买利用特务50余名，建立情报关系167名，建立活动据点8处。1938年至1941年其机关长为安江仙弘大佐。1944年大连陆军特务机关改为奉天陆军特务机关的分支机关，机关长为竹冈丰大尉。

大连陆军特务机关对中国人方面工作是：搜集中国人的政治、经济、社会、宗教及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活动的情报。他们除经常深入到农村调查搜集社会动态和“反满抗日”情报外，并利用在苏联领事馆内任职的华籍职员监视苏联人员动态。对苏联人方面主要是监视、控制苏联领事馆人员、苏联侨民及与苏联人有来往的人员活动情况。他们在苏联人居住区域内建立情报网，秘密搜集情报。

大连陆军特务机关成立后，内设支那，露西亚、欧米3个班。支那班主要负责搜集中国人方面的政治、经济、社会、宗教等情报。以及伪满州国各地特务机关所需要的情报。它与各商会、市役所、宗教团体都有联系，甚至专门召集各界知识分子进行座谈，为其提供情报。露西亚班主要负责监视苏联人及与苏联人有关的人员。由于这方面的工作任务艰巨，便主动与大连宪兵队外事班、关东州厅警察部外事课、各警察署特高外事系、满铁经济调查部、旅顺要塞司令部大连出張所、递信局、电话电报局配合，搜集情报与跟踪盯梢。欧米班专门负责调查英国、美国、意大利人的情况。它与露西亚班均负责对外国人进行反动宣传。

大连陆军特务机关由于对外国人享有特权，其它特务机关搜集到外国人的情报均得向其报告，对于检举与处理外国人也必须经其批准。因此，其它特务机关的负责人每星期都必须向其汇报工作或联络一次，通常由特务机关长

负责召集宪兵队长、关东州厅警察部长、满铁调查部负责人会议交换情报，而该特务机关所搜集到的情报对其它特务机关保密，不予交换，直接上报关东军参谋部；并及时与伪满州国交换，以便制定各种对策。

### （四）关东州劳务协会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由于劳动力的需要量不断增加，为了镇压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和爱国志士的抗日活动，关东州厅警察部队以“社团法人”的名义，于1938年10月22日在原大东公司的基础上成立了特务警察的外围组织——关东州劳务协会，会长由关东州厅警察部部长兼任，常务理事由原大东公司负责人担任。下设总务。企划、登录。劳务第一、第二，劳需、监察等7个课。1941年2月增设了弘报系，1943年又设立了勤劳训练所。在大连市内设有18个事务所，在旅顺、金州、甘井子、貔子窝等地设立了5个出张所，负责办理公开性的审查、登记、照相、盖指纹等工作；在大连火车站、水上警察署等地设有职员派遣所，控制工人出入；在东山庄、西山庄等收容所内亦派有该会的常驻人员，监视工人活动审查经济来源。

关东州劳务协会的各个组织与日本关东州特务、警察机关互有联系，关系最密切的是弘报系，指纹系、勤劳训练所。弘报系的主要任务是。在劳动工人中发现可疑分子和逃跑工人；渗入中国人经营的企业内部，搜集工人的可疑迹象；注意发现出境者；调查与发现未经办理雇佣手续和私自雇佣的工人；调查工人对粮食等物资配给情况与反映。指纹系由劳务协会登录课领导，是控制关东州劳动工人指纹的中心。主要任务是：发现“案犯”线索与证据；严格控制“犯罪”分子，负责对刑满释放到社会谋职的人重新盖指纹、照相、登记；强制中国人民参加奴役性劳动。勤劳训练所是劳务协会中的独立性机构，

负责对中国劳动工人进行“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等内容的奴化教育，从中发现可疑分子。

#### （五）关东州警防团

关东州警防团是防空组织。1941年，日本侵略者为了加强战略防空工作，以警察机关为主。在原关东州防护团的基础上，成立了关东州警防团。1942年又相续成立了“大连家庭防空指导委员会”、“学校防空补助队”等附属机构。

警防团的任务是协助军事、警察、行政机关进行防空工作，在警察署的指导下，督促、检查防空事项，空袭时出动负责救护、灭火、维持秩序，参加防空演习训练；在农村协助派出所的警察、巡捕缉抓贩运粮食、鱼肉的“经济犯”；在铁路沿线负有护路责任。

#### （六）伪满州国保安局大连办事处

伪满州国保安局大连办事处（以下简称办事处）是伪满中央保安局在大连设立的情报联络机关。

1940年，伪满中央保安局、关东州厅警察部、朝鲜总督府警察局为了加强三方之间的情报联系。定期交换情报，以便侦察控制苏联、蒙古、朝鲜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在旅大地区的活动，决定每年召开三次联系会议，由各方轮流主持。于是伪满在大连设立办事处。该所的人员掩护在伪满警务总局大连派遣员事务所内，其组织对外保密，活动诡密，对外联系以警务局的名义出现。该组织机构是独立的，其所员一部分由伪中央保安局直接派遣，另一部分从警务总局大连派遣员事务所的职员中选择。所长由该所所长小野勘七兼任。所有人员均系日本人。该所单线执行保安局任务，所获取的情报直接报伪中央保安局，然后转报关东军司令部第二课。该组织的主要任务是情报联络。搜集各国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情报及控制外侨出入伪满州国的活动情况。主要是通过关东州厅警察部特高课。外事课、水上警察署、大连宪兵队本部、

陆军特务机关、满铁埠头局等特务机关，从各个时期所掌握和破获的各种政治案件中获取有关情报。对外侨方面情报，主要通过伪满州国外交部、大连旅眷查证办事处。从申请出入境签证和旅行证明中获取，必要时是通过关东州厅警察部布置当地警察署进行侦察和审查。

### （七）厂矿企业内的特务组织

警特宪机关为了推行其法西斯统治政策，在厂矿企业内部建立了一系列外围组织，大肆进行特务活动。其情况大致分为四种，一是公开设立特务机构，在宪兵队战务课，警察部特高课、外事课和各区警察署特高系的领导下，从事防谍、情报活动；二是由特务机关派遣特务分子到厂矿企业中的劳务、庶务等部门，以公开职业掩护特务身份发展密侦，从事特务活动；三是在社会上建立密侦，打入工厂企业内部，从事特务活动；四是在厂矿企业内部建立外围组织，开展“群众性的防谍活动”，如“星交会”、“防谍委员会”、“善邻班、”“防谍邻班”。“连座班”等。其主要任务是加强统治，监视工人的思想动态，侦察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抗日爱国活动。

#### 1. 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埠头局整备室

1938年，日本关东军为了加强掠夺中国的经济财富，向满铁本部提出所谓“加强满铁自体防卫”的建议，根据这个建议，满铁奉天（今沈阳）总裁室成立了对内防卫的特务机构——防卫班，同时各铁道局及主要厂矿部门都设立了防卫系，大连埠头局也由警察、宪兵机关中抽调特务人员，在总务课下设立了防卫系。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为了使此特务组织能适应战争的需要，将满铁防卫班扩大为防卫部，直属企划局领导，该部下设一、二、三

课及防卫指导训练所、辅导研究所。大连埠头局与各铁道局的防卫系也随之扩大为防卫课，下设庶务、防空、防谍三个系，并从关东州厅警察部内抽调部分人员充实该课的力量，使满铁的特务机构在组织上、人员上及具体活动上都得到了加强。1944年9月，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遭到严重打击，为了巩固满铁这一战时的交通供应枢纽，根据关东军的提议，将满铁防卫部改为整备局，划归满铁本部直接领导。大连埠头局也随之将防卫课改为整备室，下设一、二两个课。一课分庶务、防空、动员计划3个系；二课分防谍、情报、消防、警备4个系。其人员除了从警宪机关中抽调一部分，还从满铁内部抽调了一批具有情报活动经验的人员。为了进一步统治和镇压中国职工，又从满铁内部选调了数名能效忠日本当局的中国高级职员，补充到辅导研究所内，专门对中国职工进行有关方面的调查研究等。经过这次改组，不仅在机构上扩大了，而且在活动上比以前更加隐蔽了。

## 2. 满州石油株式会社警防课特务系

1942年，满州石油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石）遭到抗日放火团多次放火破坏的严重打击，关东州厅警察部为对付这种局面，将一些有特务活动经验的日本警察官派遣到满石担任警防工作，成立了警防课特务系。主要任务是：保卫满石，防奸防谍，搜集有关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与劳动工人中的“反满抗日”活动的情报。该特务系的业务工作由甘井子警察署特高系领导，定期参加警察署召集的会议，汇报工作情况。满石警防课的课长，特务系主任，由关东州厅警察部专门派遣的日本人担任，他们均有特务身份，是专门从事特务工作的，其一切供给由满石负责。在特务系内的中国人必须通过特务关系和亲朋关系的介绍方能任职，有的专职从事特务工作，有的只能发放职工证明和办理工人中的偷盗案件。特务系成立不久，为达到其保卫满石“防奸”防谍和严密控制中国工人活动情况的目的，在各车间的中国工人中建立了“连座班”的组织，每12至15人划为一个班。每班设班长和副班长1人，由日本人捐定。

### 3. 大连陆军防谍团体星交会

1942年12月1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责成大连宪兵队本部特高课在大连市山县通福昌公司（今中山区斯大林路122号）成立大连陆军防谍团体星交会。该会除完成福昌公司本身防谍任务外，同时还要求各企业互相帮助，亲密团结，扩大军需生产，以保证侵略战争所需物资的供应。

该会下设钟表、印刷、食品、造船、电气、土建、机械、药剂、摄影等分会。大连宪兵队本部特高课直接控制星交会，从中搜集情报。其中戎克班控制造船分会，思想对策班控制电气分会、造船分会、土建分会，化学班控制机械分会、药剂分会、摄影分会。星交会本部制定了年度防谍训练计划，各分会根据此计划，结合本分会特点，订出具体计划，负责指导各分会的宪兵经常对防谍工作进行检查，每月召开一次训练会议，以增强星交会人员的防谍观念。大连宪兵队本部每年组织星交会进行一次防谍演习，召开一次全体大会。1943年以后，为提高防谍工作能力，指导各分会的宪兵对分会下属企业本身的防卫对象、警备力量、警备措施、机要文件的保管、打字室的防谍措施、劳动者入厂手续、紧急事件的应急措施等等坚持严格检查。宪兵本部每年增加一次防谍演习，重点演练对紧急事件的处理。

（作者系大连市公安局史志三

科科长）

# 日本统治时朗大连市围绕中小学 教材的选用和编写问题所进行的斗争

李荣君

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在大连市（包括旅顺、金州、貔子窝、瓦房店等地）办起了学校，着手对中国青少年进行奴化教育。他们自始至终特别注重教材的选用和编写问题。为此，大连市人民围绕着中小学教材的选用和编写问题同日本统治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笔者根据大连教育界前辈金纯泰老人生前的回忆以及对大连、旅顺、金州等地的几个有关单位和对敌伪时期在大连当过教员或读过书的 20 几位老人的调查，将这段历史整理成文，但很可能挂一漏万，难窥全豹。

## （一）

1906 年，日本帝国主义在辽东成立了“关东都督府”，下设“学务课”，统管辽东教育。首先建立了“关东州公学堂南金书院”（强行改造素负盛名的金州“南金书院”）、“貔子窝公学堂”、“普兰店公学堂”、“旅顺学堂”（1908 年日本学生迁出后称“旅顺公学堂”）等学校。

这些学校的课程表是这样规定的。

修身（一）国文（八）习字（三）算术（五）

日语（四）唱歌（一）体操（二）手工（一）

图画（一）裁缝（一）只限女生）

表面上，较原来只学文史和习字的私塾，确实增加了许多科目，现代化多了。但奴化教育者的目的极为明显。他们除了强迫学生必须学好日语课之外，唱歌、图画和手工，尽量采用日本内容和日本风格，连算术课的某些例题也都明显地透露出日本气息。对修身和国文两科，他们下的功夫更大，抓得更紧。

修身课其实即思想品德教育课，也即政治课。最初修身课的内容多是取材于“二十四孝”之类的史话和一些日本的贤孝故事。这样的教材没有任何新意，完全是陈腐落后的封建主义老调，无论奴化教育者怎样努力，也不能把学习秩序搞好。课上讲中日贤孝故事，课下中日学生到了一起就吵架、斗殴。旅顺学堂第一任堂长庄野太郎感到工作乏味又无能为力，被迫辞职。

国文课（后改称满语课）开始学习《三字经》、《百家姓》、《论语》、《孟子》、《千家诗》等，与私塾启蒙教育内容基本一样，而且，学生感到在私塾里能学得更扎实些，所以，学生中公开声明退学，或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者大有人在。

1908年，“学务课”从台湾调来富有殖民教育经验的中堂谦吉接任旅顺学堂堂长。从此旅顺学堂中日本学生迁出，学党更名为“旅顺公学堂”。

中堂谦吉到任不久，时逢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新修身教科书开始发行，旅顺公学堂率先采用，学习秩序稍有好转。可是过了不久又引进了“台湾公学校”用的《汉文读本》，便引起了家长和学生的极大反感，因为台湾早就是日本的殖民地了，而旅大仅是日本的“租借地”。家长们公开议论、反对，学生们把《汉文读本》抛来抛去，坚决不读，而争先恐后去购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新国文教科书来学习。家长们也不放心，怕自己的孩子不务正业。将来说“驴话”，忘记祖宗，忘记自己是“大清臣民”。于是在地方绅士的带领下，出面要求成立半日制私塾，允许学生每天下午到私塾学诗文、读经史。日本教育当局不置可否。于是，本来呈衰落趋势的书塾教育，又一度兴旺起来。旅顺公学堂学生金纯泰等人，聘请秀才刘恭敬为私塾先生教授大量中国古典经史诗文等。

腐败的清朝政府闻听旅大地区教育界的这些情况，感到很为难。因为不过问，对人民又无法解释和交待。于是便不得不派了一位顶戴花翎视学官来到旅大“视察”教育。

这位视学官走进旅顺公学堂本科班，翻了翻学生们的课本，又站在课程表前看了许久。堂长中堂谦吉小心翼翼地上前说：“课后尚有半日私塾补课。”视学官点了点头走出教室。在欢迎会上，中堂谦吉对视学官说：“我日本帝国决心以新文化培养教育清国善良子弟为目的，请阁下放心！”视学官回答道：“贵国以同文同种关心清国子弟教育，必能以近日远俄方针，教养我子弟成人。”会后，视学官接受了重礼，扬长而去。学生们聚在一起议论这件事十分气愤，有一位同学当场挥毫书道：“颇似剧中一丑角！”

自此以后，日本奴化教育者更加大胆地施展其文化侵略伎俩了。日本校长亲自走家串户，与地方绅士交朋友、动员他们带头把子弟送到公学堂；对穷人则施舍文具，百般引诱；同时，出高价聘用当地有名望的先生到公学堂任教和秘密勾结警察寻衅扰乱或捣毁私塾。1908年夏秋，仅旅顺几乎同时被捣毁的私塾就有5所之多。他们这种遏制中国传统教育的发展，强行推行其奴化教育的政策，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再一次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 (二)

为了进一步扩大奴化教育师资队伍和笼络中国知识分子，某些公学堂附设了师范部。由乡间推选年龄较大者（20多岁至30多岁）入学，一律公费。

师范部的课程是这样安排的：

修身（一）国文（四）日语（五）地理（二）

历史（二）理科（二）教育（二）教授法（一）

图画（一）手工（一）体操（二）唱歌（一）

可以看出，除加强了日语而削弱了中国国文课外，还增设了历史、地理、教育、教授法四门课。在授课时，经常发生反对日本教师诬蔑我国的斗争。旅顺公学堂师范部的日本地理教师合原金八在讲课时讲到：“朝鲜与日本

合并，一同奉养天皇陛下，中国前途若何尚无定局。日本已列世界六大强国之一；以前世界各国视中国为睡狮，现在各国视中国为肥猪！”立即有学生愤怒地质问：“将来视中国为何？”合原金八连声喏喏，胆怯地回答：“将来我不敢说。”于是引起全体学生骚动，终于酿成罢课风潮。堂长中堂谦吉被迫出来当众赔礼道歉，事态才平息下去。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中华民国建立后，旅大地区奴化教育当局随机应变，极力宣扬“中日亲善”、“中日提携”、“中日共存共荣”等谰言，并颁布了“新学制”。把公学堂划分为“初等”、“高等”两科，初等科四年制，高等科二年制，一律采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新教科书。后来，又裁撤了旅顺、大连、金州等地公学堂附设的师范部，合并为旅顺高等学堂。

辛亥革命失败后，老谋深算的中堂谦吉等奴化教育者们更凶相毕露地到处煽动：“商务出版的修身、国文等教科书有改编的必要。书中尚武、民族、爱国等内容。中国人为谁尚武？为日本，现在不可能；为中国，于日本不利。中国人若有民族气节，则不能接受日本教育；中国人若爱国则不能把辽东租给日本。再说，书中所描写的生活习惯多为南方风俗，很不适于关东州……”都督府学务课采纳了他的意见，并把他调到大连西岗公学堂（大连一中现址）任堂长，并于1912年成立了一个“教科书编纂委员会”。

教科书编纂委员会的编辑长是日本人今井顺治，中堂谦吉任副编辑长。编委有大连伏见台公学堂（现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印刷厂址）堂长钱井正次郎、金州公学堂（校舍现为部队所用）堂长岩间德也和几名中国教师：李义田（晚清贡生、社会名流，旅大地区师资考试命题人），李荣封（旅顺公学堂国文教师）、迟遥章（伏见台公学堂国文教师）等。

在中堂谦吉的策划下，把书中有关岳飞、文天祥、史可法、温生才的篇章和有关兵操、武勇、战斗的论述，一概删除，又从别处七拼八凑选来一些文章补上充数。经过一年时间编出了新的教材《汉文读本》，由日本大阪书屋仿照商务印书馆所出教科书装帧的原样印刷销售。

中堂谦吉正在洋洋得意，以为自己又为日本的殖民主义政策立了大功时，大连市人民又掀起了更大的反对浪潮。有的学生拒绝使用这种课本，拒绝学习日文，设法购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书。著名国文教员旅顺公学堂的李荣陞等许多教师纷纷提出辞职，致使各学校教员骤然奇缺。

不惟学校如此，社会上也掀起了极大风波。大街小巷愤怒的责骂声不绝。《泰东日报》编辑长傅立鱼以他流畅的文笔，连续在报上发表文章，严厉指责中堂谦吉所改编的教科书是“非驴非马”、“不伦不类”之物。其语言之辛辣，分析之透辟令人惊叹。大连市人民，稍有阅读能力者，都争相购读傅立鱼的文章，觉得大快人心。中堂谦吉惶惶不安。但还要挣扎，便到日本当局提出控诉。日本当局看到大连市人民的反日浪潮如此强烈和深广。生怕惹出更大的麻烦。便以中堂谦吉作风不良；妨碍中日亲善等罪名，令他承认过错并赔礼道歉。中堂谦吉没有办法，只好托人说情，隆重宴请傅立鱼等有关人士，并当众赔礼道歉。从那以后，野心勃勃的日本帝国主义奴化教育的急先锋中堂谦吉一蹶不振，不久便告老归国去了。

在大连市人民轰轰烈烈地反《汉文读本》斗争中，中国人中也出现了个别无耻的汉奸败类。旅顺宏记绸缎庄店老板王金徽，靠捣卖绸缎与日伪上层人物关系密切。他自称是山东的一个秀才，要求出来当国文教员。被当时兼任旅顺高等学堂堂长的关东都督府民政部长、日本籍朝鲜人百济雄聘为国文教员。旅顺高等学堂薪俸高，就连某些有真才实学的日本人都很难得到，而王金徽竟得到了。王金徽本是一个只有几年初级私塾根底的商人，上了讲台东拉西扯，胡说八道，令人肉麻地为日本帝国主义辩护和吹捧。为了进一步讨好日本人，他还干扰大连市人民的反《汉文读本》斗争，到处游说，题诗。有一次，他陪日本人参拜白玉塔（当时叫“表忠塔”）作诗曰：“悲哉白玉山，山高不易上。上有纳骨堂，堂堂雄气象。”丑态加丑文。越闹越丑；叫人无法再容

忍。于是《满洲报》有署名知非的文章警告说：“先生，一帆风顺，可以归矣！”《泰东日报》有李义田的打油诗“可笑山东老秀才，牛皮吹得响天来，误人子弟该何罪？快快回家抱孩子！”王金徽控告到法院，要求赔偿名誉。当时法院正为中堂谦吉的事懊丧，半路上又冒出这样可恶的一个中国蠢秀才，而且这样不知趣。便以“文学问题，难以判断”回答他，不予受理。王金徽恼羞成疾，病倒辞职，从此杳无音讯。

(三)

《汉文读本》虽遭反对，但日本殖民主义者仍然强行使用。许多学生家长不忍坐视子弟荒废光阴和沦为夷狄。便串联起来又成立书塾，请当地较有名望的教师每天早晚和星期天，讲解诗文和经史。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发生经济危机，教师生活非常艰苦，日本教育当局无暇过问许多事情，所以有的书塾竟能坚持三年之久。

大战结束后不久，日本的经济飞快发展起来，情况就不同了。金州公学堂堂长岩间德也跑到关东厅大肆煽动：“欲灭中国固有之文化，当由教科书始。”日本当局听其言，委其责。让岩间德也联合满铁学务课。于1922年成立了一个“南满洲教育会教科书编辑部”。今井顺治为专职编辑长、岩间德也任中文科编辑主任，今井茂（满铁学务课人员）为主稿委员。聘傅立鱼为名誉委员，一些中国教师为编辑。由初等和一年级起，每年编两册，花六年时间编完初、高等共十二册，称《中国文教科书》。

《中国文教科书》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者愚弄中国人民，并妄想尽快使中国青少年“皇民化”的意图。例如初等科第一册开篇就是。

“驴耳长，马耳短。”

“昨日阴天，今日下雨，明日晴天。”

“姊呼弟，快来看花。”

插图是罌粟花。

又如高等科课本中有一篇叫做《孙文访日本记》，内容多属捏造。插图是一个分不清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的人，在向日本国旗鞠躬。

这样的教科书一经出笼，立即激起全旅大地区教师的反抗。值得特别提出的是，一些正直的日本教师也加入了中国教师的斗争行列。大家商量，决定在西岗公学堂召开“中国文教科书研究会”，那是1928年夏秋的事。参加会议的有中日人士200多人，会开得非常热烈。把个教科书研究会，变成了对岩间德也的声讨会。接连3天大家纷纷质问岩间德也：

“‘明日晴天’是谁规定的？”

“可看之花有许多，为何只看罌粟花？”

日本教师土方省三拍案吼道：

“中国人受罌粟花之害已深，为何还使儿童爱看罌粟花？”

岩间德也故作镇静，鄙夷土方省三：

“土方君：亦知中国人风俗乎？”

于是群众雷鸣般齐声怒吼：

“罌粟花是毒品，中国人最讨厌它，为何说是中国人风俗？”

岩间德也连遭三天围攻，理屈词穷，打不起精神，只好低头认错，答应重新修改《中国文教科书》。于是立即着手编辑《新时代国语读本》。基本取材于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新时代国语读本》，但也不可避免地删除了其中反帝的内容。由初等科一年级起，每年编辑两册。编到高等科一年级时，发生了“九一八事变”，编写工作暂时停止。但教科书编辑机关始终存在着。

#### (四)

1931年，伪满洲国建立。

这一时期，大连市的教育界逐渐被军、警、宪、特严密控制起来，更加没有民主可谈。学校中重大事情的处理，要请示“兵事部”和宪兵队。”警

察或日本宪兵经常闯入课堂“巡视”或“训话”，他们常常把师生们抓走，其中也有日本教师。学校中每日“朝会”（师生们向东方日本所在方向遥拜）完后，就是校长严肃宣读《训民诏书》，最后是校长领教师们讨论学生们的“思想不良”问题。曾有一日本教师竹前因大胆发言说：“中国人爱中国，日本人爱日本，思想不良者何？”当天就被日本宪兵队抓走。

中国人不许说自己是“中国人”或“国人”，必须说是“满洲人”。学校中，师生之间，同学之间，讲话必须用日语。“国文课”改称“满语课”，教师讲授满语课必须用日语。害得大多数中国教师讲不了本国的语言文字课，而日本教师则越讲越不明白，简直是一踏糊涂。课程耽误了不消说，同时造成了语言文字上的极大混乱，出现了所谓“协和语”，即中日语言交错夹杂的一种语言文字。中国学生的作文中，把“春日天气真有趣”写成“春日天气御面白”；“美味”写成“御驰走”；把“出差”写成“出張”等等。

学生家长不愿子弟受奴化教育。有的暗中求人为孩子讲授祖国传统文化，有的鼓励子弟夜半挑灯偷读中文。学生白天讲日语多数语音不清，使人听不懂；有少数调皮学生，故意发错语音，把汉语中骂人的脏话加进去，引得周围的同学掩口大笑，而日本人却莫明其妙。

强迫的奴化教育自始至终遭到大连市人民的反对，借助于残暴的法西斯手段强硬推行的“皇民化”教育，也只能镇压一时的公开的反对活动，却不能压服人们心中越来越强烈的反抗情绪。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侵略别国领土，奴役那里的人民，连当地人民几千年来创造的语言文字都不准使用，这确实是极其残忍和极其愚蠢的。

这一时期大连市的教育情况，大致分为这样两个阶段；二次大战爆发前，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把一般概念的奴化教育，公开推进到“皇民化”教育。学校中的一言一行，都是为了效忠于日本天皇，必须学好日语，杜绝中国文

化，积极为日本霸占全中国做准备。此时，中国师生们的对日斗争，多以心照不宣地互相默契所形成的小规模的对抗形式为主；二次大战爆发，直至日本战败投降，日本由于战线拉得太长，人力物力匮乏，成批征调日本教师入伍参军，中国教师也有许多被迫弃教充任其它职务的。学生轮流“勤劳奉仕”（做苦役），因待遇相差悬殊，中日学生打群架的事此起彼伏，日本教师与中国学生动手对打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出动警察和宪兵也只能镇压一时而维持不了许久，这时奴化教育已彻底法西斯化、讲授科学文化知识的教育几乎不存在了。

但这一时期编写中小学教材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教科书编辑部”这一机构始终存在。由日本人用日文编写，调中国老教师做翻译和其它事务性工作。原旅顺公学堂老教师金纯泰，曾被派出任“奉天市（沈阳）公署教育科长”一年余，托病辞归，被宪兵队拘留两日，又以患精神病名义释放，一年后准予回旅顺公学堂师范部任教。后因厕所内发现“小日本快完蛋”等标语，日本人怀疑是金纯泰等人“作祟”，调金纯泰到“教科书编辑部”工作，只准笔译，不准随便说话。中文科主任是日本人鲛岛宗范，金纯泰从他编写的书稿中译出“日本人稠地窄，物产不足”等语。立即被“兵事部”召去审讯。幸亏鲛岛宗范在物证面前不得不承认是自己的过失，金纯泰才免于追究。在这样的淫威之下，金纯泰、徐贤齐、由忠凯、赵德声、钟敬中五人，花三年时间，翻译完了十二册尽人皆知的《满语读本》。

综观日本帝国主义在大连市推行奴化教育 40 年的全部过程，围绕中小学教材的选用和编写问题所进行的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息过。就中国一方来说，斗争表现前期活跃、中期激烈、后期隐蔽。在斗争过程中，有许多日本文化教育界人士站在中国一边，这说明帝国主义企图从精神上彻底奴化一个国家的人民，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国家的人民，是根本办不到的。

（作者系大连大学工学院社科系副教授）

## 孟天成与博爱医院

王柏怀

孟天成先生是我从医的启蒙老师。先生从事医疗工作六十多年，1986年因胃溃疡穿孔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八十六岁。

博爱医院由先生独资经营，是国人在日本统治下的大连开设的最早的医院之一。先生是本地区家喻户晓的名医。远自东北，山东等地闻名而来求医者大有人在。医院规模之大，名望之高可与当时官办医院相媲美。

先生对辽东地区黑热病的研究成果，为国人在世界医学科研领域争得了荣誉。其中，狗为黑热病中间宿主的发现，更为辽东地区对这一严重的地方传染病的防治做出巨大贡献。

先生出身贫穷，生活一向俭朴。曾云：“我之所以取名‘天成’，乃我出生在仰面可见天日茅屋之故也。”

先生的一生，是为医疗事业奋斗的一生。解放前夕，除在宏济街设有本院外，并在奥町（民生街）、甘井子设有分院。又在大华、圣德街设有门诊所。其在鼎盛时期，仅本院一处，门诊量每日即达二三千人次之多，自备出诊

专用轿车十三台，收入相当可观，已属百万富翁。虽如此，他于解放后的1946年果断地把全部财产捐献给政府。真是一位开明的绅士。当时被任命为医院院长。授予上校军衔。政府派给专车和勤务员。先生的晚年，受到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

先生通晓各种业务，但外科为先生专业，且又擅长于妇产科业务。他的学生在每次关东州厅助产士考试中均名列前茅，赢得好评。博爱医院附设助产学校终于取得官方承诺。准予备案。从此该校学生取得毕业证书者，即有在日本领地行使助产专业的资格。这可以说是先生一生中 fastest 的事之一。

先生孜孜不倦的好学精神，是其成名成家的源泉。他的图书之多，可谓群医之冠。凡他读过的书，在各章字行间，均可见不少批语。

先生曾谆谆教导我们做医生要多看书，多学习，尤其外科医生在术前更要复习有关章节，对不熟练的手术要如此，即对熟练者也不偷懒。只有这样，才可使工作处于不败之地。这是先生一生的信条。同道对他这一倡导倍加赞扬。对此，我受益不浅。

先生好学不耻下问精神最受人尊敬，某次先生参加大连医学会年会，他对其中某青年医生宣读的论文理解不清，当该青年医生下讲台后，先生至其座旁恭敬请教，终至理解。先生已是远近闻名的医学博士，故有人见其求教于青年医生，便对他说：“你都是博士啦还向年轻人请教，不怕失掉身份吗？”先生则一笑置之。他回到医院向我讲了这段经过。用不太流利的北方话说：“这个人不明白想学习，就要不怕害臊的道理。”

先生不但是一位良医，且在医德方面也莫不令人肃然起敬。有一次为某患者摘除肤股淋巴结时，误伤了股动脉，用纱布压进缝合后止住了出血，术后，他坐在患者身旁看了一夜。宜到患者脱险他才回去休息。这个患者后来安全地治愈了。事隔四十多年，现在回想起来，我对他这种高尚的医德记忆犹新。

先生是京剧业余爱好者，对言、马流派，颇具心得。他对《四郎探母》一剧有强烈反感，他经常对人们说：“杨延辉被俘做了驸马是投敌行为。”

以京剧形式流传，有失民族气节。”他每听到手下人等唱起《四郎探母》总是叹息不已。

台湾是甲午之战割让日本的。帝国主义对台湾人民奴化不断深入，还强迫人们将本国姓氏改为日本姓氏，以达同化目的。但先生则以“我是世界闻名学者，改了姓名则有损于我个人声誉”为理由加以拒绝。日本当局无可奈何只好默认。先生事后曾气愤地对我说：“我的血管里流的是中国人的血，就是强迫我改了姓名，我的血也不会变的。”由此可见先生是具有民族气节的伟大的爱国医学家。

（作者系西岗区政协之友联谊

会会员）

## 长跑健将宋长明二三事

温殿文 王运乙

1937年秋，伪满协和会大连分会主办了一次运动会。在大连运动场（今人民体育场）举行。万米越野赛的运动员已出发多时，千万双眼睛盯着运动场的西大门。“第一名入场了！”“是中国人！”。全场沸腾了。当大会宣告第一名的成绩比当时的大连万米越野纪录还快10余秒时，全场又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他，就是当年轰动一时的长跑健将——宋长明。

1917年，宋长明出生于大连南关岭泉水屯的一个农民家庭。弟兄6人，排行老四。他性格倔强，从小就酷爱跑步，特别是长跑。一年到头，总爱光着脚板跑来跑去，练就了一双铁脚板，被小伙伴们称为“飞毛腿”。

1933年，年仅16岁的宋长明，因家境贫穷，托人说情到大连“几久屋”（日本人开设的商行）学厨师。俗话说“三年大旱，饿不死做饭的”。吃得饱了，身体也壮实起来。这时大连丰稔油坊有一姓季的人教他练长跑。从此，他真是冬练三九，夏跑三伏。开始时，腿肚子痛得走路都艰难，还要绑上沙袋子跟着自行车跑，越跑路程越远。从“大广场”（今中山广场）跑到“星个浦”（今星海公园），又延长到黑石礁。往返三、四十里路。一年四季风雨不误。练一段时间跑平路，再专练坡道，常常是跑上一个山头，再登上另一个山头。这种练习一直坚持到1938年他到“满化”（今大化）工作。那时下班后，他把饭盒交给工友，空手迈开双脚，经椒树房翻山越岭顺南关岭跑到后关村，再拆头跑回家。练得他跑平道轻松自如，跑坡道劲头十足。

1935年，“人连市役所”（日本殖民当局市政厅）组织了由五六十名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参加的长跑比赛，宋长明报名参加。这是他第一次比试，也是对他几年来苦练的考验。比赛路线是从“市役所”出发经蔡大岭转折点跑回原地。第一次参赛因为没有经验，老跑外圈，出了不少冤枉力，只得了第九名，亲朋好友为他高兴，认为十名以里就不错了。可宋长明不满足，他暗下决心，瞄准了第一名。

他的愿望终于在当年“满铁”运动会上实现了。1935年秋“满铁”举行运动会。运动员仍然由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组成。他，一个抱定要拿长跑第一的倔小伙，硬是把第一名夺到手。并在1938年和1937年举行的同一运动会上始终保持长跑第一名，赢得了三连冠。为中国人长了志气，在大连体坛上名声大振。

1938年，以宋长明为首的五名中国长跑健儿，组成了“明驼”长跑队。从1938年至1940年间，在长跑接力赛中，连续三年战胜日本对手，冠压群雄。每次接力赛，宋长明总是跑最后一棒，担负冲刺的角色。无怪连日本人都称他是“亚细亚”（意为特别快车，当时大连至奉天特快列车为亚细亚

号)。如今，宋长明家中悬挂的标有“1940年11月17日第16回旅顺接力赛大会合影”字样的照片，就告诉人们：“明驼”没有辜负众望，他们跑在自己的国土上，抖出了中国人的威风；照片中的奖杯还告诉我们，“明驼”是一个为中国人争气的集体，因为只有三连冠才能得到这个奖杯。

1937年，日本人组织了一次“新京”（长春）——“奉天”（沈阳）——大连间长跑接力赛。有长春、沈阳、大连三个地区代表队参加，每个地区又分5个组。整个赛程由15名运动员完成，按累积时间取名次。宋长明被选为大连代表队中全由中国人组成的一个组的成员，完成从沈阳到辽阳这一段艰苦的赛程。

随着一声枪响，他们这棒一行15人出发了。他们你追我赶互不相让。沿途上，引导车、救护车、指挥车川流不息。看热闹的老百姓闻讯走出村镇，有的摇动小旗，有的备了热水，为中国运动员助威。跑了好长时间，渐渐地拉开了距离。宋长明跑在第二名的位置，紧紧地咬住第一名日本运动员不放。离终点还有一段路程，要登船过太子河，过河后，一道沙滩横在面前，蹚着松软的沙土，他累得一点劲儿也没有了，口渴得要命，呼吸紧促，这时那名日本人已将他拉下一段距离。沿途高喊助威的老百姓热情地给他水喝，望着乡亲们殷切的目光，他的热血在往上涌，牙一咬，臂一甩，不顾一切地追了上去。在一段很长的坡道上，他使出了练就的跑坡道的本领，终于把跑在前面的日本运动员拉下了。他越跑越快，越拉越远，日本运动员再也没有追上来。就这样，他为全组的胜利赢得了时间。结果宋长明所在的小组获得了第一名。现在宋长明老人家中还精心保存着当年的奖杯。背面是“新京大连间联传竞争”字样，”正面是篆写的“优胜”二字。

时间荏苒，日月如梭，这些都是半个世纪前的事了。今天，身体硬朗，71岁高龄的宋长明老人，对长跑活动仍然十分怀念和热爱。他说：如果组织老年运动会，他还想比试比试。真是名将雄风长在，争强壮心不老。

（作者温殿文系甘井子区委党校党委书记兼副校长。

作者王运乙系甘井子区政协联络委员会副主任）

## 伪满洲国大臣省长中的大连人

孙械蔚

1932年3月9日，溥仪在长春粉墨登场，出任“执政”，当天下午，根据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指定，任命了一小撮汉奸为“政府”官吏。

1934年3月1日实行帝制，改国名为“满洲帝国”，更年号为“康德”元年，院部头目改称“大臣”，将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分割为14省。1941年增至为19省。即奉天、滨江、吉林、龙江、三江、间岛、安东、锦州、热河、黑河、兴安东、兴安南、兴安西、兴安北、通化、牡丹江、北安、东安、四平和新京（长春）特别市。

伪满满系官吏级别主要有：大臣为特任官，省长（包括驻外国大使）为简任官。当时大连籍大臣有4人，大连籍省长有6人。

大臣4人是：

(一) **韩云阶** 金州人。清光绪二十年九月(1894年10月)生。金州南全书院毕业后去日本留学。1916年于日本名古屋高商毕业。回国后历任山城镇裕华电气和东亚实业公司经理,亚细亚制粉公司总办,亚洲兴亚面粉公司监理,东华金库金融社长。这些公司与日本往来频繁,韩精通日语,又善于经营,因此很得各公司的信任。嗣后,又在哈尔滨当上了哈尔滨取引所(即交易所)和哈尔滨信托公司理事,本职是哈尔滨义祥火磨的经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和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拉上了关系,受日本人之托与赵仲仁同去海伦见马占山,劝马占山与日本人合作,获得日本人的赞赏,被委任为黑龙江省实业厅厅长,不久又晋升为省长,新京特别市市长,经济部大臣等职。

1940年6月任满洲电业株式会社社长。后作为伪满特使去德国,会见法西斯头子希特勒,与德国搞同盟。1945年7月6日被任命为特命战力监察使,对南满各省及阜新煤矿、大栗子矿进行监察。正在锦州监察时,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随之伪满垮台。韩云阶潜回金州,假称病死埋葬,以金蝉脱壳之计出逃台湾,又由台湾去日本,在岸信介等人的帮助下转赴美国。1982年于加利福尼亚州病故,终年88岁。

(二) **阎传绂** 字纫弢,金州人。1895年9月生于官僚之家。先世原籍山西省太原府徐沟县。明末清初来金州定居,后入汉军旗籍为镶黄旗

祖父阎邦鼎,曾任清户部郎中。父阎培和,官名福合,正黄旗校正。养父阎培元,官名福陞,曾任旅顺水师营协领(正三品),1900年6月代理金州副都统。同年7月27日,沙俄侵占金州城,将福陞、协领富伦、同知马宗武等拘于旅顺转赴库页岛做苦役,1901年9月《辛丑条约》签订后,始被放回。

1913年阎传绂官费留学日本。1923年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经济科毕业。回国后，任大连中华青年会副会长、“满铁”嘱托等职。1932年3月历任奉天市长、商埠局总办、滨江省长兼北满特别区长官。

1937年任吉林省省长，1942年9月28日升任司法部大臣。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阎被苏军逮捕，在苏联伯力第45收容所改造五年，1950年8月遣返回国，转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1962年4月病故。

（三）**卢元善**金州人，光绪十四年八月（1888年9月）生。留学日本，1912年于日本仙台宫城县农业学校毕业。回国后，任金州南金书院农业科教员，1923年金州农业学堂成立后任该堂教员。伪满成立后，任伪满军政部高级秘书，黑龙江省实业厅长、民政厅长、教育厅长、专卖总局长。

1939年任三江省省长，不久调升为国务院总务厅次长，一年后任文教部大臣。1945年“八一五”光复后被苏军逮捕，押送苏联境内伯力第45收容所改造五年，1950年8月遣返回国。1959年9月病死于抚顺战犯管理所。

（四）**谷次亨**原名谷嘉年，字次亨。光绪二十四年（1898）生，瓦房店人。留学日本，在东京高等师范毕业。任过满铁嘱托，奉天盐运总局长，本溪湖煤铁公司秘书。伪满洲国国务院人事处调查科长，文教部嘱托，民政部警务司外事兼保安科长，安东省教育厅长等职。他任教育厅长前，日本人对安东（今丹东）教育界人士进行了一次大逮捕；谷到任就召集教育界人士训话，收买人心，进行欺骗宣传。

1937年7月，伪满政府机构改革，谷次亨被擢为总务厅第一任满系次长（省长级）。谷精通日语，颇得日本人信任，他佩戴日本皇室小菊花证章。伪满高层官员中仅有极少数人佩戴此种关东军入门证章。他可以随时出入关东军司令部，汇报高层中国人的思想动态。1940年特任民生部大臣，后又升任为交通部大臣。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他被苏军逮捕，送苏联伯力收容所改造五年，1950年8月遣返后，监禁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后，在长春市图书馆工作，后病死于长春。

省长级6人，他们是：

(一) **姜全我** 字晓峰。金州三十里堡人。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生。民国初年历任依兰镇守使署参谋长,奉天陆军第四旅参谋长,奉天保甲总办公所参议,安东警察厅厅长,奉天省防军团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任安东商埠公安局长,1938年任奉天警察厅长,1939年任新京特别市警察总监,后任通化省长,1943年特任热河省长,1944年病死于故里

姜自己说,他是大老粗没念过书,不会咬文嚼字。他讲话从来不用稿子,开会时,讲起话来滔滔不绝,生动有趣,听者不倦。他在张作霖统治东北时,经常出入大帅府,颇得张作霖和张学良的青睐。他平生最喜欢耍钱,牌九、麻将、押宝、掷骰等,无不精通。

姜任伪满首都警察总监时,日本人对他非常满意。任通化省长时,与通化省次长岸谷隆一郎关系密切,两人相处情同手足。当姜特任为热河省长时,曾向其日本主子表示:誓必竭智尽忠,甘愿肝脑涂地,置生死于度外……并对伪满总务厅长官武部说,自己虽无才无能,但肯豁出命去干,完成使命。自此武部越发信任他,姜与岸谷(随姜任热河省次长)死心塌地为日本侵略者卖命,以应付热河的“难局”。日满军警早就有过西南地区治安肃正计划,但进行多年,终未奏效,日本人想利用姜全我对付我八路军共产党。因此姜和岸谷费尽心机想方设法,以期打开局面。他们多次召开县长会议,收集情报,布置工作。1944年姜在县长会议上长篇大论讲话时,突然昏厥。回故里后经医生诊断为脑溢血,医治无效当年死去。

(二) **王子衡** 旅顺人。光绪二十二年(旧96年)生。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科毕业。

1919年起,任大连《关东报》总编辑。九一八事变前,在辽宁省政府兼谘议,同日本军政各界人物和东北方面的臧式毅、于冲汉、袁金恺等亲日分子皆有联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金银行市涨落波动很大,王对这方面的情况

独具只眼，做了预见性报道。由于王的判断准确，许多钱粮业从中获益非浅，他本人也赚了一笔钱。因此，他的名声大振。九一八事变后，辽宁出现了“奉天地方维持委员会”的汉奸政权，王当时任这个伪组织的秘书。伪满洲国成立后，历任伪监察院监察官，总务厅人事处调查科长，总理秘书官，黑河省省长，产业部畜产司长，兴农部农政司长，协和会指导部长，滨江省省长等职。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在哈尔滨被苏军逮捕，押送到苏联伯力第45收容所改造。1950年8月遣送回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后被特赦。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登载过他写的《九一八事变前后日寇和汉奸在东北的阴谋活动》一文。

(三) **王秉铎** 旅顺人。王子衡胞弟。旅顺师范毕业。王子衡在《关东报》任主笔发了财，供给王秉铎学费，王秉铎考入日本山形县高校后，进日本东北帝国大学（仙台）。毕业后，适值伪满成立，1932年历任伪满民政部理事官社会科长、国务院参事官。民生部厚生司长兼大同学院教官、国务院总务厅统计处长、北安省长等职。哥俩都任省长，这在伪满是绝无仅有的。光复后，王秉铎亦被苏军逮捕，1950年8月遣送回国，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先于王子衡死去。

(四) **吕宜文** 金州人。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生。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工学部毕业。做过《泰东日报》记者，笔名“虬髯”。1932年伪满成立后到满洲国工作，得到日本人的重视，他不但精通日语，对汉文也有素养，特别是好卖弄技巧，博得日满当局好感，逐渐生为总理秘书、通化省长，由省长被任为驻德国兼匈牙利的特命全权公使。希特勒于1945年5月灭亡后，吕回到重庆。经人推荐，竟作了毛人凤的部下，向毛献计献策，得到重用（见沈醉著《军统内幕》第310页）。今生死不明。

(五) **张联文** 金州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生。是民国奉天省长王永江的外甥，和伪满总务厅次长王贤漳是姑表兄弟，辽阳警察学校毕业。历任奉天税捐局长、海龙县长、庄河县盐务局长。1932年伪满成立后，历任奉天省参

议、热河省总务厅人事科长、文教部礼教司心得（代理）、恩赏局长、热河省长、新京特别市长，在日本战败前调总务厅任参事官。1945年“九·一三”胜利后，被苏军逮捕，押送到伯力收容所。

（六）王贤漳 金州人。奉天省长王永江的次子，人称王二公子，在东北大学毕业。伪满时期任总务厅人事处参事官，继升为奉天警察厅长、奉天市长，后被提拔为总务厅第四任次长。日本投降后，王改名换姓，逃到关内。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逮捕，监禁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后在北京就业，八十年代初病逝于北京。

笔者注：本文是根据上述大臣、省长的亲属及后人的回忆，并参照孙宝田《旅大地方轶事》、高丕琨《伪满人物》等书，摘要写成。

（作者系大连51中学教师）

## 咸丰初年的金州

——魏燮均诗歌琐谈

徐天欣

金州，是辽东的历史名城。它风光秀丽，古迹众多，劳动人民在这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但是，旧中国的腐败政治、天灾、人祸，却给这文化的主人带来了悲惨的命运。

清咸丰元年（公元 1851 年），铁岭民间诗人魏燮均曾到全州寻胜，并在幕府中做了两年书记小职。他游览名胜、体察民情，留下了许多咏叹金州的诗歌。这些诗歌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当时金州的地理风貌和人民的苦难生活，充满了爱国主义精神。这是一份难得的笔录。它对我们了解和研究金州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壮丽的河山

金州的河山是壮丽的，它面朝浩瀚的大海，地处起伏的群山。古城、庙宇、凤阁和大自然的奇崖、险谷、海浪、树涛相得益彰，为我们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

魏氏在呕金州野望，一诗中写道。“清秋天气迎，出都见晴晖，地小孤城占，山多大海围。远帆衔日没，高鸟负云飞。”这是诗人放眼环视金州所见。而“野树远依堡，海云低过城，乱帆收夕照，寒角动秋声”（《登金州城西楼晚眺》）之句，则是居高临下有感而发。在另一首感怀诗中，诗人用白描手法，记述了金州的地况和民风：

金州据一隅，大海环三面  
境内多峰峦，平野无其半  
山枯草木稀；地僻民风悍  
星田无膏腴，黄壤黑坟遍  
滨海斥卤生，毗山石砾乱  
土硲苗不肥，禾稼细如线  
丰年尚欠收，而况进荒贱  
加以重赋征，苦累更无算  
睹此瘠土民，令人兴嗟叹

山高海阔，草稀民悍，土地瘠薄，官税重压，诗人满怀对劳苦大众的无限同情，道出了古城的另一个侧面。

金州有许多名胜古迹，诸如龙王岛、响水寺、朝阳寺（即明秀寺）、大赫山、舍身崖、唐王殿（即石鼓寺）、胜水寺、平顶山、石佛洞…等。魏燮均无不亲临游访，吟诗咏叹，盛赞其壮美雄奇。如：

龙王岛。登岛观海，景色最佳，“气度阴晴色，潮喧早晚滥”，“云霞蒸海气，风雨助潮声”。他在《登龙王岛观海》中是这样写的：

到此观沧海，江河皆细流  
波涛空际合，岛屿望中浮  
水滴知龙宅，天晴看蜃楼  
无缘问徐福，何处是瀛洲

观海，不仅可受到大海宽阔胸怀的启迪，而且在夏初时还能欣赏海市蜃楼，发人遐想。

胜水寺。胜水寺在大赫山上，地处险境，风景幽雅。

“风散禅堂磬，云生石鼎烟”。可谓“仙境”。诗人在《游大赫山胜水寺》中描写了他登临览胜的感受：

幽境忽险绝，断崖悬作棚  
石危风欲落，殿压佛能擎  
两膝顿无主，千年终不顾  
山灵创奇格，太觉使人惊

登临此寺很不容易，“路曲绕山足，石多崩马蹄”，欲达目的地得“随云盘石磴，扶树到山门”，寺前“坏塔上寒烟”，“残碑埋落叶”，因字迹模糊，故看不清建于何年代。

石佛洞。该洞在平顶山。洞深数丈，内有大佛。诗人在樵童的引导下，深入洞中，寻奇探幽。在《访平顶山石佛洞》一诗中，记述了他进洞的情景。

深藏幽窟天无缝，我欲探奇不敢行  
中有石佛人不见，樵童导之心尚惊  
手扞石窍侧身入，阴森气逼毛发生  
仿佛肉身坠地狱，浑身都觉寒冥冥  
樵儿教我定睛看，欲神少顷金光现  
跌坐巍巍一丈高，不见佛身见佛面

石佛造形优美，披纱含笑。诗人赞叹说：“我思凿石成佛时，神工巧匠应难施，”对劳动人民在艰苦的条件下所表现的高超技艺叹为观止。

诗人对其他名胜古迹，也均抓住特点进行了吟咏、评价。说响水寺名副其实，寺外有瀑布，寺内有清泉。“岩瀑骇人鸣，颇讶风涛荡……中有冷冷泉，饮之清且爽。”说舍身崖，地险难攀，“危径盘崩崖，俯临涧无底，滴不容马蹄，仄仅通人履。”说唐王殿，“绿荫方丈小，碧瓦琳宫高”，可是这小寺里却有一件重大的历史遗闻：“当年唐太宗，卧病此驻蹕，……”

### 悲惨的生活

金州风景虽然好，但在封建社会里，人民却深受地主阶级的剥削，加之重赋、天灾，民不聊生。诗人在《金州杂咏》、《荒年叹》、《流民行》和《赈灾行》等诗中作了血泪的描述。

老百姓没有粮吃：

阖境所产粮，不敷居民食  
富室乏盖藏，穷闾少家给  
幸有海运通，贩米来邻邑  
商贾每居奇，乃益倍其直  
不惜贵如珠，但息无余粒  
典衣济饔飧，且求燃眉急

丁男啜臄粥，妇女饮其汁  
藜藿尚不充，安有高粱得  
所以蚩蚩氓，苦饥多菜色

如果遇上灾年。那就更加凄惨了。“米罄卖破釜，衣尽卖空箱，哀呼向人乞，冷粥难求尝……取彼屋上草，磨面充饥肠……树皮早食尽，安得藜藿汤？”

老百姓没柴烧：

炊爨无浓烟，城市薪如桂  
非资复州煤，生活难为计  
家家无积薪，况乃遭荒岁  
斧斤困采樵，榛莽鲜荒秽  
山原掘草根，刈草如发薶  
终日不盈檐，釜底炊难继  
薪有甌石虚，卖薪买粗粝  
嗟哉此困民，养生两难济

老百姓没衣穿：

养蚕不栽桑，种树半椿柞  
茧出东西山，户输官税薄  
拮纺织成绸，市布价相若  
富尚制为衣，衣之如帛著  
贫乃易为钱，藉以充藜藿  
金州不产棉，贩自青齐郭  
隔海望丰收，衣寒赖有托

居住在城里的人尚如此艰辛，可想而知农家啼饥嚎寒之苦了。诗人目睹了农村的荒凉景象，一场风灾之后，“秋无露积禾，场圃净如涂。”“大木乃为拔，禾稼摧如绵，纵横卧陇亩，不辨陌与阡。”“农夫咽秕糠，作苦殊无力。”渔民生活尤为艰苦，他们“终年泛波涛，性命轻蔽履…秋深海水寒，沁骨如冰刺，勇泅觅金钱，全家饱蔬食”。渔民的生命不值钱，随时都可能被大海所吞没。

诗人还亲眼看见了人民被活活饿死的惨象：

月黑见磷火，破屋阴风凉  
有子远归来，启户哭爷娘  
爷娘哭不起，呜咽空捶床  
昨宵谁家子，饿倒西邻墙  
号泣彻中夜，枕地黎明殇  
触目惨何极，酸测泪淋浪  
不敢出东郭，断缺尸横冈

### 淳朴的民风

金州人民有着淳朴的民风。他们勤劳、勇敢、节俭、友爱。他们不满黑暗的现实，追求幸福的“安土”和“乐郊”。

诗人在一首诗中写道：“农家恃种田，勤动缺温饱。网产恃业渔，饥寒亦难保，所赖民风淳，俭德以为宝，婚丧每戒奢，衣食不求好。”他们热心教育儿童，“贫家有小儿，勉强供读书”，只要能维持生活，就供他们上学。对老人更是尊重，“宜厚养生道”，所以不少地方“耄耋乃泛常。百岁亦不少”。

人们都保持良好的邻里关系、有人逃荒去，邻居都来惜别，“携家从此辞，邻里走相送。”

金州人民具有斗争精神。与海斗：“翁壮觅鱼鲜，妇稚摸蛤蚶……而苦赴大海，又取鲨鱼翅。”他们对统治阶级抗议说：“入口且难糊，安有输公钱？”下乡的“勘灾官”来了，坐着车子作威作福，老百姓一齐拥了过去，

“嗷嗷如鸿”，“遮道攀辕”。官府不能及时解决穷人的饥饿问题、百姓们愤怒了，向衙门冲去，“灾黎忍饥待不得，拥衙之命喧如雷”。吼声像雷鸣一样惊天动地，吓得“仓皇官吏殊无计”。

诗人在《流民行》一诗中对人民流离失所的不幸遭遇作了更沉痛的描述：

辞家向海滫，千里驰征轮  
路遇尽流亡，遍是金复民  
去岁被灾始，陆续及今春  
络绎载道途，自旦达黄昏  
三五或为侣，十数或成群  
担挑黄口儿，肩负白发亲  
稚子与弱女，前后相追奔  
少妇惨无色，蓬鬓扬风尘  
娇弱缓无力，不胜长途辛  
雪泞黄泥路，水开黑水津  
颓桥行不得，徒涉褰裳裙  
水深寒刺骨，风悲日又曛  
前途有村店，腹馁心如焚  
无资觅投宿，露卧人家门  
天明强登路，儿女哭相闻  
阴云西北来，风吹雪纷纷  
冒雪奋前进，踉跄投荒村  
荒村无舍粥，冻体何由温  
饥饿无人色，羸病行且呻

辗转卖儿女，骨肉生离分  
非不惜骨肉，残命危难存  
茫茫渺无家，痛哭谁怜冤  
睹此惨无状，泪眼惊心魂  
念我方飘泊，骨肉疏天伦  
只身走南北，较彼犹泥云  
恨无百万钱，遍济流离人  
解囊虽薄赠，小惠焉能均  
安得千万厦，庇此哀鸿身

另外，魏燮均的诗还为我们留下了当时金州地方的某些经济、人文信息。诸如“金州不产棉”，有纺织作坊，主要生产“茧绸”。市民已经用煤，煤是从复州运来的。手工业有编织，编织的纱窗，幕府、衙门、有钱人家都用它，“为避群蝇扰，窗糊面面纱。”还有酿酒业、造船业，“登卷新沽酒，满增兴来随。”“家家造小舟，捕鱼日为事。”金州靠海，水运相当发达，“时有锦州、海城、没沟营商船”来金州买卖粮食的。还有青岛，济南来人贩卖棉布的。咸丰元年金州有区社，这是一种行政区划。金州的大好河山吸引了许多文人墨客前来游胜，其中有名画家台湘湄，擅长画梅，“性情雅有爱梅癖，写入图画尽天然。”魏燮均还留下了许多诗文轶事。这些无疑也是我们研究金州历史的重要史料。

---

魏燮均（1812—1889）字子亨，号铁民，铁岭人，咸丰年间府学贡生。他家贫未仕，曾结友笔耕，组织诗社，修补县志，支持义学，考查古迹，对地方文化建设有很大贡献。他工书法，一时地方碑记书丹多出其手，他善诗文，著有《香雪斋笔记》、《梦梅轩杂著》、《荒史纪闻》、《采遗集》、《嗣响唐音集》、《九梅村诗集》，可惜大多均已失传。“此身不为事王侯”，他一生怀才不遇，在贫困落拓中度过。

（作者系岭市文化局戏曲研究所所长。

铁岭市银州区政协供稿）

## 筹集药品器材支援解放战争

社 力 群

1946年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中国人民解放军被迫进行自卫还击。由于国民党政府对我解放区实行封锁，使我军前方和后方战伤医院缺少药品和医疗器械，为了保证对伤病员进行抢救治疗，辽东军区领导指示军区卫生部组织人员去大连筹集急需的药品、器械和动员医务人员支援前线。

1946年4—6月。由辽东军区卫生部部长王布君（黄农）同志带队，杜力群（笔者）、王振国（卫生部材料科科长）、申中一、刘永殿（药剂师）、张惠新（卫生部保健科科长）、王力生（材料科科员）、于龙（来连后任人和行经理）及刘崇柏、叶侠、姜心一、李人光、陈标、宋瑞等人为成员，先后来连。在中共旅大地委的领导与关怀下，积极开展了三项工作：一是紧急筹备药品器材。二是动员医务人员支援前线。三是进行地方卫生建设。王布君同志来连后任大连市卫生局长，我任三三化学制药厂厂长。

1. 没收敌伪药品器材，及时运往前线。在中共旅大地委的领导下，在市卫生局支持下，我们团结本地卫生干部韩国勋（市卫生局副局长），由市卫生局组织人员去没收敌伪药品仓库，然后再将仓库转给我们。有时是我们拿着市卫生局介绍信去直接没收。经过深入调查与反复查找，很快就没收了

200 箱左右的药品器材。经过审查登记。分类包装，全部及时地运往前线。其中 40% 运往辽东军区，其余运往华东军区等地。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封锁，我们从海陆两方面进行运输。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努力，终于完成了这次药品器材的筹集任务，得到卫生部领导的嘉许。

2. 抓紧采购药品器械。为解决战伤救护迫切需要的药品器材，我们一进入大连就抓紧进行这项工作。大连解放初期处于混乱状态，一些贵重药械流入私人手中。经过分析研究，决定采取收购办法。我们迅速成立了三三化学制药厂营业部，并请山东军区卫生部材料科科长孙成仁同志任营业部主任，开设了门市。并动员组织当地药贩 20 人左右帮助采购，收到了良好效果。采购到的主要药品有磺胺 1000 磅左右，碘片 20 磅左右。还有红汞、雷夫奴尔及解热镇痛等药品及脱脂棉、纱布、绷带、胶布等卫生材料，数量也相当可观。但仍满足不了前方的需要。各解放区来连的采购人员也不断增加，要求我们帮助采购药械，因此我们的任务日益加重，但当时大连药械数量有限。我们就充分利用旅大有利条件，开展对外采购业务，加强与国统区上海、天津和南朝鲜商人的联系，采购了一批药械，但仍很困难，客户做药械生意虽然利润较高，但风险大。他们一般一次能提供磺胺几十磅，碘片十来磅左右，一些同情我们的客户，还能为我们多提供药械。这一工作的开展，有力的支援了各解放区。

3. 建立药械生产基地。日本统治大连时期，建立了几处制药厂，有三苓制药株式会社，轮印药品株式会社及卫生材料厂武田分装厂等。最大的制药厂是三苓，占地面积六七万平方米。设有办公室、化验室、注射车间、济散车间、打片车间、清水车间和酱油车间。大连解放时，工人保护了工厂，因此，苏军接管时工厂基本保持完整。1946 年 6 月我奉市政府之命接管了该厂，当时二厂处于极端困难之中，只有部分车间开工，维持开支亦有很多困难。为积极开展生产，加强了组织领导，成立了三个部和厂工会。总务部主任是王力生同志，营业部主任是孙成仁同志，计划部主任是申中一同志，叶侠、陈标做工会工作，我们还动员本地药剂师李师曾、初学魁、谭学升等人参加制药工作。

我们将所存的原料和缺乏的原料及前方急需的药品进行统筹核算，制定计划，确定生产目标。经过组织动员，全厂上下共同努力，特别是工人干劲十足，在困难的情况下，迅速恢复了生产，共生产出 62 个规格，45 种的药品器材，主要有盐酸、胜得龙、三三胃散、三三眼药水（自己研制的）、普鲁卡因及防冻软膏等。有力的支援了各地。同时，工厂又成立了胶布车间，生产胶布 2 万筒，迅速运往前线。

当时药厂工人生活十分艰苦，给生产带来不少困难。为此我们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首先把酱油车间的生产搞起来。这样既能解决市民需要，又能以收入解决职工的工资问题。解放前工人在日寇统治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饥寒交迫，苦不堪言。他们听说共产党是穷人的救星，但过去并没有亲眼看见。于是我们从解放军里来的同志，认真向职工进行思想教育和宣传，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并和工人打成一片，很快就成了知己。因此，当我们提出“开工生产为前线”时，他们便积极响应，并说眼前有点困难算个啥。工人们想了很多办法，他们提出恢复清酒生产。老工人张继香根据自学技能和积累的经验（过去日本技师根本不教中国工人学技术），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战，反复研究，终于将清酒酿制成功并全面开展了生产。工厂又根据工人建议在药厂空地开荒种菜，当年每人分得白菜 58 斤，萝卜 38 斤，茄子 18 斤，野菜干 20 余斤。拉煤渣每户又分得 3—7 麻袋。使工厂既支援了前线，又渡过了难关。

为了适应前方需要，我们还加强了研究工作。当时遇到的突出问题是缺少磺胺、碘片、注射器。起初我们认为大连靠海，可先研究制碘，但由于成本高，技术不过关。经研究决定采取先易后难的办法，先解决生产注射器问题，后解决磺胺生产问题。注射器的生产研究由我负责。第一次和陈永久合作，产品质量不过关。后来聘请了 10 余名技术工人，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建起磨光车间，吹滤车间，包装车间。但质量仍存在易炸问题，主要是原料调

配不当。于是我们又聘请玻璃厂的技术工人参加研制。质量不断提高，日产量也达到 50 支。1948 年 12 月因战备需要，该厂部分迁往沈阳。至于碘胺生产研究，则由申中一负责，经过近一年的努力，也终于研制成功，但因工厂搬迁而没有投入生产。

最后谈谈大生制药厂、黎明卫生材料厂的情况。

大生制药厂原厂长是胡山（华东军区卫生部材料科科长），后任杨洁，杨调走后，我被借调去任厂长。当时，该厂正研究生产乙醚，乙醚是手术中必备的麻药。研制中有三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蒸馏塔的修复，二是料的来源，三是技术力量。经研究。决定由老工人吴自来负责修复蒸馏塔，吴和其他工人一起研究，又取得生产科长刘行继的帮助，使蒸馏塔修复成功。原料问题，市财委帮助解决了工业酒精，又经过多方努力，采购到了金属钠。最后是技术问题，经过多次反复试验，终于研制成功，生产出了千磅左右的乙醚，及时运往前方。

黎明卫生材料厂，原系日本人经营，解放后改为渔网工厂，1947 月 5 月由三三化学制药厂接管。由于前方需要大量的卫生材料，因此上级将原三三化学制药厂、胶布分厂合并成为黎明卫生材料厂。王力生任厂长。该厂生产纱布、脱脂棉、绷带、胶布。当时关键的问题是原料，旅大财委很重视，帮助解决了十捆原棉（每捆 160 斤），十捆粗纱（每捆 183 公斤）。利用这批原料，制造出脱脂棉 1000 余磅，脱脂纱布、绷带 3600 余磅。为前方解决了不少问题。

回忆这段历史，在中共旅大地委的领导下，在王布君同志的指导下，经过旅大医药界的齐心协力，筹集、生产、输送了大批药品和器材。为支援解放战争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作者系离休干部，原大连市卫生局副局长。）

长。）

## 鸦片战争中英军对大连的进犯

曲传林

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8月，英国舰队侵入渤海，多次对辽宁沿海进行骚扰，抢劫牛羊鸡豚食物，强取淡水，测绘海图，居心叵测。英军在辽东半岛抢劫的强盗行径，在《英军在华作战记》中已经供认不讳。在八月“十六日布郎底号、摩底士底号和运输船衣那号起锚，要到辽东海岸的阿斯德湾（指辽东半岛西岸之海面）去取水和阉牛”。“我们希望得到大量的牛，因为我们看见一群一群的牛正在附近吃草。队中开始非常缺乏新鲜食物，尤其是摩底士底号，以前十个月间，船员没有吃过二十餐以上的肉类。”他们看见了牛简直是垂涎欲滴了。英国侵略者“已经看出来，每天晚上牛被关进一个特殊的地方，因此胞诅船长决定去抓抓试试看。早上二时，布郎底号的和我们的小船动身出差了。当小船触岸时，显而易见，中国人已料到有此一举，因为一个明明摆在那里守望的人发出警号。他一发出警号，牛栏打开牛只冲出，四向奔散，显然和它们的主人一样地厌于和我们打交道。被运到船上的只有三头，还有两只小牛，有两三头在他们返回小船的途中逃脱了”。“布郎底号的小船在该船的晚餐时间以后，在南边的一个小岛上（复州交流岛）进行了一次最成功的抢劫。他们一共抢到六十八头，赶快载运，又以类似方式得到了鸭和鸡。”<sup>①</sup>英国侵略者是利用人们在吃晚饭的时候，或者是过半夜两点乘人们正在熟睡的时候进行抢劫，特别是一些土兵把抢劫当成一种乐事，“追擒有翼动物，使青年们很感兴趣。”

除抢牲畜家禽外，对侵略者更为重要的是要取得淡水。“由于我们近来被迫饮用污秽的水”，“我们发现一条美丽的淡水溪奔流入海，溪流恰巧绕过一个峭壁尖端。”“在这里上水的任何大船必须预备软管，以便引溪水入小船。”“这水对于我们就是一种鲜美的飨宴了。”②

英国侵略者在复州湾还发现了煤，这是极为重要的战略物资。“爱尔兰船长在绕过那些海湾的时候，遇见几只装着煤的沙船。他拿走了一块样品，煤块光泽，外形很好。根据他所了解的沙船船员的叙述。他们是从大约三十里以外的煤矿那里弄来的。这很值得注意，日后我们的任何一只轮船可能在北直隶湾中作战，可能这就是供给煤的办法。”③

英国侵略者对辽东半岛先后多次大肆抢劫，自己已供认不讳，而清朝的地方官却吓得不敢照面。以盛京将军耆英为首的顽固派不仅查禁不力，而且面对侵略军的骚扰也是熟视无睹。他们只知奏报，而不准军民抗击。据复州骁骑校吉尔哈布报告：“七月二十四日（8月21日）戌刻，在该城海口，见有来船两只，在八岔沟外洋游弋，因天色已晚，相去太远，未能辨认真确。至二十五日清晨瞭望，委系夷船两只，白色桅篷，船身较大，在二三十里外洋面游弋。”耆英对两只敌船却怕得要命，他认为“该夷船胆敢潜入奉天洋面，恐其船只尚不止此数，若防范稍疏，难保不乘虚而入”。④敌舰布郎底号、摩底士底号和运输船衣那号，在复州湾一带大肆抢掠之事，他们却只字未报，当敌船在常兴岛八岔沟等地，侵扰六天抢劫食物牛羊鸡豚，上满淡水之后，满载而去，盛京将军耆英八月初五（8月31日）才赶到复州。副都统祥厚由旅顺口驰抵复州已为八月初一（8月27日）。敌人跑后他们赶赴现场，提出“必”须严兵防守，以昭慎重”。又提出“惟金州大小海口十七处，兵额七百零八名，分拨瞭望守卡及堵御差使，不敷拨派”。就将“熊岳兵调拨二百名，令其前赴金州，交该城守尉酌拨分防”。“复州娘娘宫海口以北地势，将酌留官兵三百名，协领等官六员，妥为分布安设。并择高阜山岭六处，分置官兵，协同民壮，昼夜轮流瞭望，一经有夷船在洋游弋，饬其遵照号令，迅速驰报，俾知夷人趋向。至复州所属海洋内常兴岛，已札饬复州知州鲍觐堂，酌派民壮三百

名，在岛内常川巡查，以严防守”，⑤耆英等贵族大员们惶惶不安，急忙调兵遣将，并利用民壮（老百姓）为其壮威。

“八月初九日（9月4日）亥刻，据瞭望官兵民壮驰报：是日申刻，又驶到夷船一只，仍在塔山以南外洋抛锚，奴才等当遴委干员前往查探，相机抚御，不敢轻率接仗，如有杰鹜情形，即应率兵痛剿。”

“八月二十一日（9月16日）据常兴岛瞭望官兵等报称。外洋西南约有六七十里，望有大船五只向北行驶，因北风极大，复向南折回。嗣据水师营巡哨官兵报称：二十二日在铁山外洋，见有夷船两只向东行驶。二十三日申刻，复据金州守探委员丰伸及城守尉宝山知县成章瓚禀称：二十三日丑刻，有夷船两只，在小平岛西口停泊。”二十五日亥刻，“青泥洼海口，见有夷船两只，在青泥洼、棒棰岛适中外洋抛锚”。“二十四五两日，夷船复驶至和尚岛、红土崖、棒棰岛，青泥洼、三山岛等处，或游弋、或停泊，形踪无定，忽远忽近，并驾驶脚船，在各口内外，用线系铅坠，试水浅深。”⑤敌船还派脚船在小平岛登岸欲抢劫牛羊食物，见当地戒备森严而未敢行劫。“该夷船在金州海口停泊，胆敢以铅坠试水，逆谋叵测，实堪发指！至夷人内有能通语言者，名为通事，未必不是汉奸。是各处海防，更须倍加严密，以资捍卫。至金州所属大小海口十七处，除水浅滩薄大船不能拢入口内者九处，业经城守尉知县分拨官兵民役，多则十名，少则五名，飭令小心防守，留神瞭望外，其余小平岛、羊头洼、青泥洼、和尚岛、红土崖、大孤山、双岛、龙王塘等八处海口，均关紧要。……该海口非老水贴岸，即距城较近，均应严加防守，方昭慎重。除原派官兵民役外，又于每处加倍拨派兵役十数名，并于扼要之处，安设炮位，责成尉县，常州梭织巡查，不准疏解。再金州各海口，现在分拨官兵四百名，民役一百五十四名，乡勇一千五百三十三名，统计兵役乡勇共二千零八十七名，声势尚属联络。奴才复将所调熊岳官兵二百名，酌分两营，于金州城

南距红土崖海口八里之了国寨（即丁官寨）地方驻扎。以为各处应援。”<sup>③</sup>在旅顺水师营等处，详勘该营水师尚属整齐，”水师营有官兵六百名，水手百名，战船十只，足资巡哨守卫”，”缉拿海洋盗贼，是其专责，若驱之攻击夷船，恐难制胜”。“旅顺旧建砦台三处，皆在山巅以上，今经协领德钦贺于临岸新建炮台一座，亦属扼要。”<sup>③</sup>

正当辽宁军民同仇敌忾，积极备战准备痛击侵略者之际，在清廷中以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直隶总督琦善、两江总督伊里布为代表的顽固派贵族积极主张妥协投降，尤其 1942 年 8 月 29 日，清政府和英国侵略者在南京签订了 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后，使辽宁军民的抗敌热情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南京条约》签订后，美、法等侵略者趁火打劫。1843 年 7 月，美国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1844 年 10 月，法国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等。从此中国的社会性质便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步一步地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广大地区的侵扰更为猖狂。

1856—1860 年，英、法在俄、美的支持下，联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军为了攻占天津和北京，封锁渤海湾，对大连湾实行军事占领，给大连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次战争对东北所造成的后果，比第一次鸦片战争更为深刻、更为严重。

1860 年春，英法政府任命额尔金和葛罗为全权代表，率领英法联军，又一次杀奔中国而来。这次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进攻北京。为此英国舰队司令何伯，在香港命特务船（名为商船）萨普林号船长韩思德到辽东来寻找一个停泊舰队的锚地和陆军的屯营地。韩恩德率特务船在辽东找到了天然的港湾大连湾，韩恩德对此进行了测量绘图，根据当地人的俗称把这一大湾称为大连湾（DaTianwan），英军占领大连湾后又测绘一份详尽的大连湾地图，即约翰·瓦特司令在《阿库勒号》、《德伟号》士官的协助下，在辽东半岛一带及渤海湾，经过详密测绘制成的海图。在此图中把黑咀子改称维多利亚湾（以英女王名命名），改红土崖为韩思德湾（以间谍船船长命名），改小孤屯湾为贝尔湾，改大鱼沟为布斯塔特湾，改大孤山湾为奥甸湾，改旅顺口为亚瑟港，

改复州湾为亚当斯湾，把金州大和尚山改为马温特·沙姆森（圣经上的伟人），把大连的山山水水都给按上一些英国的名称。

1860年5月，英军侵入大连湾，陆军由古兰德统帅于湾北大孤山湾登陆，英国舰队在何伯统率真驻扎于今大连港处水域停泊。与此同时，法国舰队在谢尔纳率领下占领烟台芝罘岛。6月初英法联军封锁了渤海，完成了进攻天津和北京的准备部署。

英法联军在渤海洋面，大肆抢劫来往的中国商船，“沿途拉有沙船三十余只，卫船四十余只”。<sup>⑨</sup>江南商船金永康等于山东洋面被劫，带到和尚岛。莱州府掖县商船兴连盛（船名）被劫，船户杨振声、李发增声称：“闰三月间由上海装运漕米一千零八十石。四月初六日（1860年5月26日）行至威海城山头，被火轮船截抢，带到此口”。<sup>⑩</sup>上海船户金锡蕃、高畅堂、顾永昌、陆缤彩等称：“均由江苏领运漕米赴津交卸，回空至没沟营装载出口，行至山东洋面被劫。”江苏沙船邢继周供：“由上海装载货物。行至岑山洋面被劫。”天津卫船王天成称：“由山东贩卖豆石完竣，欲赴牛庄装载，行至外洋被夷船抢劫二千一百两。均带至和尚岛口外停泊。”<sup>⑪</sup>据金州协领同知详称，讯明被劫漕船八只，“共计装运漕米一万一千八百余石，行至山东洋面，先后被火轮船抢劫，各船水手惊跳水者五十七名不知下落。该夷将船带至金州海口连漕米货物一并扣留，仅放船民人等登岸。其秦卓然等商船十二只，亦在洋被劫”。“惟该夷劫抢漕米，摠掠商船，凶悍已极，情殊叵测。且侦知青泥洼系荒僻处所，向不设炮驻兵，遂将所劫船只带至该处，窝留改造。”<sup>⑫</sup>英军将抢劫的民船，加以改造，船身涂上白油，准备带赴天津打仗。英军使用抢劫的漕米以补军需。

1860年5月，英军海军舰船一百余艘，陆军一万余人闯进大连湾。据盛京将军玉明的奏报“现在分泊各口之火轮船：计骆马山一只，红土崖十一

只，大孤山二十六只，小孤山十四只，大鱼沟三十二只，青泥洼四十二只，羊头洼一只，以上七处共分泊轮夷船一百二十七只。外有前劫商船二十一只，均在黑咀子湾内停泊。”<sup>(13)</sup>英军陆军一部驻扎大孤山，一部驻扎小孤山，一部驻扎青泥洼，“又在青泥洼口岸，占据民房十余处，并于王家屯、白石洞、东寺儿沟等处，添搭帐房共三百余架，夷人登岸者约三千余名”。<sup>(14)</sup>在大孤山、小孤山、二道河子等处“前后共搭帐房（军用帐棚）一千余架”。英军占领大连湾，肆意劫掠，骚扰百姓。“该夷登岸，将东寺儿沟民房拆毁多间，搭盖帐房五十余架，燃放枪炮。又在白石洞挖池取水，池旁搭盖帐房十数架，且于附近村屯抢掠牲畜”。<sup>(15)</sup>他们动辄“骑马持械抢掠牲畜食物，且在居城切近之三里庄山上用千里镜窥看城地”。<sup>(16)</sup>“于青泥洼海岸空演阵式，白石洞山前演习马队”。英国军舰在海上也是横冲直闯，“燃放炮位，惊骇乡民”。<sup>(17)</sup>由于英军骚扰；老百姓有的弃家迁移，富庶繁荣的大连湾变得一片荒凉。一个英军的翻译官，在他的《华北战争记》中说：“当我舰船初进港时，陆上土著人多带财物遁走。今来村落，不见留有一鸡一犬。”<sup>(18)</sup>

在英国侵略者肆意践踏我国领土，侵犯我主权时，清朝的地方守疆吏们却吓得魂不附体，当时清廷正集中全力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大批军队调往南方，东北边防十分空虚。金州副都统希拉布得知英军北犯消息，立即呼吁盛京将军派兵前来支援。玉明东拼西凑，从省城调兵五百名，从辽阳调兵二百名，从熊岳城调兵三百名，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畏敌如虎的清廷，对侵犯大连湾的英军，采取妥协求和的方针。并对金州副都统“密投机宜，剀切传知该都统希拉布，钦遵恪守，严饬兵勇，非夷人大队登岸，不得遽行开炮”。<sup>(19)</sup>并让希拉布“遵派明干要实员弁，前往询问，拟以金州并非通商换约之处，婉言劝谕，善为开导，令其回船迅速驶去”。<sup>(20)</sup>可是敌人是不会自动放下屠刀，不听什么“婉言劝谕”的，对敌人只能用斗争、用刺刀去劝他们才会奏效。

同畏葸退缩的清政府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大连人民不畏强暴，他们奋起保卫自己的家园。英国侵略者登陆以后，便发现此地居民“保留最多的为五、六尺长的长枪，枪身都已生锈，无夺目光彩了，但放在你的面前，自然会使你感到不快。问他们这有何用处，答曰：此处有野狼出没，为防狼残害家畜”。

“土著人对征收食物甚为不悦，不与其他一切军队方便。将校散步到土著人村落时，村民以为强征食物者来此，于是便迅速集合起来表示百般反抗，动辄持长枪威吓将校”。(21)从侵略者的这些自供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地群众不畏强暴的斗争精神。这一点连清朝的官僚们也不得不承认，“且夷人畏百姓，甚于畏兵。”有一次英军舰侵入旅顺口与羊头洼，“登岸抢劫食物，该二处乡民，聚集二三千人，持城喊逐，该夷惊窜回船，即刻驶出口外，不敢登岸”。(22)再也不敢来此地侵犯。

由于大连人民“聚众抵御”，激烈反抗，使英军“牲畜食物渐难抢掠”，粮秣供应日益困难。为了欺骗群众，打开僵局，英水陆军司令何伯与古兰德会衔发布一通告示，说“现在本国兵丁暂住于此，并无害民之意”。“地方乡民知悉，各宜放心照常生理，守业安居，勿庸惊惧搬迁远避”。“乡民若有牛、羊、鸡、鸭、猪、鱼、果、菜、稻草各等伙食及牲口草料，随时带到粮官局所售卖，均按时价付给，断无强夺之理，并令伊等来往平安”。(23)但是，大连人民早已看穿了敌人的诡计，誓死不与他们交往。驻青泥洼的英军原打算就地征粮，但由于当地人民坚决抗拒，一粒粮也没征到。”于是司令官派一队武装士兵至各村落谆谆游说，收效甚微。粮食依然由澳典湾辎重局供应”。(24)大连人民誓死保卫家园的斗争，给英国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但第二次鸦片战争，由于清政府屈膝投降，被迫与英、法、俄侵略者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

注：

①②③《英军在华作战记》《鸦片战争》第五册 84—88 页

④③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第一册卷十四 454 页

⑥⑦⑧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第一册卷十五 497—490 页

⑨《署理钦差大臣薛焕奏探闻英法兵船北驶，英夷等将来沪现在筹办情形折》

⑩盛京将军玉明《漕船在山东洋面被夷船劫抢折》

(11)盛京将军玉明《夷船劫留商船折》

(12)玉明《查探金州海口夷情并讯取被劫船户确供折》

(13)(14)(20)(22)盛京将军玉明《续报金州夷情折》

(15)盛京将军玉明《金州续到夷船调兵防守折》

(16)玉明《金州夷船出入无定并拿获奸细等折》

(17)玉明《金州探报英船游戈停泊情形片》

(18) (21) (24) 罗拔特·孙霍《华北战争记》于明节译自《大连市史》

《大连文史资

料》第二辑

(19)玉明《遵旨传谕希拉布严防并金州续夷船情形折》

(23) 英军告示《第二次进片战争》第二册

(作者系市政协委员，旅顺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 回忆王化一伯父

王多闻

在我的青少年时代，无论在政治上、思想上乃至伦理道德上，对我最有影响的人物是冯玉祥将军和王化一伯父。（1984年我曾写过一篇《与冯玉祥将军相处的日子》，发表在同年12月16日《大连日报》第3版上）

我和化一伯父分别40多年了，但是他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1986年2月16日，化一伯父的长子、现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系主任王森给我来信说：

……家父王化一早在1965年即病故，生前在中央内务部任参事，去世时中央内务部主办追悼会，骨灰至今仍存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四人帮”倒台后，中央组织部和中央调查部专门发了文件，充分估计了他对党的贡献，明确了长期做地下工作的身份。你得知此事想必也是高兴的。

是呵！化一伯父不计个人荣辱，不顾个人安危，长期为党从事地下工作，得到了党的充分肯定，我怎能不高兴呢！此时此刻，我情不自禁地怀念起他老人家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谆谆教诲。我原名王谅，王多闻便是化一伯父为我起的，那是为了使我避免继续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迫害。

—

1941年3月26日，我参加了当时座落在四川自流井的国立东北中山中学的学潮，5月下旬，被开除离校送至重庆青木关“战区来渝学生进修班”，以待暑后分配其它学校。8月14日下午，我与一位女同学徐文茂突然被捕，她也是闹学潮和我一起被除名的。我们被押在歌乐山下的新桥。两个多月后，我又单独被解往重庆两路口川东师范（“中统”在这里临时押人的场所）院内。不久，和我押在同室的新疆学院的十余名大学生被解往我原在押的新桥

集中营。偌大一间“囚室”只剩下我一人，只有一名看守偶而来看视。为什么要把我单独押在这里并对我优渥有加呢，

大约十天后，看守交我一封敞口的信，是父亲写给我的。大意是：

你事既已如此，可安心等待。有就承认，没有不可强认。如要找保，在教育界有白玉山，现在沙坪坝中央工业职业学校任教，政界可找王化一，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这封信无疑是说，我将可以取保获释了。白玉山是我表叔。王化一是我父亲在奉天两级师范时的同班同学，虽无往来，我也从来见过，但他的社会名望，特别是作为东北名流，在东北青年中还是颇有影响的。

果然，大约一星期后的一个晚上，那位看守径自把我领到王化一家。这一骤然的出现，使得王家的伯母等都非常惊讶，但立刻就意识到我正是他们要寻找的人。未谈上几句话，伯母便取出化一伯父的印章，盖在保人的栏目内，稍停一会，那位看守十分礼貌地告别并把我又带回“囚室”。第三天午饭后，我终于被释放了。离开集中营时，一位麻面的特务告诉我：三个月内不能离开重庆，随传随到。这当然是一句非说不可的多余的话。

晚间，我第一次看到了王化一伯父。他非常耐心地听我述说自学潮以来到被捕的大致过程。听后他叹了一口气：实在不象话。你就住在我家里吧。

这已经是十一月末了。从此我和化一伯父以及他的一家人，结下了深厚的终生难忘的情谊。

## 二

化一伯父家住重庆中二路 133 号三楼，这房子的楼梯就是外面沿山路的石阶，三居室。除伯父、伯母，还有一个弟弟，三个妹妹和一个姥姥。大妹王鑫，小我四岁，在南开中学初中读书，住宿；弟弟王森，时年九岁，在巴蜀小学四年级上学；另外两个小妹妹还都不懂事。伯母崔石甫是位很有才华、很有学问的人。他们都同情我、喜欢我，视同家人，我们相处得十分和谐。化一伯父时常说：你就和我的亲侄一样，等将来回东北过我 50 岁生日时，好好庆

祝一番，你是一定要参加的。他那年 42 岁，我是在集中营中刚刚度过 17 岁的生日。这番话至今言犹在耳，倍感亲切。

这个家每逢星期六王鑫回来就更热闹了。她和王森都是我的最积极的小听众，我们天南地北的闲聊，她们都赞同我的“激进”观点。难能可贵的是，化一伯父也经常参予我们的议论，他从不因我言辞过激而训斥我。我订了一份《新华日报》，他知道后也未阻拦。从此，我更了解他了，他老人家的形象在我心目中越发高大起来。

在那些难忘的日子里，经常有同学到王家来看我，刘书馨、盛传哲几乎每天晚上都来（他俩在附近税务局做“录司”）；和我一块被捕的徐文茂获释后，也常来看我；刘忠诚竟然和我一起住在王家达半月之久，此外还有戚兴中等。这些同学都是和我一样因闹学潮而被除名的。化一伯父对待我的同学不但不厌，还常在一起聊天、一块儿玩，王家伯母和弟妹们也是这样，从无闲言。往事并不如烟，历历如在眼前，每当忆起这段日子，我便沉浸在极度欢快、幸福之中。我当时还不大懂事，后来才想到，自己住在王家，已是负担，怎么竟还让自己的同学也住在王家！当然，就此亦可看出，化一伯父这一家人，该是何等敦厚！何等热爱家乡子弟！

这个家庭是欢快的，有时歌声四起，有时也唱起二簧。王鑫、王森和我都是京剧爱好者，王鑫还是南开的小歌唱家。我教王森唱过一支歌，调好曲也好，所以王鑫和伯母也唱，以至化一伯父也学会并跟我们一块唱了。歌词是：

我有恨在九月秋，我有泪向腹中流。我有仇，报 仇，报 仇，报 仇！三千万的同胞等待我们救，千万方的失地等待我们收。父母，兄弟，庐舍，田畴，不堪回首。说什么功名富贵，讲什么好景难留。一切都非我有，一

一切都非我有。起来，起来，把敌人打退！起来，起来。把强盛赶走。把旧恨新仇一笔勾！把旧恨新仇一笔勾！

这词是我在东北中山中学时的语文老师郝御风先生写的，曲是音乐老师马德馨作的，马先生和我们一块离开了学校，他现在已是台湾的知名画家，更名马白水。郝先生前年已在西安作古了。

三年前，王森弟在给我的信中还提到了这支歌：你唱的‘我有恨在九月秋’一歌，至今我还能唱。一晃过去了几十年。”

几十年前的往事，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常常回忆起化一伯父和我们一起玩、唱、下棋的情景。当时我们最喜欢的游戏是“猜成语”。这种游戏要五个人来玩，即四人于室中出一成语，如“顺水推舟”之类，另一人在室外等候传呼，待成语选妥后，再传室外人进来，他可以向室内四个人各自随意问一句话，这四个人回答时必须把成语中的四个字依次纳入，如“唇亡齿寒”、“高朋满座”等等。猜对为赢否则算输。伯父最喜欢这种游戏，只要他在家有闲暇时间，一定要参加的；伯母、王鑫、我、我的同学和家中来的客人都乐于参加这种“智力测验”。给化一伯父出的成语要难些，通常都是伯母出题，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出的是“瑕不掩瑜。读小学四年级的王森也每每参加，他人小知识面可不窄，这当然是和伯母的教育、熏陶有关。1986年夏王森来大连看我，深夜促膝谈心还追怀这段往事，还谈到他把“大失所望”说成“大所失望”而引得满屋哄堂大笑的故事。

化一伯父重感情，也非常注重民族传统中的“礼节”。有一天傍晚，伯母告诉我今晚有客人来吃饭。客人是从抗日前方来渝的中将军长王理寰（粉碎“四人帮”后，是辽宁省政协第五届常委）。关吉玉、王维哲作陪，我代表父亲王汝达参加这个小宴。关吉玉当时是国家税务总局局长，“九三”胜利后出任国民党粮食部长，后去台湾；王维哲现在北京，已88岁高龄。他们都是在师范时的同班同学。那天晚上特意做了东北火锅。这些40刚过的中年人，在席前谈起同窗共砚的情景，思念劳雁纷飞、天各一方的朋友；或谈及前方的战事，或讲些个人得意和失意的事情。无拘无束，意趣绵绵。王理寰伯伯等着我代表父亲坐在席前，也都问这问那，倍极亲切，直到晚上快10点才散去。

山城的冬天也是比较寒冷的，但我的心却是暖烘烘的。这一夜我竟辗转反侧。我懂得了友谊之可贵；我明白了生活中的许多道理；我顿觉自己长大成人了，因为我受到了“尊重”。

在重庆王家这段日子里，有许许多多难忘的往事值得我回顾。前文说过，曾有不少同学来看我，不仅如此，我每天几乎都要收到一、二封信。日子长了，化一伯父似有所思并有所担心；这不惟是担心，实则是一位父辈的亲切关怀。有一大晚上，他给我讲了一篇古文。篇名是《马援诫兄子严敦书》。这篇文章重点段落是。

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原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原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礼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

潜移默化，谆谆教诲，令我终生难忘。似乎是受到了启发。伯母崔石甫此后也在闲暇之时给我讲过几篇古文，还能记住的几篇是：《滕王阁序》、《阿房宫赋》、《捕蛇者说》。她不但讲得生动、风趣，还教我怎样朗读古文。

我是以子侄的辈份在化一伯父家生活的，接触的大都是生活琐细之事，但，恰恰是这些“琐细之事”才看出来他的为人，他的意趣、品格和政治情操。他从不和我们谈他的工作、社会活动，我们也从来不问似乎无形之中“约法三章”。

在王家，我有幸认识了两位东北名宿——高崇民和阎宝航。他们都是化一伯父的好朋友，在重庆时。他对高、阎两位前贤多有关注，时有馈赠。我和王森几次去过“重庆新村”阎家，我们送过信，也送过煤。此后，我也聆听过阎宝航前辈对我的教益，1945年“较场口事件”的当场详情，就是他在刘希

古叔家亲口对我说的，愤慨万分。高崇老家住化龙桥，我没有去过，但他每次来化一伯父家对我都时有教诲，激励我奋发向上。“九三”胜利后不久，高崇民担任了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阎宝航担任了辽北省人民政府主席。这大抵就是我对化一伯父的政治态度的了解吧！

1942年3月末，母亲接我回昆明求学。临行前，化一伯父在我的纪念册上写了一个大字。“忍”。告诫我遇事冷静，不可莽撞，能忍则忍，不做无谓牺牲。石甫伯母也给我写了临别赠言。她鼓励我的爱国热情。叮咛我深刻地去认识社会，写了一满篇：最后她还写了“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两句做人入仕的道理。

人生如白驹过隙，半个世纪匆匆流去。化一伯父逝世已25年了，25年前，我无法表达自己的沉痛之情，都是无可奈何的憾事；本想去北京看望伯母，可谁料想1988年10月她老人家竟也离开了人间。王森来信告诉了我伯母去世的详细经过，曾提到：

“……丧事的料理都很顺利，阎明复、高存信（高崇民的儿子）等老友都来家探望。……

信里最后说：

“你要写一篇回忆父亲的文章，我很高兴。因为你是最有资格写这样文章的人。……当然，我又想起了母亲，如果她老人家还在，一定会非常高兴地帮你回忆往事。我想，你写成这篇文章，也可算是对她一份厚重的奠礼了”

我的这篇回忆文章，正如王森所说，它不仅是对化一伯父的悼念，也是对石甫伯母的一份厚重的奠礼。遗憾的是我没有写好，还有一些往事被遗忘了，我深感内疚。

初稿写就，掩卷而思。我突又想起了1942年初的那一场大雪，山城披上了一层银装，这在重庆真是百年不遇的。那一天傍晚，化一伯父、伯母、王鑫、王森和我，还有我的同学刘书馨，都在户外的草坪上，手里攥着晶莹的白雪，看枣子岚垭一带万家灯火，雀耀、兴奋，……那场面真令人陶醉。我们仿佛听到了白山黑水的传说和松辽平原的故事，我们仿佛回到了故乡。如

今，除王森和我，他们都不在了。我已满 65 岁，王森也 58 岁了。我似乎又想起了什么。……

（作者系市政协常委，原大连市图书馆文献室主任）

## 纪念抗美援朝四十周年专栏

编者按 今年 10 月 25 日，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四十周年纪念日。抗美援朝期间，我市人民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在军工生产、救护伤员、干部输送、报名参军和支前运输等诸多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本辑特编刊一组这方面的史料，以资纪念。

### 中山区人民的抗美援朝运动

中山区党史办

一、掌握思想动态，普遍深入地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宣传教育

抗美援朝运动一开始，就引起了中山区各界人民的普遍关注。并纷纷投入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运动中。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识还不尽统一。在相当一部分人中，有的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认识不够深刻，或者认为与己无关。漠不关心；有的盲目乐观，掉以轻心，认为帝国主义不值一打，只要中国出兵，它就很快完蛋；有的害怕朝鲜战争会引起世界大战，殃及中国，招来美国的原子弹；有少部分商人对美国抱有幻想；有的党员经不起战争考验，想“临阵脱逃”。为了统一全区人民的思想，区委结合旅大市委印发的宣传提纲，通过区人民代表大会、“七一”、“八一”、“十一”等纪念活动和其他各种会议，对全区人民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宣传教育。各厂矿、企业、机关、学校和街坊也结合本单位实际，分别以报告会、演讲会、控诉会、文艺演出、看电影、黑板报、有线广播等形式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通过宣传教育，基本上达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在提高广大人民群众政治觉悟和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区委又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以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热情，进而形成了一个全区性的反美浪潮，广大人民群众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全力支援前线，保家卫国，誓与美帝决战到底。

## 二、扩充兵员支援前线

1950年11月1日，区委召开了所属单位的支部书记会议，由区委书记做了全面的部署和动员；会上讲述了扩军的意义和征兵工作方法、步骤。要求大家按征兵政策办事，不准放宽条件扩大征兵范围，强调在征兵过程中一定要加强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想教育。11月8日，区政府召开了各坊长会议，区长结合宣传材料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强调征兵工作一定按有关政策或规定办事，不能为了完成征兵任务而发生任何偏差。会后，各单位普遍召开了党、团员、积极分子和有关干部、工作人员会议，号召共产党员、青年团员要起模范带头作用。接着又在群众中反复宣传了扩充兵员、支援前线的重大意义。通过宣传，激励了广大青年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革命热情。许多适龄青年纷纷

向组织递交决心书、保证书，有的单位还进行了应征入伍的挑、应战活动。在青年党团员的带动下，迅速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应征入伍运动。仅劝业工厂就有二百余名青年报名，中山区消费合作社也有三四百名青年报名，其他单位的报名人员也十分踊跃。经组织批准，全区 145 名青年在 11 月应征入伍。到部队后，又通过多次复检。最后正式收留了 109 名。其中男兵 99 名，女兵 10 名。1951 年初又有 269 青年应征入伍。以后又相继向朝鲜前线 and 边防武警部队输送了大批兵员。

每次新兵入伍前，区里都在区文化馆召开隆重的欢送大会，以表达全区广大人民的心愿，鼓励他们奔赴前线，杀敌立功。应征青年也一再表示一定不辜负全区人民的希望，决心同朝鲜人民军一道抗击美国侵略者。

### 三、坚决相信和依靠群众，完成各项战勤任务

群众路线是我党的生命线。只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才能把一切事情办好。通过普遍深入的宣传朝鲜战局和战勤工作意义后，使广大人民群众的反美决心变成了参加战术工作的具体行动。各机关、团体、工厂、企业、街坊、学校的人民群众。都纷纷报名要求参加各项战勤工作。仅 1950 年 11 月份，就有 430 名战勤人员赴朝参战。其中有汽车司机和助手及学员 26 名，接待员 15 名，修理工 5 名，炊事员、护理员 35 名，担架队员 359 名，超额 10 名完成了市下达的赴朝战勤人员任务。

在旅大市战伤医院筹建时，区委先后发动群众捐赠木材等各种物资 123 种，3553 件。派出汽车 2 辆、马车若干，担架队员 1265 人和其他人员共 3465 人，负责伤病员的运送工作。还派出女工 1365 人到医院护理伤员，拆洗被褥、清扫院舍、烧水做饭等。建立了军鞋、被服厂和 11 个军服加工点，赶

制军服、军鞋送在 frontline。1950 年 11 月 26 日统计，5 天内就完成军被 150 床，军用白衬衣裤 1500 套。1951 年完成被服 158497 件、军鞋 14640 双。而且数量、质量日趋提高。如做军用鞋底。由开始每天的 80 双增加到后来的 102 双，合格率由 62% 提高到 93.1%。

除了组织集体完成战勤任务外，还根据《东北区战勤动员暂行办法》和《旅大市战勤动员暂行办法实施细则》以及本区的具体情况，对战勤工作实行了零工制度。区规定每一位适龄男性公民每月必须出勤 3 天，有特殊情况的不少于 2—1 天；女性公民，由有关单位组织统一编号，根据工作需要，定期轮流出勤。据不完全统计。全区仅 1951 年就服勤 18217 人次。

为了前线战勤人员安心工作，其家属享受优抚军烈属的同等待遇。区委经常组织人员深入其家庭了解情况，对他们进行时事宣传，发动群众对他们互济、互助。帮助解决其实际生活困难。如战勤人员谢洪盛的家属有病时，群众自发的照顾其起居饮食，政府免费治疗。

#### 四、响应抗美援朝总会“三项号召”，重点做好捐献和优抚工作

1951 年 6 月 1 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号召全国人民普遍开展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及优待烈军属三项运动。区委领导全区人民在普遍制订爱国公约的同时，重点抓了捐献飞机大炮和拥军优属工作。并使拥军优属工作制度化、经常化。

为了向朝鲜前线捐献飞机大炮，各厂矿、企业开展了积极生产、增值创收的增产节约活动。工商界以提前纳税或义卖等实际行动进行抗美援朝，用所得的部分资金捐献飞机大炮。各机关、学校、居民也积极参加了捐献活动。有的老大爷、老大娘把儿女给的零用钱或买菜省下的钱用以捐献，有的小学生把父母给的零花钱和过春节的压岁钱也献给了国家；有的居民把金戒指也捐献出来用以购买飞机大炮。不少居民委还月月定期定额向国家捐献。如胜利桥坊的居民委就每月向国家捐献 30 万元（旧人民币）。由于人民群众的自觉捐献行动，使全区顺利地完成了捐献飞机大炮的任务。

拥军优属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前线将士的情绪和政府在对烈军属、荣复转业军人心目中的威信。为了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优抚工作，根据上级指示精神 and 中山区第一届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决议，建立了中山区拥军优属工作委员会。各街、坊、厂矿、企业、学校由 9—11 人组成基层委员会。其任务是：①贯彻执行拥军优属政策，密切军民关系，加强人民团结。②经常了解烈军属、战勤人员家属、荣复转业军人在工作、生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发动群众互济、互助，帮助其解决各种实际困难。③经常了解广大群众及烈军属、战勤人员家属、荣复转业军人的思想情况，不断进行政治时事的宣传教育，提高其政治思想觉悟水平。④根据上级拥军优属工作的指示。随时组织群众对烈军属、战勤人员家属、伤病员、部队、荣复军人进行精神或物质慰问。⑤组织群众给予战伤医院、驻军部队在工作、学习上更多的支持和方便，并大力做好支前工作。全区人民在优抚工作委员会的组织下，开展了广泛的群众性的优抚工作。

1951 年春节期间，全区组织了 26 个秧歌队和第七完小的学生一起，由区妇联和各坊、派出所领导带领，冒着严寒，敲锣打鼓，扭着秧歌分别到烈军属、荣复转业军人、战勤人员家拜年、送彩灯。从农历 30 晚上 5 点开始至晚 8 点才告结束。先后送烈属彩灯 2 盏；军属彩灯 271 盏，荣复转业军人彩灯 72 盏。在拜年、送彩灯的过程中全区锣鼓喧天，好不热闹。正月初一又由区委、区政府和区团委组成 4 个组到 19 户烈军属及功臣家拜年。初六在文化馆开了军属联欢会，会后演出了《据大缸》、《准备渡春荒》等文艺节目。在节日期间，还向烈军属发了澡票、电影票、话剧票、年画等，并发给了大米、白面、猪肉和现款 140 万元。明泽坊 29 户军属王振寰激动地说：“我在 48 年春节因生活困难，差一点吃不上饺子，今年可不同了，政府又送东西又送钱，还发给了我一个经营摊贩的票证，生活有了保障，我打心眼里感谢党和政府。民

乐坊 28 间军属李海夫妇说：“我家 6 口人，48 年开始起只有一个人干活，每天连豆饼坯都吃不上，现在比过去强多了，政府过节又给了这么多东西真使我们全家感谢不尽了。”在军属会上，解放坊陈歧山老大爷发言说：“现在咱们是一家人，和政府要团结一致。大家一条心，协助政府克服一切困难，我经常鼓励我儿子说不要顾虑家庭，在前方要努力工作，家庭有政府照顾。”

从 1951 年春节，群众敲锣打鼓扭着秧歌给烈军属、荣复转业军人拜年送灯以后，不仅提高了军烈属、荣复转业军在群众中的政治地位，而且还渐渐形成了群众尊敬热爱和关心照顾烈军属、荣复转业军人的良好社会风气。烈军属就业优先，生活有困难免费上学。为解决烈军属就业，区政府还办起了服装厂、制鞋厂、制箱厂。并且组织部分脱不开身的烈军属搞起了洗布、劈柴、糊纸盒、缝垫肩等家庭副业。在节日期间免费招待烈军属看电影和文艺演出，有的影剧院还经常举行烈军属看戏、看电影招待周。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来连演出时还向烈军属、荣复转业军人发放了招待票。逢年过节群众都自发地向烈军属、荣复转业军人捐献钱物，对烈军属们进行精神和物质慰问。为了使贫困的烈军属、荣复转业军人达到中等生活水平，政府还拨专款和物资对 2495 户烈军属、5726 名荣复转业军人进行了长年或季节补助。对家庭困难无能力支付医药费的 3109 人给予免费医疗。把无依无靠的烈军属送光荣之家，病故时发给丧葬费和棺槨费。

## 五、“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全力做好防空、治安工作

美国在侵略朝鲜的同时，还不断派飞机侵入我国东北地区。在此情况下，中山区和驻军各单位按照旅大市防空司令部的指示精神相继建立起人民防空组织。区防空指挥部于 1950 年 9 月 21 日正式办公。全区共建立人民防空指挥处 77 个，指挥所 26 个。全区 66399 人按着各自所居住、工作系统编成了若干组，以便于领导疏散或隐蔽。根据工作需要还选定了部分群众做为防空期间的工作人员。将他们分别编入通信联络队、伪装隐蔽队、纠察队、抢修队、救火队、救护队、反燃烧弹队。各队人员数目不等。共为 16840 名。队以下设中队和组。1951 年 4 月 6 日至 8 日，对防空组织机构又做过相应的调整。

为了坚定防空人员的思想意志，提高其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区防空指挥部和 77 个基层指挥处，分别对 1377 名防空组长以上领导人员、11896 名一般工作人员分期分批地进行培训，训期为 7 天至两个半月。区公安分局还组织了全区干警和 1704 名治安员、4260 纠察队员学习了有关文件，布置了空袭期间的治安保卫和防奸防特工作。

为了能够迅速疏散和隐蔽群众，区组织人员对敌伪时代修建的防空壕、防空洞、山洞、地下道、隐蔽室进行了清查和整修，并组织群众连夜突击修建新的防空设施。居民每 2—3 户或 3—5 户修建 1—2 处能容纳 5—10 人左右的防空壕。修建地址按地区不同来决定，如住户有院子者，可在院内挖，大楼或商店亦由群众集体在背巷空地或较宽的人行道上挖，挖好后就地取材，用 150mmX15mm 的木方或铁轨和 15cm 圆木杆子架上，上面加土；用麻袋或草包装上去放置入口两旁，入口加盖。全区修好的旧有防空洞 58 处，可待避 37200 人。洞口 181 个，新挖防空壕 1474 个，可待避 50274 人。同时发动居民在窗户、门的玻璃上糊交叉纸条，以防空袭时震坏玻璃和暴露目标。夜间全面进行灯火管制。在健全防空组，全面培训骨干，广泛宣传发动群众的基础上，两次进行全区性的防空大演习。为防奸、防特还建起了一支由 18—45 岁的积极分子参加的防空自卫队。

### 六、开展全民性的爱国防疫卫生运动

美国侵略者在朝鲜战场遭到严重失败后，违反人类公德和国际公德，竟然于 1952 年 1 月 28 日，在朝鲜散布带有细菌的昆虫和其他毒物进行灭绝人性的细菌战。同年 2 月 28 日又把毒虫、毒物散放在我旅大边缘县区。针对美国残无人道的细菌战。根据市有关部门的指示精神，3 月初中山区成立了以防

细菌战为主要任务的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区长为主任，下设办公室（卫生科），在区委领导下进行工作。为了把爱国防疫卫生运动搞好，区委先后三次召开了宣传动员大会，卫生科培训了 78 名卫生委员，组织医务人员深入街坊进行宣传和检诊，并建立流行病发病报告制度。各街坊组织了街头宣传队扛着漫画，打着标语牌进行宣传，区公所还装备了一台流动宣传花车，走街串巷进行宣传。通过广泛宣传发动，4 月份就形成了消灭毒虫进行防疫的群众爱国卫生运动高潮。

在消灭毒虫过程中。主要以灭蝇灭蚊为主，全区参加挖蛹灭蛹活动的有 7 万余人。中小学生在挖蛹灭蛹中还创造出“水浮蛹法”、“筛蛹法”、“一面摊一面检法”等先进经验，向全区进行了推广。

在消灭毒虫活动的同时，各单位还抓了城区和家庭环境卫生的改善。层层发动，户户动手，使环境卫生迅速得到了改观、全区出动 2 万余人，清除垃圾、填平洼地，疏通河道、污水沟、下水道，整修住所。为使防疫卫生制度化、经常化，还建立了环境卫生“一天一小扫”、“每周一大扫”、“定期检查、互相交流”、“翻箱倒柜、翻盆倒罐”等一系列工作制度。

在消灭毒虫卫生防疫活动中，出现了很多动人事迹，如疏通大连神社前的暗沟时，水沟深且细长，空气稀薄，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群众怀着对美帝的仇恨，以战斗的姿态冒着生命危险用急上急下抢流作业的方法进行了清理。菜市场的群众自愿组织起来，自费挖了两个大渗水井，疏通了 12 年不通的下水道，使 254 户受益，也使当地环境卫生得到彻底改善。春和坊有一摊商，为消灭蚊子停业上山拔艾蒿搓熏蚊蒿绳，免费供应居民使用。一卫生委员会委员拿出自家存放的 200 斤硝酸供集体消蛆灭子使用。消灭毒虫卫生防疫在群众中产生了深刻影响，唤起了群众对这项工作的积极性。

为防止毒虫引起流行病的发牛，区爱委会还对 16219 人次进行防疫注射。

在三年多的抗美援朝运动中，中山区人民在区委的领导下，发扬了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做了大量的工作，付出了应有的代价，受到了教育\*经受了考验，为取得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 复县人民参加支援抗美援朝的斗争

赫安龄

全县动员起来

朝鲜战争爆发时，新中国诞生不到一年。复县（现瓦房店市）的干部和群众，思想觉悟和认识水平还不够高、头脑中存在着种种糊涂观念和错误认识。一是，存在着恐美的错误心理；二是，害怕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担心刚刚获得的和平生活受到破坏；三是，认为朝鲜战争与中国无关，中国不必参战。

鉴于上述三种认识，复县县委、县政府遵照党中央和辽东省委指示，在全县范围内，广泛宣传动员，深入发动群众，积极参加和支援这场斗争。

1950年7月10日，县委召开县委委员会议，决定在群众中广泛宣传，开展“和平签名运动”。从7月底开始，首先在干部中进行动员，先召开区长、区委宣传委员、完小校长会议，然后开小学教员、村支部宣传委员、村干部等较大型的会议，搞签名试点。和平签名运动试点刚开始，《中共中央关于继续进行签名运动的指示》发下来了。8月4日县委立即印发下去 要求干部认识到：和平签名运动不但是为了壮大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声势，而且

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有较重大的意义。8月5日县委又发出（宣）34号《通知》、要求各区委、镇委切实做到以下几点工作：

（一）有计划地组织所有党员、团员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家属和亲戚朋友）采取串门子、唠嗑等方式搜集群众的反映。

（二）组织干部认真学习县委宣传部发的《反对美风侵略台湾、朝鲜的宣传要点》。

（三）凡有部队驻扎的区，都要与部队取得密切联系，适当组织部队战士给群众讲战斗故事，其它地区应适当组织退伍军人讲战斗故事。

通过上述工作，促进了干部、群众思想觉悟的提高，达到了安定群众情绪、发展生产、稳定社会秩序之目的。

通过宣传教育，全县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和平签名运动。截止9月3日（签名结束），签名人数达419886人，占全县人口总数505014人（除在县外军政人员）的83.1%。这次签名运动自1950年7月上旬起先后在复州镇、瓦房店镇的机关、学校、工厂、群众团体和市民中进行，7月下旬扩大到了农村。通过签名运动，广大群众政治觉悟普遍有了提高，增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和保卫世界和平的决心。

10月份，县委根据县、区、村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学生、商人、农民等各阶层的思想状况，于22日召开了区干部扩大会议，号召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广泛的反美宣传运动，并且在会上布置了反美宣传和战勤工作。各区也在这次会后无一例外地召开了村干部扩大会议，进行时事教育，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并布置了扩军任务。

11月8日。县委又印发了辽东省委宣传部转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时事运动的指示》，为使全县人民正确认识形势，确立胜利信心，消除恐美心理。全县立即展开了宣传活动，通过大会、小会、炕头会、家庭会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使广大干部群众懂得了中朝两国唇齿相依、唇亡齿寒的利害关系……使大家明白了，中国人民不能听任美国侵入中朝边界而置之不理的道理；认识到美国是中朝和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是个纸老虎，它胆敢挑起世界大战，必将彻底失败。

为了进一步深入地贯彻中央和省委的指示精神，县委于11月12日召开了全县干部扩大会议。县委书记（当时称政委）肖纯在会上就“目前的形势”和“如何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两方面内容，做了动员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帝国主义的战火已烧到我们祖国边疆，朝鲜战争是有关我们祖国安危的事情，谁愿意使我们东北第二次做“满州国”，除了反动派、卖国贼、特务之外，凡是中国人民没有人希望再做亡国奴的。对朝鲜战争不能置之不理，幻想美帝国主义不侵略我们是错误的，我们的正确态度是“救邻自救”，以志愿行动支援朝鲜战争。

肖纯的讲话，使全县的干部、机关的党、团员。受到很大的鼓舞，决心以实际行动，带动群众投入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中去。

11月14日，会议结束时，县委强调要抓好宣传发动工作，开展“宣传运动周”活动，进一步教育广大干部群众。

这时，美国飞机屡次侵入我国东北领空，我省境内暗藏的特务分子和地富分子，遂趁机蠢动，捏造了各种反动谣言，叫嚣第三次世界大战，吹嘘美蒋势力，破坏、歪曲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对此，县委根据辽东省公安厅《关于坚决粉碎反革命谣言的指示》精神，广泛深入地宣传教育，发动群众粉碎反革命谣言，澄清糊涂认识。

在此同时，县委宣传部还在农村中进行了诉苦教育，提高群众的反美爱国情绪。在宣传中，除了运用典型事例外还充分利用了黑板报、戏剧（其中有活报剧）、大鼓、皮影、漫画等有力的宣传形式。

随着抗美援朝宣传运动的普及和深入，县委根据上级指示精神，为响应世界和平理事会号召，于1951年4月下（下旬，在全县又进行了一次广泛的时事宣传活动，每个人都受到抗美援朝的爱国教育。各区（镇）组织了小型的宣传队，举行小型的分区展览……向群众做定期的时事讲演，教群众唱爱国

歌曲，召开群众大会，控诉日、美、蒋罪行。“五·一”节前后，城乡都举行了反对美帝侵略朝鲜、武装日本的大示威游行。

经过宣传动员，广大干部、党团员、群众的觉悟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为全县人民组织起来参加和支援抗美援朝的斗争，奠定了必要的思想基础。

### 全民组织起来

在充分宣传动员的基础上，县委和县政府将全县人民积极地组织起来，为参加和支援抗美援朝斗争，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一）组织群众做好战勤和扩军工作。1950年10月23日，县委召开会议，布置战勤工作任务。会后，各区（镇）立即行动。全县共组织了人员、物资齐备的担架2000副，其中立即待命出发的担架120副；组织支前大车1200辆，其中于11月4日出发了500辆；同时还组织群众修县内的公路、桥梁、涵洞等。11月各区都召开了村干部扩大会议，具体布置了扩军任务，组织适龄青年报名体检参军，全县达5300余人。

（二）组织群众发展生产，搞好战时供给工作。抗美援朝斗争，需要雄厚的物资源源不断地支援前线。因此，县委通过宣传教育，激发了群众的爱国热情，使他们克服困难，坚决工作，努力生产，保证生产出更多的军需、民用产品。

（三）组织群众做好优抚工作。对支前民工、军烈属家庭生活、生产上给予照顾。并以自然屯为单位，将民工、铁车及使用的牲口统一编组，固定负责照顾出勤户。

对于军烈属户，县委、县政府一直是贯彻“城市以组织生产、介绍职业为主，物资补助为辅，农村做好土地代耕工作”的方针，组织军烈属生产并安排好生活，使前方战士能安心打仗。

（四）组织群众做好中国人民志愿军伤病员的救护工作。县委、县政府在志愿军康复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第十一后方医院）驻瓦房店时，组织群众倒出住房500余间，设3000多张病床，抽调200余人到医院做医护工作。还组织群众献血、送物资等。

（五）组织训练民兵，扩大公安武装，加强锄奸保卫工作。全县共训练民兵 9775 人，扩充公安队员 200 人。

以上的组织工作，为全面行动起来，参加和支援抗美援朝的斗争，做了必要的组织准备。

### 全面行动起来

经过县委、县政府的动员、组织，复县人民全面的行动起来，积极参加和支援抗美援朝斗争。

（一）群众性的参军运动。1950 年 11 月，村干部扩大会议后，各区、村于 12 月初正式动员报名，至上、中旬全县各区的扩军工作已大体结束。动员、组织的 5300 余人，经过部队检查，合格率近 50%。至 12 月 16 日止，实际入伍为 2375 人，超额 700 余人。

在参军运动中，群众情绪高涨，新兵思想稳定。例如：长兴、南海、复州等区（镇），绝大多数都超过了任务。仅南海、长兴西区合格者就达 630 人，超过了下达任务的一倍左右，合格率在 70% 左右。

1951 年春季，全县又征兵 500 人，加上汽车学员（兵）151 人等，全县在抗美援朝斗争中，先后有 3000 多人参军参战。招收 8 名军政干校学生时，在中学生中，报名竟达 500 多人。

（二）支前队伍积极活跃。复县支援抗美援朝前线的队伍，大体上分为三支，即：战勤大车队，国防工程民工队，随军或地方担架队。

自 1950 年冬到 1953 年 1 月，全县共出战勤大车六次，共 1060 台（2300 人，3000 头牲口）。最长时间 3 个月，最短时间 50 天。五次提前完成任务，被评为一等模范大队。第一次出战勤的 500 辆大车，虽然没有评模，但肩负的

任务最艰巨，时间也最长。1950年11月4日出发后，刚到驻地，就遭美机轰炸，损失140台，县委、县政府立即调车补齐。这些大车，有的分配在鸭绿江上修便桥，有的分配在志愿军后勤部兵站做运输工作。时刻都有被美机轰炸的危险，大家不避艰险，不怕流血牺牲，在县区干部的率领下，也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同时期，夏县还出动民工五次，到东沟、凤城、宽甸等地修机场、铁路等国防工程。先后有8500名民工参加，最多一次3500人，最少一次500人。最长时间3个月，最短时间1个月。五次均出色完成任务，四次被评为一等模范民工大队。

除大车队和民工队支前之外，县委、县政府根据省政府指示精神，于1950年12月11日，调集120副担架待命出发，每副担架6名民工，其中党、团员1—2名，担架队的指导员必须是强健的村支部书记。这批担架队员，经过一个多月的培训，从中选拔250人，由北海区长吴德祯带队参加了随军担架连，赴朝鲜战场担负运送伤病员任务。他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获得四好模范连的光荣称号。于1952年4月胜利返回复县。

在执行战勤任务的三支队伍中，县、区、村领导及广大党、团员起到了积极带头作用。历次出战勤的大（支）队政委（指导员）、大（支）队长，均由县委、县政府选拔得力干部担任，他们之中有的是县委常委，有的是委员，他们不分职务高低，和民工们一道参战。中小队两级干部也多是区委委员和村支部书记等主要领导干部担任。如：驼山区李家村党支部书记王春财，1950年10月份去鞍山干木匠活，听说复县组织担架队，返回家自报要去带队支前；瓦房店镇杨树房村党支部书记吕文兰组织担架时，自己献出白布14尺（防空用）、锅一口、水桶一担，并报名带队。再如：1961年1月县委派出的3500人的民工大队，去安东县（今东沟县）前阳修筑通往飞机场的铁路路基时，适逢农历腊月，滴水成冰。气温下降到零下二三十度（摄氏），封冻的土层达半米多厚，挖不进也刨不动。而铺筑的路基又不得有一块冻土块夹在路基中，要没有空隙和空洞。在这种困难条件下，大、中队干部亲临工地，充分发动群众，大家献计献策，用钢钎子破土，日夜奋战，鸡叫头遍就上工，吃过晚饭还

大干几个小时，即使在大风大雪天也不停工。民工们睡在稻草铺地的冷屋子里，吃的是米饭和咸菜。生活虽然艰苦，但是大家以苦为荣，以苦为乐，原定一个月的任务，提前7天完成，经省指挥部验收，完全合乎质量要求。

（三）发展生产，支援前线。在农业生产方面，1951年春，复县县委号召全县农民“全力开展春耕，搞好丰产运动”。一方面为了群众过好日子，另一方面是多打粮食，支援前线。当年全县粮食总产量达到28034万斤，县公粮库用来供给军需的粮食达2730万斤，约占全县总产量的10%。1951—1952两年全县超交爱国公粮700多万斤。

在工业生产方面，各厂矿贯彻县委的“保证更多的军需、民用物资”的指示，积极发展生产。东北第四纺织厂（现瓦房店纺织厂）、华铜铜矿等厂矿都把支援抗美援朝斗争做为行动口号和动力。如：东北第四纺织厂，1951年每日生产帆布8595公尺、三斜纹布18692公尺、四斜纹布1536公尺，全部运至沈阳军工局；华铜铜矿产的铜矿粉，两年总产量达75109吨，运往沈阳冶炼厂，都直接或间接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保证了军需。

（四）加强后方建设，适应战争需要。全县1951年1月至8月，在修海防公路、桥梁当中，出动了民工48809名，占负担战勤人数192469人的25.36%，10月份县政府又调集民工修筑驼山、石佛、长兴区三处海防工事……。

（五）拥军优属，捐献飞机大炮。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拥军优属工作较解放战争时期更为加强了。此项工作的开展也有力地推动了捐献飞机大炮运动。全县出现了许多好典型。烈军属家无劳动力，享受包耕的2667户，代耕土地2591.15垧，代耕工作出现了新局面。1951年出现了杨会林、王世吉等模范代耕组。烈军属中出现了李世凤、王店兰、纪学芬、任秀花等劳动模范人物，为

全县树立了榜样。李世凤、杨会林带头捐献飞机大炮款，推动了全县爱国捐献运动。

1951年3月4日，复县第二届二次人民代表会议和奖模大会开幕，会议选派劳模、支前模范代表30人，以一中校长戚景龙为首组成复县人民慰问团，向驻地担架团进行慰问。

1952年3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和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辽东组一行8人，来瓦房店，受到了复县人民的热烈欢迎。

同年冬，党和政府为了解除军、烈、工属、荣复转业军人的临时困难户，通过发展生产和拨款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困难。

志愿军伤病员从前线归来，县委、县政府都组织欢迎队伍、担架队伍到车站迎接。解放军后方医院（即当时的康复医院）六个疗养所，除一个所设在松树外，其它五个所遍及瓦房店，占用了大量的市民住房，只要说是医院需要，志愿军需要，群众就心甘情愿倒出。县长李世善首先做表率，将自己住房倒出来，做了医院的手术室，安放四张手术床。

医院驻瓦期间，县委和部队医院配合紧密。县委常委何寅昌代理医院政委，亲自抓志愿军伤病员的救护工作。县委发起了“把鲜血献给最可爱的人”活动，从县委、县政府领导机关的干部到各厂矿的工人、学校的师生及市民都争先恐后无偿地将鲜血献给最可爱的人。每个报名献血的人，血型都提前化验好，身体状况定期检查，做到了伤病员需要输血时，闻声则到。

（作者系瓦房店市地志办干部）

## 我们战斗在兵站

王宪章

1950年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联合国军”发动了侵朝战争。旅大人民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深知朝鲜是我国的友好邻邦、唇亡则齿寒，眼看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不能坐视旁观。全市人民坚决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纷纷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保证“要物资马上就送，要人站起来即走”，除在物资上大力支持外，还多次派出人员支前参战。1950年12月旅大市委根据上级指示派出200多名战勤干部和警卫战士奔赴朝鲜战场，担负中线后勤供应的艰巨工作。

早在1950年10月初旅大党组织就奉命从各机关、企业单位抽调了领导干部、管理、财会、医务人员六十余人，集中在旅大市委党校四部战勤班学习待命，另外还有个警卫连，也在听候调遣。

他们是王一帆（旅大党校组织科科长）、王宪章（中共西岗区党委委员、宣传科副科长）。李作贵（大连油漆厂人事科科长）、孙树明（大连麻袋厂工会干事）、宋文孟（大连海港）、肖东儒、杨作礼、姜信孚、黄复芳、王云起、张聚清、史冠山、薛来福、刘淑惠、警卫连有逢副连长、一排长刘明武、周排副、战士朱萱、孙道和、刘关宏、王起洪、傅盛敏、陈锡增以及医院护士周玉华、王秀凤、石世明。还有四营的王占恒、关庆荣等人。

1950年12月28日我们从大连出发，乘火车到沈阳。当日住在东北旅社，与沈阳市抽调的百余名干部合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第一分部第四大站（兵站），下同三个分站即十分站、十一分站、十二分站，每个分站配属一个警卫排。

上级任命王一帆为第四大站站长，刘星之为副站长。李彤为政治委员，刘振堂为副政委，张富荣为政治处主任，肖东儒为站直协理员，杨作礼为后勤处处长，李作贵为宣传科长。

任命崔震为十分站站长，王宪章为副站长，宋文孟为政治教导员（其他分站领导记不清了）。

编队整装后于1950年12月30日由沈阳乘火车到安东（今丹东），当夜过了鸭绿江到达朝鲜新义州，由于朝鲜铁路被炸，火车不能通行，只好在郭山里的涵洞过了一夜。十冬腊月，寒风刺骨，深夜气温零下三十多度，大家坐不住，睡下好，战争生活开始了。李作贵、杨作礼、王宪章等宣传干部见此情况便动员大家起来跳舞，扭秧歌。增加热量，抗寒过夜。同时进行朝鲜地理地形和防空知识教育。根据朝鲜战场当时的特点，美帝飞机天天轰炸，因此上级命令白天不准行动，部队全部进入隐蔽防空，夜间行军工作。于是我们从1961年元旦傍晚开始进入了白天休息，晚上行军的状态。我们步行军21天走了百余里到达了目的地，江东郡（县）三登面（乡）。也就是三登车站。

四大站驻扎在三爱东山沟里，十分站设在三登车站，十一分站设在成川车站（后迁石稟车站），十二分站设在江东车站。

后勤部队驻下后即组建兵站。兵站是作战部队的供应站，我们的具体任务是装卸火车，装运汽车，保管物资，前运后转，收容安葬等。四大站设有粮秣库、油料库、军械库、弹药库、被服库、日用品库，兵站还配有辎重四团、运输三团、汽车三团、五团，工兵营、高炮营和战伤医院等等，

兵站在1950年1、2月主要是从当地政府组织给养，大部分征集高粮米和小米，用牛驮和牛爬犁往前方接力运送。一次也就十头八头牛和爬犁载粮，派二三个干部押运到前线。这一阶段给养征收运送非常困难，使前线作战部队因少弹缺粮而不能大踏步的前进。

1951年3月份国内通向朝鲜三登车站的铁道修复，火车通了。于是迅速从国内运来几十列车物资，其中有大米、高粮米、白面、罐头、白条猪、豆油、军装、军械、弹药等等。每个列车有13个车皮，每个车皮装有30吨或50吨的货物。大批物资卸下后，疏散存放在四个山坡和山沟，堆放得满山遍野，虽有伪装但目标也非常明显。由于特务的报告和敌机的侦察，三登兵站成为敌机重点轰炸对象。1951年4月8日拂晓5点20分，有四架敌机飞至三登

车站俯冲投弹和扫射。接着每小时来一次，每次最多达十余架。敌机对三登车站的库区轮番轰炸、扫射了一天，到傍晚5点多钟才停止。

第一次轰炸中，有一枚炸弹投在第二个山沟库区哨位旁边，当即把哨兵刘万宏压在炸弹回翻土里面，我带勤务兵查岗发现哨兵没有了，立即组织人到处找，听到炸弹坑翻土里面有呻吟声，大家紧张的动手将刘立宏扒出抢救过来了。

接着大站站长王一帆和其他领导同十分站的全体同志分头在各被炸的仓库抢救扑火。敌机来了即隐蔽防空，敌机走了即抢救物资，大家奋战了一天，无一伤亡。

这一天敌机共飞来百余架次，投掷发射的穿甲弹，爆炸弹、燃烧弹达四五千发。因此，物资损失相当严重。有的粮垛一直燃烧了十余天。（损失高粮米110万斤，炒面170万斤，豆油33万斤，军夏衣288万套，衬衣12.7万件，胶鞋19.3万双，布鞋4.9万双，军帽23.2万顶，手巾14.4万条，还有罐头、讲干等主副食若干万斤。）

这次教训非常沉痛、深刻。分部和志愿军后勤部都派检查组来三登进行检查总结。认为损失重大的主要原因有三：1. 三防（防火、防特、防轰炸）不严，暴露了目标；2. 领导思想麻痹，预见性不强；3. 更主要的是对敌机估计过高，不敢对空射击，怕暴露目标。所以敌机驶驾驶员非常猖狂，任意轰炸扫射，有的敌机顺公路低飞五、六米高侦察，我们在山坡上都能清楚的看到驶驾驶员，大家恨的要命，气的要死，可谁也不敢违令开枪打敌机。

总结了经验教训，克服了麻痹思想，志愿军司令部下令，允许对空射击打敌机。后来也给兵站调来高射炮部队。我们也用机枪步枪打飞机。全军开展了对空射击后，三登车站上空，经常可以看到敌机被击伤击落的情景。十分站站长崔震，曾用机枪打伤一架敌机，三登后山沟部队也击落了两架敌机，汽

车团的每台车也都配备了步枪、机枪，白天往前方运输，遇上敌机就对空射击，边打边跑。敌机驶驾驶员再也不敢那么猖狂低飞了。

由于全军开展了对空射击，掀起了打敌机比赛活动，三年来朝鲜战场共打落打伤敌军各种战斗机、轰炸机、侦察机、运输机、炮兵校正机、空传机和直升机等 12213 架，其中打落 5729 架，打伤 6484 架。开展对空射击后，大快人心，中朝人民每当看到敌机被打落的情景，都非常高兴蹦跳着鼓掌称快，都说再不受敌机的气了。从此，后勤兵站工作也好干了，有的活白天也敢干了，甚至白天装汽车在前方运，有时火车也能出入山洞卸车，挽救了损失，保证了供给。

“四八”事件后兵站的装卸、保管工作也有了改进和加强。上级决定在山沟两边的山坡上挖掘深沟，深沟宽二三十，长三五十米长，上、下四边用木料编起，建起了六不靠的半掘开式的仓库。这样隐蔽伪装，目标缩小了。兵站在黑岭东山打了坑道，开凿山洞，作为被服库。把距三登五十里左右的胜胡里的自然山洞加工成为军械库。还在附近河套两侧埋油桶作油料库，使物资高度疏散，做到一个炸弹炸不了两个库。

在装卸工作中也开展了快装快卸的竞赛活动。排长曹玉林创造了算盘式的卸火车法，六个人仅用半个小时即可卸完一车皮（30 吨）大米。

在装汽车的竞赛中，十分站一个班 12 人仅用 2 分 25 秒就将 40 包（每包 100 斤）大米从粮库搬运到车上（距离 50 米）。十二分站用了 2 分 55 秒。司机停车后还没吸完一支烟，即被催开车。战士们的共同口号是：“快装、快卸，多拉快跑，一切为了胜利，一切为了前方，要把美帝消灭光。”抗美援朝小报把这口号谱成了曲子让战士们传唱。

距三登很近的大同江大桥、江东大桥也是敌机轰炸的重要目标，在这两个地方都有工兵营、连驻防待命，专门看护大桥，一旦大桥被炸，马上昼夜不停的抢修，保证火车和汽车畅通，使后勤供应成为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我们听人传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曾为此评价说，朝鲜战场的胜利，后勤功劳可占百分之六十。我们听后受到了极大鼓舞。

在朝鲜战场上，我们不仅同敌人斗还要同自然灾害斗。1951年8月1日至3日，三登地区连降滂雨，突然引起了百年未遇的山洪暴发。大同江水上涨，水位急剧升高，3号晚上淹没了潘龙里的战伤医院（伤病员都已转移上山，没有伤亡）和高炮阵地。油库的大油桶漂起，顺大同江被冲走几百桶。洪水退后，兵站派人顺江去找，行程百余里，把江两边的油桶大部分找了回来。被服粮秣大部被雨淋，天晴后兵站立即组织晾晒。

兵站认真总结了与洪水斗争的经验，决定：半掘开式库的上盖，用水泥抹顶，地面四边挖排水沟，山洞除四边挖排水沟外，上盖用铁板加盖，成为防雨防潮又防空的永久式仓库。

在朝鲜战场上敌机不仅天天轰炸扫射，而且还经常扔下定时炸弹和母子弹，伤害战士和百姓。我们动员大家研究破定时炸弹的方法。一天，三班班长王起洪（大连人），见到敌机刚扔下的定时炸弹，即勇敢的靠近查看，发现定时炸弹的定时器直转，他立即把住定时器；向相反的方向扭转，而后把它拆卸下来，再把炸药一点一点的抠出来。抠出的炸药被用来打坑道，弹壳送给伙食单位挂在营房附近，当钟鼓点。

敌机投下的母子弹，是蝴蝶式，像罐头盒一样，两边有翅膀，上面有个提把，人们看到不知是什么东西，一提即响，不炸死也是重伤，我们命令战士用枪射击或用长棒按上铁丝勾破坏它。后来王起洪被分部调去组织了一个破定时炸弹的小分队。专门扫除定时炸弹，保护部队和群众的安全。

1951年6月间的一天傍晚，敌机飞到黑岭上空轰炸扫射，将车站停放的两车皮汽油打着了，油车越着越猛，又把旁边停放的一车皮卡秋莎炮弹烤着了。弹头在火焰猛烧之下，大多飞离弹筒钻进一二里之外的土地里（卡秋莎不上弹架不爆炸）。当夜大站奉命指示运输三团：“卡秋莎是绝密武器，弹头不

能落到敌人手中，一定想法找回来。”于是全团出动。把卡秋莎弹头都从地里找了回来。

这件事告诉我们汽油车皮和弹药车皮停放在一个车站是错误的。

在朝鲜战场上部队的生活十分艰苦。刚入朝时晚上行军，白天休息。由于公路、铁路附近的村庄全被炸成一片废墟，部队无处睡觉还得防空，天天吃炒面、饼干。吃不好，睡不好，还要坚持行军，战士们克服各种困难，完成了千余里的行军任务。

到三登目的地后驻防地点已定，似乎可以好好休息了，但是不准脱衣服睡觉。半年多没衣服换，没有澡洗，战士身上普遍生虱，文化生活更谈不上，半年多没看到书报刊物，家信也不通，音信全无。但大家懂得一切为了祖国，一切为了胜利，斗志还是非常旺盛的。

1951年3月份火车修通，祖国人民对志愿军无微不至的关怀，全力以赴的支援朝鲜战场，把志愿军称作最可爱的人，从全国各地运来大批物资，有大连的鱼虾和罐头，辽宁的大米、炒面和饼干，黑龙江、吉林的高粮米和白条猪，山东的花生米，四川的榨菜，新疆的牛肉干和肉松等等。但由于半年多没吃上食盐和蔬荒，因此60%的人得了夜盲症。夜间只好由眼睛好的人领着三四个夜盲战士干活、装卸车。转过年来，部队自己种菜，每个单位用一个油桶烧水洗澡，国内书信也不断的寄来，又派慰问团来慰问，因而保证了部队战士的身体健康，鼓舞了部队的战斗意志。使抗美援朝终于取得了胜利。

1953年7月停战后，旅大参战干部除个别被留在部队外，大部分同志都凯旋而归。

作者注：本文完成后，王一帆等同志审阅了此稿，并提出修改意见，在此致谢。

（作者系离休干部，原大连市西岗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 新金民工大队在朝鲜

## 王天财

### 一、跨过鸭绿江

1950 年底，新金县开始组建担架大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支前工作。每个行政区组织一个分队，编制 48 人。全县组成十二个分队，三个中队，一个大队，约 700 多人。经过宣传教育，群众尤其是党、团员积极分子积极报名。

当时，我任唐家房区副区长。区党委研究决定，由我任担架分队政治指导员，组建区分队。我在群众基础较好的南部，选拔了二十余名青壮年，并选派一名条件好的村长任分队长。这二十多人的队伍中，党员、积极分子占 20% 左右。

1950 年 11 月下旬，接到县委指示，要担架队在两天内集中到普兰店。集中后的第二天晚上，县里在车站广场开了欢送大会。县委领导和普兰店镇领导都讲了话，鼓励民工们到朝鲜前线后，积极参战，为党为国为新金人民立功。

我们坐的是“闷罐”，火车开的很慢，经过一天两夜，不知把我们拉到什么地方，下了车才知道是宽甸县的潜水站。又走了一天的路，到达宽甸县城，住在长甸江口，休整几天，每个人发给二十斤苞米碴子，半斤食盐，一块咸萝卜，晚间开始过鸭绿江。

已进入 12 月份，天寒地冻，行军路上，又累又疲乏，晚间倒在朝鲜老百姓的稻草垛里就睡，天亮爬起来又往前走。大约走了两三天路，白天就能看到美国的飞机在天空绕圈子，道路两旁，遍地都是炸弹坑，朝鲜老百姓早就逃光了。看到这一片战争景象，有些人产生了恐美情绪，民工队伍的思想开

始出现波动，有的人晚上偷偷地开了小差，有的分队除了党员干部外、几乎全开了小差。县大队政委王树林同志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稳定人心，又选派干部沿路回到鸭绿江边，劝阻开小差的民工归队。归队后我们做思想工作，让他们认清抗美援朝的伟大意义，横下一条心，坚持干到底。

越往前走，生活越艰苦，白天敌机轰炸，只能夜行军，饿了就用雪煮点大碴子，每人吃几口，没有菜，喝口咸盐水，累了就蹲在路旁休息一会儿、有一天晚上，我们就在一座桥底的冰上躺了一宿“冰床”，政委王树林同志风趣地说：“我们到朝鲜住上楼房了！”

## 二、参军参战

到达朝鲜的新安州，志愿军后勤部将我们新金担架大队改成民工大队，在车站装卸武器弹药、军需物资。民工刚刚过江，没有劳动工具，赤手空拳，就靠这双手，把汽油桶卸下火车滚到山上，用手捧着冰雪块掩盖好。大家的手脚都冻僵了，但工作热情却很高。任务愈艰巨，思想政治工作愈要跟上去。王树林政委组织大家开展劳动竞赛号召大家“为新金争光荣”。由于我们完成任务好，因此被评为“先进大队”，多次受到志愿军后勤五分部的表扬、奖励。大队里也涌现出一大批劳动能手、标兵和模范。杨树一区分队，有一位外号叫“李呱哒板子”的小伙子，在劳动竞赛中突出能干，卸火车扛炒面，五十斤一袋的炒面、别人一次扛五袋，他能扛六袋子。他性格开朗，成天蹦蹦跳跳，说说笑笑，可惜在平地一次执行任务中，被敌机扔下的蝴蝶弹炸着而光荣牺牲了，人们都很怀念他。

1951年9月22日晚上，民工三中队出动二百多人，从站台往云月里后山的村子里转运志愿军药品。为防敌空袭，汽车在晚间是不准亮灯的，可是道路泥泞，有两台汽车亮了灯，即刻，被敌机发现，一刹那，敌机从空中向村子里扔下两颗杀伤弹，在空中爆炸，正中库房周围。民工赵景芝、徐春洪、刘德万、田xx等四人当场牺牲了，二十一人身负轻重伤。在朝鲜的疆土上，洒下了中国民工的鲜血，埋下了他们的忠骨。

### 三、军纪与乡情

从1950年冬到1952年8月回到祖国，我在朝鲜呆了将近三个年头，在同朝鲜人民接触的日子里，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我们虽是民工队伍，但也要照样遵守志愿军的军纪，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身在异国他乡，和朝鲜人民是心心相印的，得到和祖国家里一样的温暖。我们住在朝鲜老百姓的家里，相处的象一家人一样。白天敌机来轰炸，只能晚间干活。帮助他们扫院子、挑水、劈柴。春天翻地、插秧。秋天收割、打稻，样样农活抢着干。我们把节约下来的毛巾，肥皂等送给他们，他们很过意不去，把一些咸菜、酸辣白菜送给我们吃。

尽管语言不通，但心是相通的。我当时住的房东是一位老大爷和小孙女俩。按照朝鲜人的习俗，过年过节要吃打糕、狗肉。每次杀完狗，把酒菜摆在桌上，爷孙俩就连拖带拽，非要我们去他屋内坐客。我们婉言谢绝，可是不吃一口，不喝一盅，他们执意不放过。1952年8月，我回国时，这位老大爷领着小孙女，把我送了很远很远，惜惜离别之情，至今历历在目。

在战场上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遵守群众纪律。1951年8月，有一次，我带着通讯员从浦同江门到大同江门接受任务。走在平壤的路上，遇到二十多架敌机轰炸，整个市区一片火海。我们被一位朝鲜人民军拖进防空洞里，才免遭不幸。事后，我们肚子饿的难受，好不容易在平壤郊外碰上一位卖西红柿的朝鲜老百姓，花了几元钱，买了几个西红柿充饥，才勉强地走回来。

### 四、怒惩纸老虎

美帝国主义看样子是可伯的，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正如毛主席说的那样，是纸老虎，和它打交道，就要敢于和它斗。

有一次，我带着通讯员去检查掩体工程，刚走过铁路四十多米，从南边天空飞来一架“野马式”敌机，我们俩立刻隐蔽在一条东南走向的水沟里。敌机飞得很低，大概发现了我们两个人，立即掉转机头，向我们隐蔽的地方俯冲下来，进行扫射，我们就在水沟里和它捉迷藏。你飞到北面我们就转到沟北帮，你飞到南边我们就转到沟南帮，来来回回真叫人窝囊生气。当时心想，志愿军倡导用步枪打敌机，它这么嚣张，飞得这么低，何不揍它一家伙。于是，我夺过通讯员手里的30自动步枪，朝着它叭、叭、叭就是一梭子，打的敌机很恼怒，又反复俯冲了几次，灰溜溜地飞走了。

面对穷凶极恶的美国鬼子。打得过就和它打，打不过就躲起来，要灵活机动地和它斗。1951年7月，我在朝鲜西浦，担任三中队教导员。一天，带着通讯员到铁路另一侧检查掩体工程质量。临近中午，我顺路回来迎接送饭的炊事员，刚要过铁路，四架敌机向我们猛扑过来，我们迅速隐蔽起来，敌机向我们扔了十六颗炸弹，一时间，泥土横飞，饭桶也飞上了天。我们俩也被深深地埋在泥土里。当时，我们并不恐惧，想到既然到了朝鲜，要保家卫国，就要和美帝干，活一天就干一天，死了就算完。生死已置之度外了。

在朝鲜战场的日日夜夜里，民工队伍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做出重大贡献和牺牲，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立下了丰功伟绩。

（作者系原新金县政协主席。于开仁整理）

## 为了母亲-----可爱的祖国

安桂叶

我的面前放着一张陈旧的《旅大人民日报》，日期是1950年12月15日。在第四版上，刊登着一篇题为《志愿赴朝抗美的汽车女司机》的报道，还配有一幅照片。照片上，两个年轻姑娘身着大棉衣，头戴“朱德式”棉帽，脸上洋溢着出征前那种乐观而又坚定的激情。望着她们，我的思绪一下子飞到40年前……。

再见了，妈妈

照片上那两位姑娘，一个张淑贤，另一个就是我。当时我才十八岁，张淑贤比我大两岁。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张淑贤和我从小是邻居，在学校是同学，后来又一块考入市交通公司当车务员。1950年9月，我们又一起被录取为汽车司机。这年10月，当美帝的侵朝战火燃到鸭绿江边的时候，每个中国人都面临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使命。在大连，从10月25日开始，一批又一批英雄儿女离开故乡，奔赴战场。我们每次到火车站欢送他们，心里都感到很不好受。“什么时候我也能去呢？”

很快，上级开始动员我们这些年轻的司机分批赴朝支前。那时候，大多数同志思想都是一致的，争先恐后响应号召。当然也有极个别的人吓得躲起来。我和张淑贤的思想是坚定的，一个心眼想着上前线，正象后来《旅大人民日报》那篇报道中所说的那样：“她们互相立下誓言：准备着，时刻准备着！必要的时候，我们就挺身而出，赴朝参战去！”记得党支部张书记找我谈话，征求意见，我说：“没问题！”做为一个共产党员，用实际行动去保家卫国。我觉得是应该的，没有什么价钱可讲，只有整装待发。

可是，事情并不那么顺利。11月的一天，我回家（凌水王家村）把组织上批准我参军支前的消息告诉了家里人。他们听了都感到吃惊，母亲说什么也不放我走，怕我一去再也回不来了。这也难怪，母亲那时已经63岁了，父亲早已去世，我是老闺女，很受母亲疼爱。母亲辛辛苦苦把我拉扯大，怎么忍心让我离家远走，到战场上去呢？她哭了，哭得我也好心酸。说实在的我也舍不得离开母亲、离开亲人。可是，一想到千千万万个英雄儿女在浴血奋战，想到全国人民的母亲——祖国受到侵略者的严重威胁，我就下了决心，为了尽快归队，我只好这样对母亲说：“刚才是吓唬您，您还当真了。领导最近要调我到普兰店工作，天冷了，我来家拿几件衣服。”这是我第一次在母亲面前撒谎。她老人家抹着眼泪。半信半疑地放了我。就这样，我告别了亲人。和张淑贤还有许多要开赴前线的同志一道，集中到大连动物园附近一座小红砖楼里待命出发。后来我才知道，家里人这时还到处打听我的去向呢！

12月3日，我们终于乘上了开赴前线的列车。汽笛长鸣，列车飞驰。我心里默默地说：“再见了，妈妈！原谅我吧，女儿是会为您争光的。”

### 石桥岗机场

当时我们只知道是到前线去，但具体到什么地方，我们不知道。当列车停下后，我们才得知是到东丰县一个空军机场。我们这些人都是到新建的空军机场作后勤工作的。没过多久张淑贤同志因工作需要，被调往沈阳。同来的女友只有我一人了。冬去春来，第二年“五一”节那天，我们又乘火车转到石桥岗空军基地。此后的两年半时间，我一直工作在这里。这里虽然不是抗美援朝的最前线，但却是我们空军的战场。我们的任务，就是保证飞行员和地勤人员的吃、穿、住，让他们身强体壮，精神抖擞地驾机战斗，打击美国侵略者。所以对于我们司机来说（我们是一个班），完成任务开好车就是对抗美援朝的最大贡献。

在炮火连天的岁月里，要开好车是不容易的，是要担很大风险的。石桥岗机场这个“不是前线的前线”，每天都笼罩着紧张的气氛。敌机常来袭击。这给我们运输工作带来了重重困难。一开始，开车遇到敌机，我心里是很

紧张的，但很快就习惯了，你扫射你的，我跑我的。一次在路上就遇上了空战，一般地方车遇到这种情况是要暂时隐蔽一下，待空战结束再走，但我们为了能按时完成任务，是不管这一套的。当回到住地后才发现，汽车前面的机关盖都被弹片击破了。有一次我开车到九连城拉货物，到站后，王殿靖管理员去找人联系装车，这时我们的上空又响起了飞机声，只见一个黑东西正朝车跟前落下来，我急忙跳上车，开动机器加大油门，一个劲地往前开，只听轰隆一声，原来是一只装满汽油的副油箱把地炸个大坑，油溅了一片。由于动作迅速才避免了车毁人亡。

在我们住地，还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夜间，我们睡得正香，一声警笛，就得立即起床，开上装载食品的汽车，不打前灯迅速行驶，疏散到安全地带。一旦住地遭到破坏，也要保证飞行员的用餐，每次疏散短则几十分钟，长则几个小时。

艰苦的环境，锻炼了意志：艰巨的任务，也培养了我的责任心。三年里，我开车不知跑了多少里路，但从未发生过事故，由于保养精心，我的车也从未出过大的故障，影响任务的完成。在开好车的同时，我还积极参加文化学习，在部队这三年里，我的文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三年间，我先后两次荣立三等功，获一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军功勋章。朝鲜停战后，我于1953年12月回到大连。

回忆这段经历，我深深感到，一个青年最可贵的是以祖国利益为重，我们可以舍弃个人利益，不怕艰难困苦，流血牺牲，这是最有意义的。当然，我自己做得还不够，与战场上的勇士们是无法相比的，但是我想，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做什么，而在于怎样做。写到这里，我耳边又响起战友张淑贤在出发前欢送会上讲话的声音：“……我们是干运输工作的，是人民的女司机，我们

一定要把工作担当起来，不怕流血牺牲，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确我们没有惊人的举动，但却把工作担当起来了。

从部队回来后，这三十几年时间里，我感到自慰的也是这一点——无论何时何地，都认认真真地作好本职工作——开车。这也是我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最宝贵的收获。

（作者系大连交通公司退休工人）

## 忆抗美援朝的战斗岁月

范 永

### 一、火线食堂

1951年4月，组织上批准了我参加抗美援朝的申请。4月18日，我驾驶着“铁牛75号”机车（我担任司机兼指导员）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

两个月后的一天，朝鲜铁道军事管理局局长黄铎同志交给我一项特殊任务，限我3天在平壤成立一个每天供100多名乘务员吃饭的“火线食堂”，粮、菜、炊具等都由我自己想法解决。

当时，朝鲜战争正处在第四次战役向第五次战役转换之间，战争十分残酷。由于敌机连续不断地轰炸、扫射，灭绝人性的用重磅化学汽油弹烧杀，平壤被炸成一片废墟，幸存的老百姓处于半穴居状态。我两手空空，只身找到了平壤铁路分局领导，回答是：粮菜皆无。只给调了一位名叫依文德的保管员协助我工作。我急得头顶冒火，想来想去，决定求助部队。我和依文德一起来

到平壤郊区，找到一高射炮团。团长说，他们这里也很困难，根本无法解决这么多人吃饭问题。并告诉我们速到 60 华里外森林里去找志愿军后勤第五分部求援，并借给我们一条狗带路。于是，我同依文德捉了两条被打散的牛，找了两挂木车，就赶着车，由狗带路，走进 60 华里外的茫茫无际的森林里。我们找到了五分部某团王团长，说明来意，王团长当即答应说：“只能解决粮食、罐头，别的没有。”我回答说：“行！能吃就行！”这时已是凌晨一点钟了，我们也顾不得饥饿寒冷，装好粮食和罐头，趁天还未亮，由狗带路，赶着牛车回到平壤。在平壤郊区找了一间残墙断壁的破房子，卸完车后，由依文德去找锅、碗、柴禾等用具。两位朝鲜老大娘也来帮助烧饭。就这样，经过两天两夜的奔跑、求援，终于克服了种种困难，办起了平壤乘务员食堂。第三天中午，准时让路经平壤的 10 个机车乘务组的 100 多名乘务员吃上了热饭。当乘务员吃上喷香的热饭时，都感动的说：“谢谢食堂的同志们，你们为我们乘务员做了一件大好事，我们要用勇敢与敌机搏斗，多为前线运送军火、物资。以实际行动，来表达对你们的谢意！”军管局长黄铎同志对我说：“你不愧是个老英雄、老模范。你赤手空拳，只用三天时间，就办了一个长时间没有解决的问题，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们铁道部队的干部都应该学习你这种不怕困难，舍己为众的精神。”铁道军管局还发出通令，号召铁道兵全体指战员和铁路职工向平壤“火线食堂”学习。并给食堂 4 名工作人员记集体大功两次，给我记个人大功一次。

## 二、抢运军火

1951 年 8 月，朝鲜战场第五次战役中，敌我双方形成内外三层包围着的局势，我军处境十分不利，部队急需补充武器弹药。敌人与我志愿军外线部

队，争有“三江”（大同江、清川江、大临江）的战斗打得白热化。大同江，是我军输送武器、弹药等物资的主要运输线，也是敌人重点轰炸、封锁的区段，敌机昼夜轮番轰炸、扫射，企图炸毁我军这条运输线。我志愿军护桥高射炮部队和工兵以最大的牺牲精神，与敌人展开了争夺江桥的战斗。采取了“你来我打，你炸我修，你走我过”的灵活战术，与敌机对抗，保证了白天随炸随修，晚间抢运过江。

为了争取第五次战役的胜利，上级决定将从苏联购进的新式武器卡秋沙火箭炮和炮弹尽快运往前线。铁道军事管理局接到命令后，为了把军火安全运送到前线，挑选了62名勇敢、可靠、技术熟练的司乘人员，组成以我为队长兼指导员的突击队。这批军火装满两列车，列车代号为“03”、“05”（绝密）。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军事管理总局局长刘居英命令突击队19时开始抢运过江。下午5点钟，离开车还有两小时，我召开了突击队中的党、团员骨干“战前动员会”，挑选了7人分成“03”、“05”号两个乘务组，登车准备出发。

当时，大同江桥和列车将要通过的187.2公里线路区段上空，敌机照明弹高悬，照得地面如白昼，敌我双方的炮火轰击震撼山江，火红一片。在这种情况下，欲将两列车的弹药、武器，安全通过大同江桥及187.2公里长的照明弹封锁区域是何等艰难。但对我们8名突击队员来说，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根本不去想它，只是想如何把这两列车军火运过大同江桥，冲出187.2公里的封锁区，尽快地把新式武器运上前方。为此，我们8名突击队员发誓说：“为了前线战斗的胜利，为了祖国的安全，为了朝鲜三千万人民的生死存亡，就是个人牺牲了，也要把军火运到前线！”

晚上7点整，发车的命令一下，由我驾驶着“03”号军列机车向大同江桥冲去。敌机轮番轰炸，在我地面高射炮群的强大密集的炮火打击下，敌机不敢低飞，只在高空投弹乱炸一顿，未击中目标。我“03”军列在守桥、护路部队掩护下，通过了大同江桥，冲出了187.2公里的照明弹封锁区，于晚22点30分将“03”号军列开到前线沙里院站。志愿军战士们迅速地卸完车。我将空车开到山区停下隐蔽。接着，一辆早已等候的军用吉普车，把我送回到平

壤接运“05”号军列。这时已经是半夜零点了，为了与敌人争时间，我下了吉普车就登上了“05”号军列的机车，在地面部队的强大炮火掩护下，全体乘务员齐心奋战，终于又将“05”号军列开到前线幸木站交给前方部队。

我前线志愿军指战员见到新式的“卡秋莎”大炮和炮弹，如获至宝，连声高喊：祖国万岁！向铁路职工致敬！

当看到卡秋莎炮弹一串串射向敌人阵地，杀伤大量敌人，为我军打开反攻通道时，我们突击队员们激动得热泪盈眶，感到无比欣慰和高兴。事后，我们受到了朝鲜铁道军事管理局通令嘉奖，给我记了一等功。

### 三、保护铁路运输线

1951年1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由坚守转入反攻阶段，前方急需军火和物资。但我们的列车却接连被敌机炸毁，在距平壤314公里处的铁路线上，或方有3列60节货车接连被敌机炸坏，瘫躺在线路上，急需救援机车和抢修线路。铁道军事管理局决定，组成了以我为队长，戴国真为副队长的共180人的“救援队”，另外配属一个高射炮营和200名工兵做掩护去抢修线路。

当时，在314公里处，敌机经常轰炸扫射。我志愿军高射炮营猛烈还击，炮筒打红了，战士们就脱下棉衣沾水围着炮筒降温，继续战斗。狡猾的敌人常顺着铁路线低空飞行进行空袭，同样遭到我军地面部队轻、重武器的射击，打得敌机调头逃窜。

正当我们救援队在紧张起复机车时，敌人又派来了3架“B—29”重型轰炸机，在1万多公尺的高空上，向下投掷了72颗重磅（每颗180英磅）定时炸弹，每颗定时炸弹都带一个降落伞。就在这严峻时刻，我同副队长戴国

真和当地军事代表张同志二个人商量，决定搬掉这些定时炸弹。我们三个人首先带头搬掉第一颗定时炸弹，戴国真抱住弹的前部，我和张同志用绳拉，送到远处的山沟里。回来我就笑着对救援队员们讲：“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美国的定时炸弹吓不倒我有英雄虎胆的铁路工人！”我们又告诉队员们如何防备，抬时应注意事项和如何拆除定时炸弹引爆装置…。接着 180 名救援队员们每 3 个人为一个战斗组，在我们 3 个人的带领下，抬的抬。拉的拉，20 多分钟就把 72 颗定时炸弹排除了，敌人的阴谋失败了。起复机车的工作又开始进行。到中午时分，线路已修复，3 台机车和 52 节货车也被起复上了轨道，另外 8 节货车因毁坏严重被排除在线路外。突击抢修后，开进黑桥山洞（隧道）里进行全面检修，保证了前方部队作战需要。志愿军总部和铁道军事管理总局通令嘉奖我们，并向全志愿军、铁道兵部队和铁路职工发出号召。向在 314 公里起复机车的救援队员们学习，学习他们不怕牺牲，排除 72 颗定时炸弹和起复机车的大无畏精神。

1952 年至 1953 年间，我先后被任命为朝鲜西平壤机务段军事代表兼段长、平壤铁路分局机务科长、救援队长、平壤分局副局长、代理分局局长等职。我在担任这些领导职务前后，正是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垂死挣扎，野蛮轰炸的阶段。两年时间仅在大同江铁路大桥附近就投下炸弹两万多枚。尽管这样，但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部队和中朝防空部队以及铁路职工的坚决回击下，铁路运输仍畅通无阻，为我军打败敌人保证了武器、物资等的供应。我在担任领导工作中，经常深入到前线，积极搞好中朝职工的团结。为了解决材料不足、工具缺乏和设备不全的困难，我就发动中朝职工修复大小闸瓦、各种阀门、涨圈等 7000 多件，保证了机车检修和军运任务的完成。西平壤机务段连续三次获得朝鲜铁道省优胜循环红旗，并被评为模范机务段，机车站也荣获模范机车站的光荣称号。我个人也先后荣获一等功、二级模范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一枚，二级战士荣誉勋章一枚，三级国旗勋章一枚。受到过毛泽东主席和金日成首相的接见。

1953 年停战后，我仍留在朝鲜帮助恢复铁路建设工作。1954 年 4 月 18 日回国。三年的战斗生活，至今难忘。

（作者系离休干部。原大连铁路分局工会第二主席张春在整理）

## 赴朝战勤司机中的五位功臣

### 交通局史志办

为了支援抗美援朝，1950年10月31日夜，东北人民政府电令，向旅大征调载货汽车150辆，司机和助手各150名。根据电令，11月2日，旅大行政公署主席韩光令：征调150辆汽车。其中建华公司（私营汽车）40辆、远东电业公司25辆、中苏渔业公司20辆、旅大行政公署商业厅10辆、旅大交通公司8辆、大连港湾管理局8辆、旅大行政公署工业厅7辆、大连铁路分局6辆、大连粪便管理处5辆。大连船渠5辆、旅大水产公司3辆、旅大行政公署交通厅3辆、大连建新公司3辆，大连造船建厂委员会2辆、旅大农场2辆、旅大合作总社1辆、旅大行政公署烟酒专卖局1辆、大连劝业工厂1辆。各单位接受任务后立即派出车辆。在大连市人民体育场召开誓师大会后，分成三批，自3日起相继由大连火车站出发，直奔朝鲜战场。

根据上级指示，旅大市于1951年成立了汽车司机训练大队，先后培训司机1258名，分别送往东北军区和朝鲜前线。

我市赴朝战勤司机在朝鲜前线运输线上，留下了许多英勇悲壮的事迹，建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功勋。1952年—1953年7月，旅大赴朝参战人员中，共有121人立功。我们所写的这五位司机，便是其中的一部分：

#### 一、特等功臣杨在先

赴朝前在大连建新公司任汽车司机，自参加战勤汽车运输以来，每次都抢先接受最艰苦的任务，而且都完成得很好。别人一车拉三吨货物，他拉四吨，在行车路上从未发生过事故。他时刻不忘检查保养自己的汽车，还主动帮助别人检修汽车。

有一次，他不顾敌机轰炸，奋力抢出物资，避免了损失，随后又连夜把物资送到目的地。

1951年国庆前夕，他光荣地被选为国庆观礼的代表。

#### 二、一等功臣单永和

入朝前在大连中苏渔业公司任汽车司机，1960年第一批参加了支前运输。

他在一次夜间驾车通过新溪平原时，敌机封锁了全区几十公里路面，照明弹布满夜空，路面上复盖着厚厚的冰雪，车辆多，道路滑，在通过该封锁区时，有的汽车被打中燃烧，有的战友负伤，还有的战友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单永和驾车冲进去，行驶了几公里后，敌机猛烈地向他扫射，连续几次打得车前后冒“金花”，他把汽车从公路开到野地里，约经一华里后才甩掉了敌机的跟踪射击。

一天早晨，在纷纷大雪的掩护下单永和驾车跑了几十公里，到了一条大江边上，可是大桥已被敌机炸断。他和助手下车在几百米宽的江面上“探路”，江面上铺盖着十尺厚的积雪，下面是冰层，江心冰层下哗哗的水流声不断。他把车退回几百米后，再以高速冲上冰面，不顾冰层吱吱作响，冒着随时都有可能掉进江心的危险驶向对岸，胜利地到达目的地。

他参加过第一次到第五次战役和上甘岭战役、铁原战役的运输，都战胜了地理不熟，夜间出车，冰冻路滑的困难，一次又一次地通过了敌人封锁

区，突破了敌人的炸弹、子母弹、细菌弹、燃烧弹，各种三角不倒钉的障碍，完整的保存了车辆，出色地完成了运输任务。

1951年10月，在完成铁原战役30天的抢运任务中，他超额完成单车任务的220%，荣立了二等功一次。

1952年7月，在战争中安全行车两万多公里，荣立二等功一次。

1953年1月，车辆完整无损，安全行车四万公里，荣立二等功一次。

1953年9月，安全行车五万八千公里，被树为全团的爱车典范，荣立一等功一次。

### 三、一等功臣杨自立

杨自立原是大连建华汽车公司司机助手。1950年11月参加赴朝战勤运输，12月任汽车司机。

1951年6月29日，他在运输途中，发现敌机投下的三颗风雷弹（风雷弹一触即炸）挡住了去路。这时已有数十辆汽车停在路上。杨自立跳下车用木棍做成三角架，拴上一根草绳，毫不畏惧地将三角架放在风雷弹外围，跑出十几米外拉动爆炸，排除了障碍。

1952年6月某日夜晚，他驾驶汽车执行任务，被敌人使用照明弹发现，敌机俯冲扫射，他加速猛跑，车箱和后轮胎被燃烧弹打中起火，他跳上车箱用大衣扑灭火焰，又迅速跨进驾驶室将车开出一段路停下，再用草包扑灭了后轮胎上的火，待敌机重绕回来扫射时，找不到目标，子弹只落在车的周围，保住了汽车。

一次天降大雨，杨自立看到一辆汽车陷在泥坑里，他主动开车去拖，但因沟深路窄，连拖几次没有成功。大雨淋透了衣服，大家都冷的发抖，杨自立却跳进泥水里，接上钢丝绳，动员了三台汽车，终于把车拖了出来。自1951

年6月到1952年2月，杨自立共出车223天，行驶27984公里，超额完成货运任务99.14吨。

#### 四、一等功臣王培玉

赴朝前在大连交通公司工作，参加战勤运输期间从未损失过一辆汽车。部队驻山阳里，他有病仍坚持工作。在去战地拉伤员时，别人拉一趟，他坚持拉两趟。部队由“汉城”撤退时，他考虑到冬天冰冻路滑，行车容易发生事故，主动拉回一车敌人留下的防滑链，为支前运输，安全行车做出了重要贡献。

#### 五、一等功臣刘长生

刘长生是志愿军某部汽车团修理连副班长。他是大连长海县沙尖村人，曾在本市电工局十一厂工作。

他善于在困难环境中开动脑筋，想办法，克服工作上的困难，创造新工具。1951年8月按装电锯时，因没有起动电机的转换开关，电锯无法使用，他为了完成任务，用汽车电源开关，改制成一个电机开关，顺利地完成了任务。为了减少不应有的事故，他又改造了一个汽车发电机调节器，避免了停电时储电池倒灌现象。他还做了一个警报喇叭装置，当电机及电源设备发生故障时，它能及时发出警报。为了提高充电机的充电量，他利用业余时间寻找旧器材，东拼西凑，做成了一个全波整流器。

1951年9月，经他努力修好了一台已经报废的旧发电机，继续发挥作用。有一台发电机没有散热装置，每发动四小时，就必须停机冷却一小时，这时他用普通小电机改制了一台电风扇，放在发电机对面。使电机得以冷却，提高了使用效率。他改造了焊储电池的工具，用铁套、钢板制成模具，修复储电池接线报头，既提高了质量又提高了效率。

## 一切为了前线

姜云发

1950年11月，我们旅大罐头厂（现大连罐头食品厂）接到了东北军区下达的为志愿军生产罐头食品的紧急任务。面对军需生产品种新、产量大、质量严、时间紧等种种困难，厂党政领导把这项工作作为一项光荣的政治任务接收下来。组织全厂职工战胜重重困难，较好地完成了军需生产任务。自1950年11月至1951年11月，全厂共生产各类罐头2387吨，其中450克清蒸鱼罐头724.5吨，440克清蒸鱼罐头994.7吨。550克红烧肉罐头667.7吨。受到上级的表扬。

旅大罐头厂接收军需生产任务后，首先向全厂职工进行政治动员。先后召开了两次大的动员会和两次忆苦思甜会，深入发动群众，广泛宣传生产罐头食品支援前线的重大意义，激发了全厂职工对帝国主义的无比愤慨，对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无比热爱，对朝鲜人民的深情厚谊。大家纷纷表示，要向志愿军学习，为了前线打胜仗，我们要大干苦干多流汗，完不成任务决不下火线。各车间、班组和个人都写了决心书，进行了挑应战。同时，全厂还成立了读报组、文艺组、板报组、家访组，密切配合，大造声势，把思想工作做到每个人、每个角落。全厂职工在“前方流血，后方流汗。”“多生产一个罐头，就多消灭一个美国鬼子”的口号下，迅速投入到了军需生产热潮中。

生产军需罐头食品对旅大罐头厂来说，是一件新的艰难的工作。军事部门在罐型、口味、质量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和要求。为此，按照上级机关和军事部门的意见，技术部门首先进行了新产品试制工作。在几个新品种中，经过化验、鉴定、试尝，最后确定以当时仅有的白敏子鱼、黄花鱼、牙片鱼和猪肉为原料，制做清蒸鱼罐头和红烧肉罐头。根据军事部门的要求，鱼罐头的重量不能超过450克。容量450克的罐型为三号罐，其直径是83.5毫米，我厂从未生产过。制造三号罐在技术、设备、加工等方面都有很多困难。厂里自行设计了三号罐的胎模具，请私营振兴铁工厂（现大连第二机床厂）加工。

但该厂一连加工了两套模具，都因达不到精密度而报废。在此紧急情况下，厂制罐工段技术人员和老工人主动的提出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加工制作胎模具。为此，成立了由技师黄雨生为组长，邹景滋、吉田健次（日本人）、初孔思、刘学斌、陈希江、劳什金（苏联人）为成员的技术攻关小组。黄雨生、邹景滋、吉田健次、初孔思负责制罐系统研制工作；刘学斌、陈希江负责制盖系统研制工作；劳什金负责加工配件工作。他们用已报废的胎模具。自己动手，用铁锯割、锉刀锉、油石磨，以蚂蚁啃骨头的精神，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昼夜不停的研制，并且迅制作、迅安装、迅研磨、迅试车，用了40多天的时间，终于研制成功了合乎质量要求的新罐型，并及时投入了生产，保证了实罐生产的按时开工。在研制三号罐的日日夜夜里，技师黄雨生同志一马当先，始终站在第一线，带领大家一起攻关。他患有严重的气管炎病，经常喘不上气，在试制的一个多月里，住在工厂，日夜跟班。病犯了，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仍坚持不下火线，得了感冒发烧，吃支糖葫芦继续奋战。保证了研制工作的正常进行。

军需食品——清蒸鱼罐头投入生产不久，70%的鱼罐头出现了凸盖等质量问题。特别是发运到朝鲜前线的罐头也有不少凸盖的。直接影响了前线的需要。不合格产品的出现，使厂领导和广大职工心急如焚，焦虑不安。为此，发动全厂技术人员和工人，查找问题分析原因，总结经验教训。经全体技术人员的多次检查化验，发现凸盖的主要原因是保温期限不够和密封不严造成的。经过技术人员细致的试验研究，延长了罐头保温时间，改进了液胶方的配比，加强了杀菌和封口工序的严格管理，使废次品下降到1—2%，达到了上级规定的质量要求。质量问题解决之后，全厂职工又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冲天的革命干劲，发扬爱厂如家、一心为公的主人翁精神，勤俭节约、艰苦创业、精心操作、一丝不苟，互相帮助、团结协作，夜以继日地战斗在生产岗位上。并且开展了红旗竞赛和立功运动，车间内，你追我赶，热火朝天，一连三个多月不休息，甚至春节也不休息一天。每天的生产指标连连被突破，由最初的日产罐头5000罐，上升到8000罐，最后突破了1万罐大关。老工人金凤兰、米桂梅、崔秀英、杨春梅、孔宪英等以当家做主的姿态，大干苦干连轴转，每天都是早

来晚走，重活累活抢在先。有时电车停电不通车，很多家住寺儿沟、台山屯、甘井子、老虎滩的工人都步行到厂，小跑到车间，不耽误一分钟。特别是生产组长金凤兰同志，在大干中，不忘做政治思想工作，不忘关心工人生活，坚持谈心，坚持家访，使全组同志热情高，团结紧，纪律严，干劲大，一直保质保量的完成班组生产任务。因而在 1951 年被评为旅大市先进班组。金凤兰同志当年也荣获旅大市先进生产者称号。

1951 年春节时，广大职工主动放弃休息，为了前线打胜仗，大年初一早上，吃了饺子就高高兴兴地上班。全厂春节这一天无论是干一、二班的（白天），还是干三班的（晚间），出勤率都达到了 100%。当工厂领导包饺子慰问职工并招待苏联专家时，苏方人员伸出大姆指连连称赞说：“中国工人真好。没想到工厂给工人准备这么好的饭，没想到今天出勤这么好，真了不起！”

初一凌晨，当工人们正在紧张生产劳动的时候，旅大市委书记欧阳钦、市长韩光、市委宣传部长康敏庄、市总工会主席沈涛等领导亲临我厂，深入到各个车间，热情慰问为了支援前线而在节日期间坚持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同志们。市领导走近作业台旁，来到工人中间，向工人拜年、向师傅问好，祝贺大家春节愉快，身体健康。并亲切说：“同志们辛苦了！”市厂领导的慰问和关怀，更加鼓舞了全厂职工的干劲。在全体职工的努力下，旅大罐头食品厂较好的完成了军工生产任务，为抗美援朝的胜利，贡献了一份力量。

（作者系原大连罐头食品厂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 研制反坦克 90 火箭弹

张 济

我们国营五二三厂（前身大连建新公司）创建于 1947 年，是一个军工生产单位（抗美援朝时期厂名八一工厂）。自建厂以来，我厂生产了大量的迫击炮和枪支弹药，提供部队需要，为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尤其是我们生产的炮弹在两次战争中都发挥了巨大的威力，正如粟裕同志所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和人民的支持分不开的，一是山东人民的小推车，一是大连提供的大炮弹。”东北军区军工部何长工部长说：“五二三厂在抗美援朝中做出了重大贡献，是个功勋厂。”回忆当年那种一切为了前线的火热生产场面，尤其是为支援朝鲜战场的 90 火箭弹的生产，倍使我难忘和自豪。

那是 1950 年 11 月份，我厂奉命恢复军工生产后不久（解放战争胜利后我厂逐渐停止了军工生产），便接受了东北兵工局下达的研制生产反坦克火箭弹的任务。由于刚刚复工不久，我厂在材料、设备、技术等方面有着诸多的困难，但职工们听说美帝国主义的坦克在朝鲜战场上横冲直撞，使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蒙受极大损失后，个个义愤填膺，纷纷表示要抓紧时间多多生产武器支援前线。副厂长叶英等立即组织工程技术人员研制新型反坦克火箭弹。经外出考察和反复研究，他们终于发现了反坦克火箭弹与普通炮弹在结构上的区别。然后，叶英同志又带领工程技术人员，反复研究设计，披星戴月，苦苦钻研，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终于设计出了杀伤力大、穿透力强的单喷孔、带尾翼、不旋转式的 90 毫米新型反坦克火箭弹。而且这种火箭弹比国外的多喷孔、无尾翼、旋转式的火箭弹的稳定性好。但是，产品精确度要求高，质量要求严，机械加工难度大，而且引信和火药也不易解决。要求在短期内研制出合格的产品，难度非常大，问题不少。八一工厂的全体干部和工人，知难而进，想前线之所想，纷纷表决心，宁肯“后方多流汗”，不愿“前方战士多流血”，以大无畏的气概和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精神，勇敢地挑起了这副重担。

技术人员与全体职工群策群力，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如期的完成了任务。

90 火箭弹整体由战斗部壳体、发动机、尾部本体三大部体（或三大段）组成。设计要求，三大体均需径水压机压制成型、机械加工等多种工序，需要有上百套工装。按照设计程序与加工制造周期，至少需要 3 至 4 个月的时间。而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打破了常规，采取边设计、边制造、边试验，同步进行。交插作业方式，从设计到加工都是昼夜兼程、一刻不停，只用一个半月就完成了设计和全部工装的加工任务。从而为冷加工工序创造了条件，赢得了时间。

水压机压制与成形是一大关键。共产党员、工人出身的干部、旅大市特等劳动模范、东北地区劳动英雄刘仁刚同志带领工程技术人员与水压机工段的老工人一起认真研究、反复试验，终于攻克与解决了火箭弹战斗部壳体与发动机外壳薄壁红压成型的关键技术，压出了合格的毛胚件。

继红压工序后，在机械加工过程中，为了抢时间，保质量，赶进度，工人们以高度的主人翁精神，认真工作，精心操作，做到了件件合格，个个符合设计装配精度要求。

发射药支架（又称隔板）公差要求严、配件多，是关系射手人身安全的重要装配件。为了保证设计要求，技术人员和工人花费了不少心血和汗水，特制两种精密夹具和专用锐刀，解决了这一关键问题。在解决了一个个加工问题的同时，又设法解决了引信问题。

因此全体干部、职工以“只争朝夕”、分秒必争的干劲，连续攻下一个个生产技术难关，仅两个多月时间就试制成功了 90 火箭弹。1951 年 5 月向毛主席报捷。经过靶场试验（采用土办法进行强体的性能及火箭弹空中飞行稳定性情况打靶试验），结果 7 英吋厚的钢板被穿透了（美国在朝鲜使用的中型

坦克前装甲厚度不到5英吋），而且20发火箭弹发发中靶。发射速度、射程等主要技术性能指标都是先进的，质量是高的。

试验之后，便进入了生产阶段。

当时朝鲜战场战斗十分激烈，为了使火箭弹能早日供给前线，八一工厂的各生产车间的工人都是实行三班倒工作制。工厂的党、政，工、青干部还自动自觉地实行了每天上午办公下午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制度。装配车间铸装了大量的炸药包无力量装箱运出，时值炎热的夏天。当时就在厂里搭起了遮阳棚作为生产场地。赵俊厂长带领厂部机关人员把炸药包的装箱任务包下来。并亲自看着把一辆辆军火车安全运走。90火箭弹的发射药支架是一种难装配的零部件，党委和工会的干部主动把这项任务包下来，以办公室为装配工房，敲敲打打干起来，不少同志手上磨出了血泡，不叫一声苦，连续夜战不怕累，人人汗水流满面，直到胜利完成任务。当前线传来敌人的坦克被我们的火箭弹一一摧垮的消息时，全厂职工是多么兴奋啊，那情景至今犹在眼前。

（作者系大连五一三厂史志办主任）

## 在朝鲜牺牲的三位大连籍烈士

市民政局史志办

一等功臣林作玉

林作玉同志，辽宁省新金县皮口镇石固村大柱屯人，1925年12月生，1947年8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林作玉同志入伍后，曾参加过锦州战役、平津战役，南下广西、雷州半岛等地，并多次立功受奖。1950年10月，当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炮火烧到鸭绿江边，严重地威胁着我国的和平与安全时，林作玉同志所在部队响应党的号召开赴朝鲜前线。他在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上，发扬了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表现了顽强的忘我牺牲精神。在第二次战役期间，他所在的工兵连在清川江上架设浮桥时，他和战友们冒着零下20℃的严寒在水下作业，以致劳累吐血，但仍不肯休息。一次发洪水，一位朝鲜老人不幸落水，他发现后当即跳入水中救出。在第五次战役中，他所在部队奉命开赴上甘岭，一天下午工兵连一排正在上甘岭阵地开会，突然美帝七八架飞机向阵地上投下大批燃烧弹，熊熊烈火威胁着战友们们的生命安全，排长当即命令全排疏散隐蔽。大火过后，全排清点人数时只少了林作玉同志一人。经全排分头寻找，发现一具烧焦了的尸体。经调查才知道，林作玉同志在大火来临之际，首先想到的是战友和武器的安全，敌机投弹时他飞快地跑到山下防空洞里，背出了有病的战友代玉清，把他转移到安全地方后，又跑回山上去取自己的机枪。当他的手刚刚抓到机枪的把柄时。由于疲劳和伤势过重，再也没有立起身来，无情的烈焰吞噬了他年轻的生命。时年仅27岁。

为表彰他的英雄事迹，1953年8月17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为他追记一等功，同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追授他二级英雄荣誉勋章

### “爆破英雄”王宝福

王宝福同志，大连市金州区大连湾镇前关村人。1926年生，1946年春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战士、副班长。

王宝福自幼家境贫寒，旅大解放，村政权建立后，便主动到村上帮助工作，后参加金县保安队，1946春参加东北民主联军。入伍后工作积极，作战

勇敢，从祖国的东北到海南岛，北战南征万余里。多次荣立战功，在解放四平战斗中，由于舍身炸碉堡，荣获“爆破英雄”称号。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份，王宝福所在的四十军，第一批高举“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旗帜，雄纠纠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他目睹了侵略者所犯下的触目惊心的罪行，桥梁被炸毁，道路被破坏，人尸畜骸，触目皆是，昔日的村镇，夷为平地，瓦砾成堆，废墟一片。凄惨之状，目不忍睹。他的心简直要碎了，他下定决心，勇敢杀敌，为朝鲜人民报仇。英雄二连经过几天的急行军，10月25日在温井地区同李承晚伪六师一部遭遇，于是打响了入朝后的第一仗，同时也拉开了志愿军第一次战役的序幕。首战告捷，接着北上，围歼了楚山一带的李伪军。敌人不甘心失败，在东西两线对我发起总进攻。于是从11月25日开始，我军又发起第二次战役。王宝福所在团的任务是卡住敌人沿清川江南逃的退路，并由南向北配合兄弟部队歼灭新兴洞的美国侵略军。11月25日晚，在连长顾玉才的带领下，冒着零下20℃的严寒，艰苦地渡过了60多米宽的江面，向敌后穿插，到达了龙砚洞，经过一夜激战，终于阻住敌人南逃。27日苏明洞的敌人在我军打击下开始向球场方向撤退，二连又担负了阻止敌人夺路逃跑的任务。为此首先得控制486高地，经过两个小时激战，控制了制高点。但连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连长牺牲了，连队减员很大。当夜十点钟王宝福又随部队向龙水洞发起进攻。经过争夺，占据了敌人阵地，敌人又进行了疯狂的反扑，王宝福意识到严重性，他瞪大了满是血丝的眼睛，满腔怒火，手攥几颗手榴弹，果敢地向敌坦克冲去，只听“轰隆”一声，坦克在原地打着转转开不动了。而王宝福也倒下了，殷红的鲜血，浸透了他的棉军装”……

#### 特等功臣王福清

王福清同志，大连市金州区大魏家镇后石村人。生于1923年。解放前，在大连东关街共和汽车修理厂当学徒。解放后，他先后在金县土产公司，金县粮食公司当汽车司机。1950年11月13日，王福清自愿参加了抗美援朝的战勤运输工作。

王福清同志在抗美援朝运输工作中，发扬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精神，工作认真负责，创造出许多英雄业绩。从1951年1月至1951年10月，王福清安全行车33041公里，运输物资399.7吨，超过规定任务的94%。同时节油3491升，并创当夜往返行车300公里的行车纪录。

在一次夜间执行任务中，王福清不断遭到敌机的扫射和轰炸，他机智勇敢地借着敌机投下的照明弹的光亮，迅速冲出危险地带，开辟了一条行车道路，使后边的汽车也及时冲出了危险地带。1951年7月1日，王福清荣立特等功。

1951年8月14日，王福清在执行任务中负伤，随即被送入医院，伤未痊愈就坚决要求出院，经大夫同意，带药返回前方。王福清从9月26日出院至10月31日牺牲止仅35天时间里，出车21次，行驶5300公里。10月31日晚间，在执行任务途中，遭敌机轰炸，身负重伤，不幸光荣牺牲，年仅28岁。部队党委根据王福清生前的申请，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51年11月14日，旅大市抗美援朝分会在市人民文化俱乐部隆重举行王福清烈士追悼大会。王福清生前所在团政治处主任吴万里同志，在追悼会上介绍了烈士生平的英雄业绩。

王福清烈士现安葬在金县烈士墓地。

## 记参加抗美援朝的一段经历

赵德祯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时，我在金县（现金州区）合作社工作。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我们金县也和全国其它地方一样，很快掀起了踊跃报名参军参战的热潮。

一天，县政府机关党支部书记找我谈话，说前方急需汽车司机，问我能否去。当时我父母都疾病缠身，家中还有一个又盲又傻的弟弟，家庭确实需要我来支撑。但我还是毫不犹豫的答应了。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知道党员就得服从组织需要，保卫国家是党员应尽的义务。就这样，我和其他一些同志来到市里集中，由大连乘火车经沈阳到了新民县。休整数日后，我们又乘列车到达辑安。刚下车我们就看到四架敌机在江对岸朝鲜境内轰炸和平居民。目睹这一惨景，同志们无不义愤填膺，坚定了打败美帝的决心。

部队领导把我们这些新兵安排好后，便开始了教育和训练。学习过程中，大家都极大地提高了政治觉悟，进一步认清了美帝的侵略本质，并鼓起了斗志。不久。车队相继建立，我们的建制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暂编汽车第一团（实属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后勤部序列），当时我被编入该团八连九班，并任班长。连队里有解放军老战士和地方去的新同志各一半。

战斗任务下达了。我们的任务是：向前沿阵地运送各种军用物资。正值隆冬，当地气温经常在零下30多度。崎岖的山路使驾车行驶极其艰难。上空敌机活动猖獗，一旦被敌机发现，随时都会车毁人亡，这对我们新兵无疑是个严峻的考验。入朝初期，生活非常艰苦，每天不但吃不到菜，连热饭也吃不上。为不使敌人从炊烟中窥探出我们行车的轨迹，每次执行任务之前，我们都到百姓家借石磨，将高粱米磨成面粉，做成高粱面饼子，带在车上做为食品，这样三餐就啃着又冻又硬的饼子。生活虽很艰苦，却没有一个叫苦的。随着前方战斗不断取胜，阵地向前推进，我们连队也跟着前移。与此同时，祖国人民也把压缩饼干、炒面之类食品，源源不断地从后方运到前线，在主副食上有了很大改善。到了1952年，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当全国人民捐献的飞机、大炮出现在战场上的时候，更激励起我们的斗志。运输战线上的汽车兵，个个都表现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气概，千方百计地抢时间争速度，把物资尽快的运到前方。每逢执行任务，一旦发现敌机来扰，就关闭车灯，在夜幕下摸

索前进。丧心病狂的敌人，也极其狡猾，为了截断我军供应线，依仗他们的空中优势，几乎天天夜里轮番出动，专门攻击我们运输车队。他们的手段是发现目标立即扫射轰炸，即使没有目标，敌机也不时的从空中摔出照明弹沿着公路搜索一阵，实在无招可施，就按照公路走向，滥炸一气，公路和桥梁遭破坏程度可想而知。那时我们多么希望祖国早日有一支强大的空军啊！

但敌人无论使出多少花招，都阻挡不了我们的运输。由于敌机活动猖狂，又无规律可抓，所以，为做到万无一失，我们坚持晚间出车，若遇到雨雪等恶劣天气，敌机视觉不灵，同志们就昼夜不停的连轴转，疲倦了在路旁停下车打个吨，然后继续行驶。

在与敌人较量中，我们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1952年3月7日夜，我驾车从阳德往上甘岭等地运送物资，途经洗浦里附近时，突然与敌机遭遇，敌机投下一串串照明弹，我的车已在光线照射之下，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立即加速行驶，以摆脱照射，没想到敌机仍在继续沿公路往前布挂照明弹，被照亮的路途太长，在我冲出之前就被敌机盯住了，敌机向我投下一颗凝固汽油弹，连车带货刹时着起大火。随车的副司机，因刚入朝不久缺乏临战经验，匆忙跳车，不见踪影。而尾随我车后面的一辆车子的副司机，也因缺乏经验不能应变，惊慌失措竟偏离方向，冲入大火之中……。当时，我眼见火舌从挡风玻璃卷进我的驾驶室，一时间觉得呼吸困难，于是使劲憋了一口气，迅猛冲出烈火的包围圈。接着，我便下车卧倒，就地滚了出去，不意滚进冰雪刚溶化的壕沟里，身上的火随之熄灭。稍停片刻，我爬出了壕沟，奔向停车的地方，当我找到副司机时，只见他全身被火焚烧，棉衣仍在着火，我马上将火扑灭。另一位战友（尾车副司机），则已被烧得惨不忍睹。这时我又扑向还在着火的一辆车，跳上车去，把能救出的东西掀到车下……。此时此刻，敌机仍在上空盘旋。

当车队领导赶来时。我的脸部已肿胀得连眼睛都睁不开了，与副司机一起被送往野战医院接受抢救治疗。因驻地医院医疗条件差，加之敌机活动猖狂，住院十天左右，领导拟将我们转到后方医院。转院前，都需进行外伤换药处置，万没想到就在我的战友——副司机腿部伤处绷带解开的瞬间，动脉崩开，他竟因失血过多而牺牲了。战友的牺牲，使我想到，副司机不在了，这里虽然医疗条件差，但留在当地治疗，治好了可以很快地回连队，继续和战友们并肩战斗，完成烈士们的未竟事业。领导批准了我的请求。住院治疗了三个月后，我又回到了连队。一直战斗到中朝人民打得美帝被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为止。1953年11月，我回到了离别三年之久的祖国。

入朝期间，我做了一个志愿军运输兵应做的一点工作，却多次受到组织上的奖励，我个人和所在班多次荣立战功。复员后，我一直享受荣誉军人待遇。功劳应属于党和为国捐躯的烈士们，是他们用生命和鲜血保卫了共和国。

（作者系金州区爱委会退休工人。谷庆福整理）

## 忆反细菌战的战斗岁月

徐元辰 孙恒久

1952年初，美帝国主义在侵略朝鲜战争中，疯狂发动了灭绝人寰的细菌战争，并向我国东北部分地区投掷了细菌弹。这样，反细菌战，就成为一项摆在我市人民面前的重要任务。

在中共旅大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我市广大军民坚决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美帝国主义细菌战，进行灭虫消毒防疫运动的号召，大力贯彻市政府关于春季防疫卫生运动的动员令，同仇敌忾、雷厉风行地掀起反细菌战的斗争热潮。在以市长韩光为主任，副市长于谷莺、市政府秘书长任仲夷等同志为副主任的市防疫委员会的统一指挥下。旅顺市、金县、长山县、中山区、西岗区、岭前区、营城子区、甘井子区、小平岛区迅速建立了组织指挥系统。基层疫情虫情报告小组遍及各个街道、村屯。

城乡各地先后召开声讨大会 34 次，动员大会 57 次。3 月 2 日大连医学院细菌学系全体师生集会，愤怒声讨美帝发动细菌战争。3 月 10 日旅大各界人民集会，声讨美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3 月 11 日旅大七大人民团体联合发表声明，抗议美帝投掷细菌弹散布细菌的罪行。3 月 12 日，旅大 1000 余名卫生工作者集会，决心积极参加反细菌斗争。3 月 26 日旅大志愿军家属纷纷给报社写信，要求转告并勉励前线亲人多多消灭美国细菌战犯。

党政军民学一齐上阵，反细菌斗争迅猛展开。时有 120 万人次参加了四次大规模的灭虫消毒防疫运动。广大军民清扫垃圾，消灭“四害”，治理沟渠，投药消毒，城乡卫生面貌为之一新。光是用于消杀虫害的药物就达 50 多吨。各行各业要车出车，要人出人，到处一派战斗景象。

在反细菌战的斗争中，市委、市政府和市防委会领导同志昼夜轮流值班，坐阵指挥。市防委会疫情组、防疫组、药材组、交通组、宣传组、秘书组等日夜坚守岗位，并经常深入第一线，广泛宣传动员社会各阶层出人出车参加战斗。出任市防委会副主任的市民政局局长崔更生，市卫生局局长舒相年、市公安局副局长陈佛、市教育局副局长吴燕生等同志熬过许多不眠之夜，精心组织和亲自参与各项活动。

市防疫大队每次接到虫情疫情报告后。都立即出动，开赴现场，就地封锁调查，消杀虫害，不留任何隐患。记得当年夏季，在旅顺三涧堡白菜地发现大量黑蝇，在金县北大河水库发现许多摇蚊，在沿海区域发现罕见的飘虫、飞蛾、红蜘蛛、红蚂蚁。接到报告后，市防委会防疫组负责人孙恒久、徐元辰和顾问何琦、伍律、魏曦、乔树民等人带领防疫人员立即分赴出事地点，进行紧急处理。所有专家、医师、防疫员，无不斗志昂扬，日夜奋战，经常是废寝忘食，全力以赴。对可疑昆虫、异物均经过专家一一检测鉴定。对死因不明的昆虫、异物也就地逐一进行剖检。

为保护市民饮水安全，我们定时进行大氯量饮水消毒，公安人员也设岗保护水源安全。为控制疫情发生，上千名医务人员组成若干免疫注射小组，深入城乡基层，为 100 多万人分别进行鼠疫、霍乱、天花的预防接种。

韩光、于谷莺、任仲夷等同志，不仅经常开会研究斗争形势，而且时常亲自到街道、厂矿检查指导，面对面的解决问题。7 月 24 日市委书记欧阳钦、市长韩光、副市长乔传珏等同志，带人深入院校、医院、公共场所、城郊结合部检查防疫情况。众多的基层干部、医学院校师生，跋山涉水，风餐露宿，经常活跃在街委村屯、荒野海滩，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先进人物。

8 月，市防委会在劳动公园举办“反细菌战展览会”。通过照片、图表、漫画、实物、标本，充分展现了旅大军民反细菌战的战斗情景。这些展品无不寓爱国之情于卫生运动之中。先后约有 50 多万民众参观了展览，受到了生动的实际教育，激励了斗争热情。

当年 12 月，毛泽东主席发出“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的伟大号召；周恩来总理提出“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新方针。旅大党政领导机关认真执行党中央、政务院的指示，坚持不断，深入开展除害灭病的活动。并以丰硕成果给美帝发动细菌战争以迎头痛击。1953 年 2 月，旅大各界人民代表座谈影片《反细菌战争》一致认为，必须深入开展全社会卫生运动，彻底打败美帝细菌战。

同年 3 月，旅大市第一届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宣告成立。4 月 24 日韩光、乔传江等同志深入旅顺、金县察看春季爱国卫生运动情况。

大连医学细菌学系教授魏曦、医学昆虫学教授何琦、细菌学系副教授魏文彬还参加了国际科学委员会《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的事实》的工作，为全国、朝鲜反细菌战斗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均系大连市卫生局离休干部）

## 抗美援朝时期的大连分类战伤医院

郜 梅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时，我正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学习。同年8月我校基础部分搬迁至黑龙江省北安市。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开始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

为了支援抗美援朝，东北军区决定组建数十所后方战伤医院。决定从医科大学中抽调部分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学员，参加组建医院工作。经过申请，上级批准了我和25名同学参加组建医院工作。11月中旬，我们告别了母校，驱车南下到沈阳东北军区卫生部报到。蔡知廉、潘修身、李博文、程春起和我被分配到大连。

来到大连后，我被分配参加组建大连第一所分类医院的工作。建立分类医院，在当时还是个创举。这主要是根据苏联卫国战争中的经验而创办的。专家们认为，在医院比较集中的地区，为了有计划的使用专科医务人员，为了杜绝伤员在医院内部交叉感染，医院必须建立入院处组织，对伤员进行分科分类，克服管理上的弊端。过去一所医院什么样的伤员都收，医务人员不能集中使用，业务上不易发挥个人专长，结果必然使医务人员“样样通，样样松”。建立分类医院后，凡是从前线下来的伤病员，都必须先集中到分类医院，分类医院根据伤员伤情病类进行分类和严格的卫生处理。然后，再送到各专科医院治疗。

旅大市委、市政府对组建后方医院高度重视，号召全市人民及各厂矿、机关、院校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物捐物。在全市的支持下，旅大医管

处（专门管理战伤医院的机构）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迅速组建了十三所医院和治疗所。病床 5000 余张。旅大市政府将大连海港检疫所（现大连传染病院）交给卫生部门组建分类医院。在各方的支持下，当年 12 月底分类医院即组建成。原海港检疫所所长李祖光同志任分类医院院长，我任副院长。医院是半军事化组织，设有政委（现役军人）。机构有政治处、医务科、财务科、总务科、护理部。人员有医生 15 人，护士 40 人，护理员 40 人，技师 15 人，政工 8 人，另外还有 4 名苏军军医，加上其他工作人员共有 200 多名。病床有 200 余张。

旅大医管处直属的十二所医疗单位是：第一医院，头、胸、腹外科。第二医院，上肢骨折外科（肱骨）。第三医院，下肢骨折外科（股骨）。第四医院，一般外科。”第五医院，内科（肺结核）。第六医院，烧伤、冻伤外科。第七医院，一般外科。第八医院，内科（消化系）。第九医院，传染病。第十医院，一般内科。第十一医院，四肢外科。分类医院，各科患者均收。但一般都是在各专科医院床位不足时暂时收容，起缓冲作用。精神病治疗所，接收精神病患者。

分类医院建成后，即开始接收志愿军伤病员。第一批伤员来大连的时间是 1951 年 1 月 23 日，伤病员大多是从丹东、通化转运来的。每批伤病员 200—300 人。来之前，旅大医管处都派出由医师、护士、政工干部组成的分类小组远迎。我们一般都是在大连大石桥车站换上伤员列车。在列车上我们根据伤员的负伤部位及病情进行分类，需要进哪所医院治疗，就发给哪所医院的号牌。如头部负伤发给一号牌（第一医院），烧伤或冻伤发给六号牌（第六医院）。政工干部此时也都深入各车箱，了解伤病员的思想状况，向他们介绍旅大地区状况和分类医院情况，希望他们尊重当地苏军和苏联医生，遵守院规，接受治疗和安心养伤。

志愿军伤病员来连后，全部先集中在分类医院，我们都对他们进行严格的卫生处置。由于前方条件艰苦，因此志愿军伤病员的个人卫生状况都极差，大多数伤员身上都长有虱子。分类医院对从前方回来的伤病员的衣服，被褥以及个人携带的所有东西，都全部进行高压蒸气灭菌或用福尔马林喷雾消

毒。患者本人要进行“三光”（理发、刮腋毛、阴毛、淋浴、更衣、换绷带）。然后才能送到各个专科医院治疗。三年时间里，我们分类医院共接收了 24000 多名志愿军伤员。1953 年停战后，分类医院结束了它的任务，改为传染病医院。

（作者系离休干部，原大连市红十字会会长）

## 抗美援朝时期的后方医院——金县第七康复医院

王 连 明

1950 年 12 月 8 日，东北军区第六医管局在金县（现金州区）金州镇成立了一处后方医院——金县第七康复医院，接收志愿军伤员。我当时是旅大卫生学校学生，由于医院急需人员，我们提前毕业。我被分配到金州后方医院医务科工作。医院设在县政府刚竣工的办公楼内（现区委办公楼）。机构设置：办公室、政治处、医务科、总务科。全院设有病床 400 张。医务科负责管理化验室、X 光室、手术室、石膏室、绷带更换室、预诊室等、设备也比较简陋，仅有小型 X 光机、显微镜、高压灭菌器、手术床和一些外科手术器械。医务人员中有医师 6 人、医士 6 人、护士 30 人、化验师 2 人、X 光技师 2 人，其它职工 70 余人。因人手不足，又聘请当地苏联驻军专家 2 人，医生 5 人，

护士长 1 人，护士约 10 人，参与医疗工作。我院的诊疗工作，可以进行透视、检验三大常规，伤口扩创、截肢、包扎固定。

建国初期，百业待举。金州后方医院除设备因陋就简外，药品供应也很紧张。比如，临床用的青链霉素，一直沿袭院长审批的手续。能代用的尽量代用。好药都用在抢救重危伤病员身上。

第七康复医院接治首批伤员是在 1951 年的腊月三十晚上。每批伤员来时，县政府都组成由党政机关干部参加的担架队，到火车站接收伤员，他们每次都把伤员轻轻的抬下列车，徒步慢行——把伤员送到医院。朝鲜战场开始第三次战役以后，几天就接一批伤员，每次人数多少不等，多的时候上百名。伤员到来之前，丹东患者分离所以密码告各医院。地方按电告的伤员数准备床位和担架队。

抗美援朝期间转运伤病员的专列，没有固定的时间，担架队都是临时组织的，而且是义务劳动。因经过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宣传教育，国防观念和保卫祖国人人有责的思想已深入人心，广大干部、职工都把参加抬伤员的战勤活动，看成无上荣耀的事情，踊跃报名，争先恐后抢着去干。

每接治一批伤员，都由院政委或政治处主任代表军区宣布命令，强调遵守军纪，做到不居功骄傲，拥政爱民等。医护人员待伤员象亲人一样，一勺一勺喂水，一口一口喂饭。抢救危重伤员需要输血时，医护人员捋起袖子伸出胳膊就来，把救死扶伤精神寓于具体工作活动当中。因此，与伤员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伤员病愈重返前线时和我们互赠小礼品。政府也给这些同志佩红戴花，象欢送新兵一样，敲锣打鼓，祝愿他们重返战场英勇杀敌，再立新功。当时，省、市、县文工队也经常来医院搞慰问演出。一次，大连话剧团来院慰问演出，伤员发现工作人员一个也未到场，就不约而同都离开了会场，团长一看“炸”了，只好挨个病房又把伤员和工作人员都请了去。

伤员在战场上杀敌个个如猛虎，但进入后方医院，配合医生接受治疗又如羔羊一样服服贴贴。尤其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渴望早日回前线杀敌的精神，无时无刻不在感染着院里每一个工作人员。只要你经常深入病房，就能听到，“我要回前线”、“冲啊”、“杀啊”的呼喊声，这不都是昏迷中的呓

语。记得一位伤员的伤虽然治愈了，但经技术鉴定还不符合返回前线的条件，可是他却天天到政治处去苦苦哀求，最后终于感动了“上帝”，被批准重返战场。他们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翻身得解放的劳动人民子弟，深知胜利果实的可贵，必须用战斗去保卫。他们的文化层次虽然都不高，初中毕业的人寥寥无几。但伤员中有才华的真不少，一位河南籍的某部宣传股长，年龄约三十五六岁，他仅在手掌大小的纸片上写个提纲就能讲一天，把朝鲜战场的战况介绍得有声有色，讲的头头是道，听起来令人信服，更鼓舞人的斗志，是个难得的好宣传员！

在第七康复医院接受治疗的重伤员中，也有不少因伤过重而牺牲的。我们都以沉重的心情为他们开追悼会，把烈士安葬在烈士陵园，长眠在金州这块土地上，他们用生命和鲜血保卫了共和国。我们活着的，应沿着他们的足迹，把祖国建设得更富强、更美好，以告慰九泉之下千万烈士的英灵。

（作十系大连市金州区爱委会办公室主任。谷庆福整理）

## 抗美援朝时期的旅大公安工作

### 公安局史志办

#### 一、加强对敌斗争，打击和制止敌人的破坏活动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隐藏的反革命分子认为时机已到，蠢蠢欲动。有的阴谋暗杀我党政领导干部；有的制造谣言，蛊惑人心，阴挠抗美援朝支前；有的制造故事，破坏生产和交通。这些反革命分子策应美帝国主义侵略，期待国民党“接收”旅大，叫嚣要与人民“算账”，扬言：“到了英雄创造时势的时候了。”他们制作了国民党党旗和胸章。并到处涂写反革命标语。涂写反革命标语的活动延续时间较长，1953年4月30日晚，反革命分子王忠明在劳动公园涂写“反共抗俄”、“打倒朱毛”等反动标语，当即被公安机关捕获。反革命分子还对军事要害部门进行破坏，如周水子、旅顺、金县等地军用电线常被割断。破坏工厂生产设备案件也屡有发生。反革命分子王凤仪在铁路工厂先后进行6次破坏，烧毁配电炉、电气熔铜炉和延压机等设备，造成损失3000万元（东北币）。

反动会道门的破坏活动也相当猖獗。九宫道盘主尹志臣，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潜入旅大地区苏军坦克基地刺探军事情报。老母收元道道首李金普，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四处造谣、蛊惑人心，发展道徒500余名，将道徒编成四个队，声称要在美帝国主义打来时举行暴动，打倒共产党。

早在解放战争时期即与美国和国民党特务勾搭成奸的潜伏特务迟子祥，在抗美援朝期间活动更为嚣张，散布谣言，鼓吹美帝国主义氢弹威力大，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扰乱民心，极力为美国和国民党特务机关搜集旅大地区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1951年，迟子祥被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美帝侵朝后又向中国大陆派遣大量特务。在旅大地区破获的“美特”就有“战略情报局”、“远东情报部”、“海外观察组四十四支队”、“远东军司令部情报处所属东南亚间谍同盟四十九组”、驻南朝鲜的“CIC”、“PPM”、“美军驻韩公报处”、“美海军驻港武官办事处”、“美军驻韩使节团”、“横须贺训练班”、“美军考特部队大和岛派遣部队”等11个系统。国民党特务机关有“保密局内湖训练班”、“内湖局华北办事处”、“东北青年反共大同盟”、“国民党改造委员会”、“自由中国大同盟”等5个系统。南朝鲜特务机关有“大韩民国国防部情报局”。他们派遣的特务多是由旅大地区潜逃漏网的反动党、团、特务分子。如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张奕夫、

张相卿、吴启墀等人就是由旅大地区逃亡的。他们的任务是获取旅大地区军事情报。

他们派遣的方法是陆、海、空三者兼用。如“美特”杨华德即是以船员身份，从香港乘船潜入旅大地区进行情报活动的。

杨华德曾在“重庆号”巡洋舰任下士军需。他随舰起义后，被分配到上海鱼雷场工作。1950年7月潜逃香港。向军统特务王新衡出卖我海军情报，牟取500元港币。后又向美海军驻港武官办事处美特郎安德出卖情报，每月领取特务津贴40美元。在此期间专以向旅大地区潜逃香港人员探取情报。1951年12月10日潜回大连，1952年1月3日被旅大公机关捕获。

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姜同国，1952年7月由“美特”乔德森派遣从台湾乘飞机经日本抵南朝鲜汉城。伪装中国人民志愿军，携电台1部，密码7本。于7月10日凌晨2点，在辽宁省新金县九区前修村西600米处空降着陆，后转金县乘船于7月11日潜回原籍长山县（今长海县）进行情报活动，被旅大公安机关捕获。

鉴于敌人的破坏活动日趋严重，反动气焰嚣张。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使之成为抗美援朝牢固的后方基地之一，旅大公安机关，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对反革命分子进行了严厉的打击。纯洁了要害部位，为保证安全生产，特别是军工生产的安全，支援抗美援朝创造了良好条件。

## 二、组织人民防空，动员全民备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仍在作垂死挣扎，屡次派遣飞机飞往上海、南京、广州等地进行轰炸，破坏经济建设和军事设施。中共中央军委指出：“在各地大中城市成立防空司令部。”据

此，旅大行政公署于1950年4月25日发布命令，成立旅大地区防空委员会。以公安机关和公安部队为核心，主任委员由公安总局局长及公安总队司令员周光兼任。防空委员会下设防空司令部（即防空指挥部），司令员由周光兼任，副司令员由公安总局副局长郭钦和公安总队第二司令员陈美福担任。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帝曾多次派飞机在中国东北上空盘旋侦察，对丹东地区进行狂轰滥炸。旅大沿海附近也数次发现来犯的美国飞机。为保卫旅大地区的经济建设，巩固国防，保障抗美援朝军用物资的供应，旅大地区防空指挥部于1950年9月10日发出《关于旅大地区防空指示》，进一步加强人民防空工作。在旅顺市、金县及大连市内各区设防空分指挥部。各个公安派出所为防空指挥所。同时，各大企业、工厂、机关、学校也相应成立防空组织。于是，一个由上至下的群众性人民防空网络在旅大地区初步形成。

1950年12月20日为了进一步加强人民防空工作。市防空委员会主任改由市委第一书记欧阳钦同志担任。1951年1月6日，旅大市人民防空指挥部也改由市长韩光同志任总指挥

旅大市委，市政府把人民防空工作作为巩固国防、保卫经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它当作抗美援朝的一项具体措施。1950年冬，旅大市防空委员会针对朝鲜战场严峻形势，进一步建立健全了各级人民防空组织。到1953年，旅大市的工厂、企业、机关、学校的防空指挥处由1951年的234个增至为252个。防空指挥所由609个增至为701个（不含工厂车间的防空指挥所），并在部分街道和市郊村镇新建立224个人民防空自卫队。

在建立健全人民防空组织的同时，对参加各类防空组织的人员施行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培训。市人民防空指挥部，以上级下发的防空教材为内容，结合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对防空人员逐级进行培训。除此，各级人民防空组织对所有义务防空人员也普遍进行了防空专业知识教育，使他们逐步掌握了救护、纠察、消防；通讯联络、防疫等方面的基本知识。

市人民防空委员会，通过各种形式对全市人民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教育，使人民群众认识到做好防空工作不仅关系千家万户及每个人的切身利益，

也关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大业。经过教育，人民群众的警惕性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1952年9月4日下午4时许，甘井子区岔鞍村农民丛明选、冯木兰在田间劳动时，听到从空中传来一阵枪声，随即看见一架飞机越过麻子洞山消失了，接着由空中飘下1个穿黄绿色军服的人。该人落地后，略收拾降落物品后，向西北方向慌忙逃去。丛明选、冯本生觉得可疑，一个上山寻查，一个向村政府报告。与此同时，岔鞍村小学学生周家太，又发现离学校几里路不太远的马蹄山上起火，当即向教师周翠英报告。该校7名教师带上消防工具，前去救火。到山上发现一架标有“USA”字样的美国飞机在焚烧，即跑至棠梨沟合作社挂电话向小平岛公安分局报告。小平岛分局接到报告后，立即组织人力赶至现场，封锁山口、道路。经过周密搜查，是夜23时许，将飞行员捉获。经审讯，飞行员是美国人，22岁，尉官，名叫洛良德·遇尔亚姆拉尔克汉，驾驶轰炸机飞向安东（今丹东），被中国空军击伤。逃到旅大地区，油尽迫降。

为了有效地防止敌机偷袭、轰炸，旅大市各级人民防空组织动员全市人民一齐参战，挖掘、修建防空建筑，增置防空器具。1950年冬，旅大区防空指挥部指示各级防空组织，改造修整旧有的防空壕（洞）、地下室和增建防空建筑。至1953年，全市共有防空掩体5427处，可容纳293281人。在防空器具管理和使用上，市防空指挥部在全市各个制高点上设立了瞭望监视哨和防空警报器。各工厂、企业除备有各种消防器材外，还在主要车间、机房、水泵房、变电所等重要部位堆置沙包，以备空袭时抢救火灾。防空指挥部还加强了市区的灯火管制和车辆管理，在灯火管制上对居民要求必须做到。“人人有准备”、“家家有设备”，户户安装防空灯伞，防空遮光窗、门帘，并在玻璃上粘贴纸条，以防空袭时被震碎伤人。公共场所的灯火和各单位机动车辆的车

灯，必须按装防空灯伞或灯罩。遇有防空警报时，一切灯火熄灭，一切车辆禁行。

旅大市的人民防空组织，战时是地面反轰炸的群众性军事组织，平时则是城市建设和群众性治安保卫力量。他们协助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防奸反特，对保卫经济建设、支援抗美前方起到积极作用。